

爲普選而奮鬥的日子到了！

爭取港人民主治港！



建國六十年 結了什麼果？

資本主義孕育黑惡勢力

人爲的水患

新疆騷亂與民族自決權

中國：新武器，新地位 — 新的泡沫？

台灣「三合一」選舉

第四國際世界大會專頁

氣候變化和國際形勢

《煉獄 中國托派的苦難與奮鬥》

爲普選而奮鬥的日子到了！

仲明

2009年11月18日，特首曾蔭權終於公佈《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內容就如文件的名稱一樣，祇提及2012年的特首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完全不提2012年後的政治制度，美其名爲現屆特區政府不會干預來屆政府，特別是指下屆特首如何處理選舉的問題。

就這樣地一句輕描淡寫的論述，把香港市民望門興嘆那麼多年的全面普選要求再一拖再拖。

不單全面普選的問題不獲處理，就連有關立法會選舉會否最終取消功能組別、功能組別選舉如何邁向取消然後全面直選等等的情況，均一概不論。更遑論全面雙普選，亦即特首及立法會議員均全部由直接而普及的選舉方式產生。

反之，有的竟然是，祇提出增加立法會直選及功能組別各五席，特首選舉委員會增加至 1,200 人。

特區政府更大言不慚，胡說甚麼在諮詢文件提出的目的就是要：

「推動香港政制按二零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和二零二零年普選立法會的時間表向前邁進。」

「要爲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辦法注入新的民主元素，爲落實普選鋪路。」

「我們現時的目標是要使到二零一二年的兩個選舉辦法能夠在「依法辦事」的原則下，拓闊參政空間、大幅增強民主成份，爲普選鋪路。」

「我們已在二〇〇七年爭取到普選時間表。在人大常委會〇七年十二月作出《決定》訂明二〇一二年立法會維持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議席各佔一半的規定下，我們提出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內區議會議席的代表，來進一步提升選舉的民主成分。屆時立法會將會有接近六成的議席是直接或間接地由地區選舉產生。」

「我們今次的方案比起二零零五年所討論的方案更加前衛、更加進步、更加民主。」※

如此這般的說法，竟然被特首及其一眾高官說成是大幅增強香港政治民主化的進步之舉！

令人氣憤的政改方案

『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這兩句說法，在回歸以前，便一直被說成是香港社會在回歸後的重大原則。香港市民儘管是心中有數，未敢認真相信中共官僚的所謂保證，但現實的情況是，又十分無可奈何。信也好、不信也好。在形勢逼人強之下，基本法定下的規條終歸還是要在現實政治中落實執行。也正因此而佈下二十三條的意圖立法和其後因50萬人遊行示威而又收回立法的舉動，種下前特首董建華因『腳痛』而下臺的禍根。

九七回歸之後，第一個十年時，沒有普選；那知到第二個十年時，還是那一句，『可以』有普選，選行政長官！再過三年，即距離回歸祖國二十三年之後，『可以』有普選，選立法會議員！

上述這樣的說法，其實祇是香港政府新聞處爲《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製作的廣告宣傳品上的句語而已！因爲，人大常委會決定香港在2017年時，可以普選行政長官！到2020年時，可以普選立法會議員！

好一個『可以』！

這兩個可以，不是建基於本地的立法程式那麼簡單、直接，而是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這正是整個政改最致命的地方！

《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內的各種議題、設定和曾蔭權的種種巧言令色，都是因應基本法的條條框框而產生的。說得明白點，這份《諮詢文件》的怪胎產物，從裏到外，都突顯中共官僚政權橫加干預！

這正好說明，爲甚麼香港市民沒有爲那丁點兒寸進的所謂民主化而額手稱慶。

爲中共官僚當辯護士的嘴臉

這份《諮詢文件》體現的，不是人民可以當家作主的情況。相反，它要體現的，是按基本法

規定下要進行的本地立法程式，然後才呈交中共官僚統治下的橡皮圖章——人大通過。

香港市民對於這個橡皮圖章的記憶猶新。它已不止一次為香港的法例『釋法』，實際上罔顧市民的基本權利，為了維護大財團及行政主導的特區政府，而作出與人民為敵的裁決。這些慘痛的經歷，在兩次否決香港『可以』普選一事上已是鐵一般的事實。香港市民又怎會心甘聽從曾蔭權所說的：『將我們二零一二年的選舉再推去新的民主層次，邁向二零一七年和二零二零年的普選。』

事實上為曾蔭權幫倒忙的也大不乏人。

首先，去年11月，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指「普選」定義最終由中央決定。她的說法真可謂一針見血，道出整個問題的核心。中共中央才是拍板的地方！香港市民？你們休想可有置喙的餘地！

筆者真的為這種厚顏無恥的所謂律師的言論而覺汗顏。原來，在那麼重大的憲政問題上，在定義「普選」的憲政問題上，譚惠珠眼裏見到的，竟然不是由市民來決定！反而是要由一個不是得到人民授權而上臺的中共中央來決定！

這種視人民如無物的中共辯護士，在香港可謂比比皆是。

最近，前任律政司司長、現任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的梁愛詩，又公開提出，指人大常委會定下的普選時間表，祇是可以實行普選的最早日期，並非鐵定的日子，並非必然要實行普選的日子。她又指，達至2017年及2020年雙普選，仍需要經過立法會三分二通過、特首同意、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等多個關卡才能實現，不要指望到2017年或2020年就會自動落實雙普選。

這位曾經官拜至律政司司長的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的言論，再清楚過了。在「普選」定義以外，再加一道操作性的說明。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才會令這件事發生嘛！未批准，又何來2017年或2020年有雙普選呢？

這些中共官僚的辯護士，當然比香港市民更懂得主子們的意思！

所以《諮詢文件》的《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 - 相關的考慮議題》根本就無關痛癢。中共中央才是說甚麼是『普選』的地方！中共中央才是說何時有『普選』的地方！

一個卑微的要求——為普選而奮鬥

各位市民，現在真正到了為普選而奮鬥的時間了！倘若面對這樣不公義的情況而仍然不力爭到底，可以預見的是，一種十分畸形的所謂『普選』，將會被強加於香港市民的身上！當然，所謂『普選』的時間表，更可能是在2047年之前！

民主運動當前的核心問題，就是要為普選而奮鬥。所以，應該盡快開展各種抗爭行動，團結香港市民，向中共展示香港市民爭取基本權利的決心，為普選而奮鬥的日子到了！

打倒中共官僚統治！

還政於民！

為普選而奮鬥到底！

2009年12月27日

※見行政長官及政務司司長就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發言（2009年11月18日及2010年1月6日政府新聞公報）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36卷第2/3期（總第227期）

2009年12月31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 號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E-mail: octoberreview@gmail.com

Website: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本刊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揭穿各種歪理謬論 爭取港人民主治港

振言

繼中聯辦研究部長曹二寶撰文指香港有兩支管治隊伍之後，曾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做研究的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程潔，今年7月亦在網上雜誌撰文，稱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有政治力量針對中央政府，因此中央改變了以往不干預的政策，改為積極參與及介入，特別在政制發展方面。程潔如實地指出：中央政府決定直接干預政制改革的過程，人大常委會於04年就《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釋法，確立政改程序，是首個干預的證據。文章又說：「08年選舉，觀察者見到北京影響力增加，亦有指中聯辦在選舉中支持某一方的指控。」（選舉結果之一是民建聯獲勝。）

這樣，就由一個有官方背景的學者，公開承認了這一重大的轉變。

程潔這篇文章，很快便戳穿了中聯辦企圖抵賴曹二寶說香港有兩支管治隊伍只是一種理論探討的詭辯。

不過，正如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黃偉豪先生所指出的，程潔這篇文章真正令人值得擔心的論點，在於「一國」的獨大，「兩制」的含糊。翻看整篇文章，「兩制」這個字，僅僅出現了兩次，諷刺的是，其中一次更正正是強調「一國」大於「兩制」的凌駕性。而且，「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的許諾也守不住。以程潔的文章的說法，中央已可以隨時因應對香港「政治環境」(Political Environment)的解讀，作出任何「善意」的干預。

程潔文章再指稱：中央要在香港有一個合理的角色扮演，唯一選擇是支持行政主導的政府，然而沒有公眾支持的政府，可能會被立法和司法機關弄至癱瘓。

這就導致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11月10日出席北京一個研討會時表示，澳門回歸以來實施的一國兩制，有很多地方與香港不同，歸納為澳門

模式，政治體制方面更有建設性：「澳門的政治體制，特別是行政和立法、司法之間的關係，更多的是着重相互之間的配合，更有建設性。」他以讚揚澳門來貶批香港，要香港仿效澳門，完全扭曲香港一直存有的三權分立的定義，想要香港的立法、司法服從於香港政府的行政，從而否決香港的三權分立，削減港人的民主自由權利。

前香港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也跟着附和，強調法庭是特區政府一部份，「當然要支持政府」。這個說法與香港的法治觀念完全相違背。法庭應獨立於政府之外，正好防止政府濫權，這才是香港特區的優點之一！

此外，多名特區政協常委自我膨脹，趁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杜青林召開的座談會機會，向杜青林「告御狀」：立法會權力不斷自我膨脹，勢力越來越大，只會拖着政府後腿，令特區政府施政越趨困難。

部份立法會議員對這些言論很不滿，認為目前立法會權力十分有限，不少工商資本家不滿立法會運用權力，監察政府及商界行為，例如有沒有利益輸送，所以最想把立法會有關權力也削奪掉，好讓本階級成員更肆無忌憚地實行官商勾結！

以上這些政協委員的有關言論，反映他們有意插手本港政治，露出了他們想在港共同實行第二管治力量的「狐狸尾巴」。

必須一一揭穿這些官方、半官方、親官方的歪理謬論，防止部份市民因一時不察以致受他們矇蔽、欺騙；港人必須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團結起來，捍衛港人民主治港的原則，維護既得的民主自由權利，進而爭取更多的應有權益！

2009年11月24日

(轉載)

把政制發展的決定權還給人民！

五區總辭 全民公決 爭取2012年雙普選

社會民主連線

一、前言

香港民主運動舉步維艱，主因之一是缺乏民眾的廣泛參與。民眾未有廣泛參與的因素很多：多年的殖民地教育和殖民地封閉體制固然是原因，而中央一再設限，且得到香港既得利益階層的呼應，更令香港市民有很高的政治無能感，但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本地民主運動往往停留在表面的代理層次，未能令民眾透過親身參與來實踐理念、進行反思，令他們明白群眾的力量，可以改變政府政策及改善自己的生活，從而認同民主的好處，以至在七一大遊行的激情過後，民主運動便無以為繼。

如今，我們面臨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關口，因為曾蔭權的特區政府在拖延了足足一年之後，終於要為2012政制發展的中途方案進行社會諮詢。然而，頹敗至亟復甘願當奴的特首，已經發話，這方案將完全與2017及2020年的普選無關。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完全無助於港人達到最終雙普選的政制爛方案，我們已無可選擇要進行抗爭。

二十年來，民主派用盡所有方法爭取民主，較重要的包括維園八八直選集會，《基本法》草擬期間及八九民運之後，多次提出增加民主成份的政制方案，2003年2004年兩次50萬人上街爭取還政於民，以至2005年12月的爭取普選大遊行。然而，過往爭取民主的方法都效果不彰，民主進程裹足不前，民主派需要考慮提出進一步的有效行動，「五區總辭，全民公決」是目前最可行的出路。

二、本土民運 筆路藍縷

在我們考慮是否以「五區總辭，全民公決」應對這個歷史局面之前，且讓我們先行回顧香港本土民主運動的發展。

香港本土民主運動的發展，首先得力於民間社會對殖民地港英政府種種無理壓迫與剝削的不斷抗爭，這也與香港人本土意識的成長有密切關係。從1956年的雙十節暴動；到1966年4月4日蘇守忠以絕食形式反對天星小輪加價；到1967年渣華郵船公司、南豐紗廠、青洲英泥、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等因解僱職工引起工人強烈抗議，進而演變成香港左派的大規模恐怖襲擊與暴動；到1968年1月20日，中文大學崇基學生會舉行「中文列為官方語文問題」研討會掀起「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再到1973年9月2日，數千香港市民在摩士公園舉行「反貪污、

捉葛柏」遊行；迄1978年的金禧中學封校引發抗爭事件；這一切事件，雖然有不同程度的民族主義成分，但對本港社群的認同及關懷從而引發對當權者的不滿與抗爭，是非常明顯的。

在這一切運動中，本港學生的參與非常重要。「火紅年代」一詞，正是源自1968年的法國學生運動及後來美國的反越戰運動。當時這些學生運動，驚醒了香港的大專學生，令他們關注社會上的弱勢社群，投入了社會運動……當時不少大專學生都投入這些社會運動中。

但自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香港的青年學生終於從國家主義的狂熱與迷夢中清醒過來，開始以理性批判的態度看待中國的發展，也將精力集中到本港社會政治的種種問題上。1978年金禧中學封校引發的抗爭，與及隨後的艇戶事件、露宿者事件及葵盛圍鼠患事件等，一再顯示出年輕學生成為參與社會改革的中堅動力；尤其是金禧中學封校，事件聳動全社會，激發中產市民的義憤，支持師生於主教府門外靜坐請願長達多月，可以視為本港民間運動全面面向本地問題的分水嶺。許多畢業生紛紛成為社運分子，其中不少今天仍在我們中間，成為民主派的中堅分子。

踏入八十年代，回歸問題成為了香港社會的主議題，本港民主運動的發展，也開始從對應殖民地港英政府的專權統治，漸漸蛻變為爭取97回歸後港人的人權保障及民主自治。1988年的「爭取全面直選運動」及百萬人簽名「反對大亞灣興建核電廠」事件，可被視為轉向北京當局爭取民主權利的典型例子。而到了89年，波瀾壯闊的北京愛國民主運動再一次喚起了香港人的愛國心和對國內同胞民主人權的關注，令本港的民主運動與祖國民主運動連繫起來，休戚與共。

港人支持89北京民運，已不再是七十年代初受中國官方策動與認可的「認識祖國」活動，而是由民間自發、與祖國廣大人民認同的民間民主運動，它為在親中路線失落後的本土學生運動重新找回了支點，也促使了本土公民運動中的精英分子向本土的政治運動過渡，形成了今天香港立法會內的民主派。

然而，北京當局也是自89年六四慘案之後，開展了長達二十年拖延香港民主發展的過程，不單為了有效管治香港，也為了有效阻截香港的民主發展對中共政權造成衝擊，令本地民運發展充滿陰霾。

北京中央政府在回歸後的香港政制安排上重重設障，將一個僅得薄弱民主成份的立法會及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寫進《基本法》中，致有91年香港市民火燒《基本法》定稿的壯烈之舉。雖然其後英方爲了西方的利益強行加快97過渡前的政制民主化，而民主派人士也加快整合成民主黨，但本地民主人士已經開始軟弱下來，對爲人民爭取最大的民主空間和權利變得怯懦，致有95年立法局全面直選的議案，因民主派議員一票之微的退縮而功敗垂成的敗案！而97年7月1日午夜的鐘聲一響，回歸前最後一屆，也是香港有史以來最民主化的立法局隨即解散，由一個中共欽點且全權控制的臨時立法會取而代之，並將自92至97香港政制民主化的立法成果全部取消，還原多條惡法，重新收縮香港的公民空間（Public or Civic Space）至80年代的水平。

三、回歸祖國 民主倒退

中央政府這種推倒重來的策略，再加上它在《基本法》中設限，令回歸後的香港社會猶如孫行者戴了金剛箍，在緊箍咒下動彈不得，公民空間大受拘禁。中央政府只集中統戰香港的權貴商家，《基本法》內訂明的政制無不偏袒他們，令裙帶資本主義得以維持。在這政經脈絡下，產生了小圈子的特首選舉、功能組別佔立法會一半總數、分組點票、行政主導等不義的制度。

九七後的香港，彷彿仍然處於殖民地時代，只是換了主子而已。決策權力仍然高度集中在非民選的特區政府行政部門之內。民選議員不單權力有限，其議席也只佔立法會的一半，而這個局部民選的立法會的政策制訂能力，更受到分組點票及有限提案權的掣肘；在分組點票制度下，立法會不過是橡皮圖章。此外，英人遺下的諮詢架構，也在長官意志愈演愈烈的情況下逐漸失效，令民意更難影響政府施政，遂令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立法會以及各政黨，日漸產生失望的情緒。顯而易見，期盼在不公義的建制內爭取民主，或希望專權的政府落實香港民主，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回歸十多年，香港人擁有的自由不斷受到侵蝕，《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七一後名嘴封咪、取締民間電台以及廣管局干預港台編輯自主的方針，令這些公民自由受到嚴厲的挑戰。現時香港社會真正獨立的媒體少之又少，而大氣電波卻遲遲未開放。

同時，香港社會發生了一連串重要事件，爲香港這個特殊城市的新殖民地歷史，烙下了特殊的印記，其中最重要的，肯定是03及04年7月1日超過五十萬人上街的日子，06年底及07年中本土青年人發起反對拆除天星及皇后碼頭的行動，並因灣仔利東街的清拆引發就市區重建的抗爭，與及09年六四廿週年

破紀錄的二十萬人參與維園燭光悼念會等等，這在反映民間公民社會的潛在力量仍然強大。過去幾年，對市區收樓重建、新界收地基建、政府賤賣領匯、古蹟拆卸的反對運動延綿不斷，一群群在議會建制外的民主及公民運動鬥士已經形成且愈趨成熟。

這也預示了回歸後的香港社會，開始「兩條腿走路」：已經進入主流或官方認可的政治架構的公民運動人士，即現今立法會內的泛民主派，要在議會內與北京當局操控的特區政府及議會內的大小保皇集團進行抗爭，令其少做官商勾結和中外資本勢力勾結的壞事；而另一方面，議會外仍有大量民間人士在各個層面努力工作，一方面喚醒香港市民關注自己的切身權益是否受損受制，另方面也以非黨派的中立角色努力開拓與擴闊公民空間。

四、七一遊行 波瀾壯闊

倘若沒有89年前後兩次一百萬人上街，香港人在03年的七一，也可能欠缺了那份自我想像，可以衝破全民一起上街的的心理關口。但從長遠的背景來說，03七一也是承接了香港自二次大戰以後長達60年的公民社會運動的歷史。

當被認爲一直以政治冷感的經濟動物自居的香港人，不理高溫奮力擠進只爲被警方數算人頭時，亦揭示了議會內的民主派在本土民主運動的關鍵時刻，起不到帶頭的作用。這是自98年市民將民主派重新送進議會後議會民主派的重大失職。七一大遊行竟非由議會內的民主派人士發起，而是由「七一連繫」蛻變而來的民間人權陣線（民陣）發起，也非由議會內的民主派人士鼓動，而是由香港各種民間力量，不單是傳統的社運組織及民運活躍分子，更包括資深傳媒人、律師、記者、醫生，全都出來高調鼓動，才促成超過五十萬人上街。

而且，當遊行人數遠超乎想像，當人民力量充分展現出來的時候，議會內的民主派人士並沒有以更強的姿態迫使特區政府收回廿三條立法。無論在遊行前後，泛民從政者都沒有認真考慮過民間人士呼籲過的集體辭職策略。結果當董建華政府一意孤行要無視五十萬人上街，繼續將廿三條立法草案小修小補後提交立法會，香港自開埠以來英國人締造與留下的高度自由局面其實命懸一線。若非自由黨突然看出順應民意的巨大政治前景而陣前倒戈，廿三條立法草案若通過的話，這六年的香港真不知變成何種局面。

從六年後的今天回望，過去六年不啻是香港公民社會的再出發：首先是部份民間人士成功打入議會，並組成新政黨，擴闊泛民主派的政治光譜；其次，更爲重要的，是出現新一代年輕的、更爲充滿

理想與熱情的社運分子，他們在後馬克斯主義時期卻完全不入自由主義的思想巢臼，有自己一套反殖民主義思考，而他們作出廣為大眾注意的行動，便是06年底的反拆卸天星碼頭抗爭，與及07年夏曠日持久的反拆卸皇后碼頭抗爭；期間更不斷聲援各區的反市建局的「市區強徵土地重建」計劃。從六年後的今天回望，這些新政黨、新青年、新網絡，與及重拾活力的一些社運機構，及許多一如既往默默耕耘的非政府組織，便構成了回歸後，尤其是03年後香港新公民社會的主要畫面。簡言之，03年七一的年輕一代經已成長。

五、北京權者 重重設障

但正如北京當局在六四慘案後重重設障，03年到今天，中央政府也繼續給議會的民主派出難題，繼續防範香港的民主發展對一黨專政造成衝擊。它採用的策略，除了在經濟上給港人甜頭外，也在某幾項實質的民憤事件上順應香港的民情，這也可被視為正常的拆彈動作，將一切具爆炸性、可令港人上街的事件清除。除了讓葉劉淑儀倉皇出走，老董「腳痛」下台外，也讓西九推倒重來，讓紅灣半島不拆；讓楊永強辭職……然而人大卻突然於04年釋法，封殺0708年雙普選，繼而在07年，再用「決定」去扼殺2012年雙普選。整體局面可說是一種懷柔式的封殺(killing you softly, with his bait)。明顯這是中央政府從背後發功以連消帶打、釜底「加」薪的方式回應香港市民的訴求，將訴求的實物目標放給港人，但卻保留，甚至進一步加強訴求底下《基本法》的政治枷鎖。

本來，《基本法》附件二規定，2007年後香港特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如需對附件的規定進行修改，只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就可以。上述《基本法》條文賦予港人爭取0708年雙普選的空間，於是爭取07年普選行政長官和08年普選立法會，成為了民主運動的主軸，甚至保皇黨，如民建聯及自由黨亦曾將0708年雙普選寫入其黨綱中。

但中央政府公然違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於2004年4月6日，出其不意地以釋法之名義改動《基本法》。人大釋法將修改《基本法》的權力完全收歸人大常委，並於4月26日通過決議，剝奪《基本法》訂明港人在0708年應得的民主普選權利，還讓特區政府其後推出一個既無時間表復缺路線圖的05年政制「發展」方案，以各種公開的壓力及暗中的利誘，企圖令民主派接受，造成港人甘願屈服的既成事實。若非港人在關鍵時刻站出來令民主派歸隊，這個如雞肋般的05年政制「發展」方案，早已填

鴨般填進港人的喉頭之中！

但2005年的政改方案遭否決，特區及中央並一眾親共輿論一直將政制發展「原地踏步」的責任推給民主派，這是一種「明屈」的伎倆，類近於新疆當局「招呼」本港記者的做法。民主派卻苦無良策予以有力的駁斥。面對沒有0708年雙普選的既成事實，民主派只好退而求其次，祭出爭取2012年雙普選的旗號，以向市民交代。但旗幟雖在，爭取的策略和勢頭卻付之闕如。中央政府食髓知味，眼見泛民主派對扭曲式釋法沒有作出有力的反抗，於是又再於2007年12月30日，人大常委再作出「決定」，否決2012年雙普選，但為了緩和港人一再被侮辱與愚弄所產生的可能反彈，中央政府虛與委蛇，拋出了所謂容許港人於2017年及2020年進行雙普選的「期票」，但同時又再一次要求民主派合作，將2017年及2020年雙「普」選能否兌現，與2012的政制「發展」方案能否被民主派接受掛鉤，這無異又是再一次將民主派推到台前，以一個空泛的2017年及2020年承諾，迫使其盡早投降。

香港早就具備雙普選的條件，擁有普及的教育制度、健全的司法制度、自由開放的公共空間等，早於1988年便應實行普選，但是港人的民主訴求一再被打壓，1988年一拖20年至2007年及2008年，現在中央又再拖延十年有多至2017年及2020年，香港人還有幾多個十年？事實擺在眼前，若無法在爭取2012雙普選方面有突破口，港人只會被陰乾同化成一群順民；若無法找到突破口，香港的民主派只會遲早被中和掉(neutralized)，雙普選只會不斷被拖延戰術玩弄，香港永無普選的日子。這是中央政府自03年到今天，給民主派出的大難題。

六、五區總辭 打破困局

面對這樣一個困局，只有一個行動，能將議會內的民主派及全港市民、民間社會聯繫起來，讓人民可以清楚表達對普選的意願，同時也令議會內的民主派獲得人民意願的授權，去繼續向當權者爭取普選的落實。這就是以「五區總辭，全民公決」，藉辭職觸發補選，並在補選中以「2012雙普選」作為單一議題，讓全體選民在補選投票中表態，達到全民公決的目的。這不單足以打破困局，也突顯了議會內的民主派在民主運動上所能發揮的帶頭作用，為整個本土民主運動注入新動力。

此做法各國都有例子可援。當每區有一位立法會議員辭職後，五區各有一空缺席位要進行補選，即全港市民皆可投票，而補選是採用單議席單票制，多票者勝。泛民主派在每區各派一候選人，只設定單一政綱——要求2012雙普選。當選民投票給予泛民主派候選人，即支持2012雙普選，形成實質支持此議

題的全民公決。若泛民主派候選人在三個區以上順利當選，或在五區支持票數達到一定的數量，即代表2012雙普選具有相當的民意基礎。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會構成重大壓力，同時在國際間也引起廣泛關注。

民主派的力量來自香港市民，民主運動的力量同樣來自香港市民，「五區總辭，全民公決」是民主運動的一項戰略，透過選票彰顯港人爭取普選的意志及人民力量。「五區總辭」即由五個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代表獲六成選民授權的民主派辭職，在香港開埠以來是前所未有的行動，必定引起市民大眾、本地及國際傳媒的關注，對北京當局及特區政府構成龐大的壓力。由補選而衍生的全民公決，是全民意志一種清晰的表達，雖然不具法律效力，但其投票結果具有不可摧毀的道德力量，迫使中央及特區政府正視港人爭取普選的訴求。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可以刺激港人反思民主的價值，從而鞏固及壯大民主派的支持，並加強民主運動的力量。無疑，近年香港人的政治意識不斷提高，但是董建華及曾蔭權上任之初的支持度也非常高，及後由於不斷施政失誤才令二人的民望下滑。民主派不得不承認，在政治高壓低下，港人對小圈子特首的施政也存有幻想，民主並未能成為港人最核心的價值。「五區總辭，全民公決」若成事，將是近年香港政制發展的重大事件，不論支持或反對的本港媒體不能不作廣泛報導，以往沉默的大多數，也要反思民主與自身權益的關係，正如六四事件廣泛引發港人對民主的渴求。補選過程是全港每名選民可以參與的過程，選民會接收大量文宣，及第一次面對「選事而非選人」的「全民公決」投票模式，這是最好最難得的公民民主教育。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如能實施，將重挫特區政府的合法性 (legitimacy)。五名立法會議員代表全體泛民主派辭職，是在體制內的不合作運動，對特區政府拒絕落實雙普選的嚴重控訴，其目標的正當性毋容質疑。特區政府將政改原地踏步的責任歸咎泛民主派否決2005年的政改方案，即將進行的政改諮詢，特區政府必然故技重施，聲稱民意支持2017年才落實沒有路線圖的虛幻「普選」承諾。全民公決的結果，是全民意志的體現，具有凌駕所有民調的事實及道德約束力，特區政府不能再以似是而非的民調作狡辯。若全民公決的結果支持2012年雙普選，但特區政府仍然拒絕雙普選，即與全港市民的意志為敵，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區政府必再無的合法性和權威可言。

民主派與保皇黨在立法會的得票比例一直維持在六四之比，唯保皇黨以「地區福利主義」組織鐵票，近年得票率不斷上升。「地區福利主義」透過

建立地區組織，提供以親中財團捐獻的金錢為後盾的地區性福利，如平價旅遊、文娛活動、派發節日禮品等等小恩小惠，籠絡選民成為選舉的支持鐵票。2007年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敗，連以地區工作見稱的民協，亦難逃失敗的命運，足見「地區福利主義」的成效顯著。泛民主派的主要應對策略是加強地區工作，但由於雙方的財力懸殊，泛民主派依樣畫葫蘆，以己之短攻敵之長，根本不能改變現況。可以預見，泛民主派2011年區議會選舉的前景並不樂觀。區議會議席不斷萎縮，令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失去樁腳，將影響泛民主派在立法會選舉的得票率，蠶食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席。「五區總辭，全民公決」，將有助提升全港市民的民主意識，令一般不理會政治的市民醒覺，這樣才可抗衡保皇黨「地區福利主義」對泛民主派票源的蠶食。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將開創香港直接民主實踐的先河。我們不必過分擔心全民公決的結果，即使結果是支持政府的民意佔上風，問題也不大；縱使民主的理想表面上落空了，雙普選的政治目標短期內不能實現，但本港社會的民主化其實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因為全民公決得以確立為最直接的民主政治模式，日後便可成為民主運動的利器，直接影響香港未來的政治發展。由是觀之，這至少也是民主派在政治上退一步、進兩步的妙著。

我們必需向歷史，向人民，向自己有所交待，以「五區總辭，全民公決」，將人民響亮的聲音帶給中央與特區政府

西方政治學經常在思考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政治的利弊：一些有理想的政治家，經常嘆息受制於選票而不能放開懷抱去堅持政治理想；反過來，市民也往往覺得政客們對選民的意願維護得不夠，經常發生出賣選民的狀況。然而，擺在我們面前的「五區總辭，全民公決」，卻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讓政治家超越選民眼界的理想、與政治家對選民意願的尊重，真正的合二為一。以政治家的有膽識行動，帶動選民勇於將自己的民主意願，以神聖一票的方式表達出來，這是一個民主派可以向歷史交待的機會：

「親愛的全港市民，我們以『五區總辭』的方式，將全民公決的機會還給了你們，希望你們與我們一起，清楚響亮地在這歷史時刻，將要求2012雙普選的聲音，傳給中央政府及全世界知道。」

請不要忘記：我們每一位泛民主派議員，都在08年的選舉中向市民許諾會爭取2012年雙普選，會以2012年雙普選為我們的底線。人民選我們是為了實現選民的意志，我們斷不能為了戀棧權位及懼怕中央而不敢抗爭。面對這時刻，我們必須向自己交待，

以行動證明給今天及將來的香港市民看，我們盡了作為香港民主過渡受託人的使命。

為此，社民連不計勝敗，已就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公司票投票制度申請司法覆核，這是在遊行示威已不濟事的情況下，在議會抗爭以外開闢的另一條戰線。如此拉闊戰場，目的在維持民主運動於不墮。若然官司勝訴，則從憲制上否定了四分一功能組別議員的合法性。這將會是一場很好看的戲碼。另一方面，我們提出「五區總辭，全民公決」方案，這是目前為止最具認受性及代表性，且在現行憲制架構下完全合法的政治行動。

其實，公民黨的張超雄議員，社民連的梁國雄議員，早在2004及2005年已為了爭取0708年雙普選，先後在立法會提出全民公決及全民公決法議案。梁國雄在今年仍為此再接再厲，而何俊仁議員、劉慧卿議員及陳淑莊議員等民主派同寅也分別發言予以支持。作為泛民主派，我們根本沒有任何堂皇又具說服力的理由，去迴避一個我們只要辭掉四分之一議席便可以達成的實質性全民公決。既然現行《基本法》沒設立全民公決機制，既然立法會斷不會通過設立全民公決機制，既然明擺著五區總辭就可以實現全民公決，我們民主派就斷沒理由去迴避實踐它，尤其是有這樣一個現成的可以實踐全民公決的方法，我們卻不去作出應有的犧牲將之實踐給人民參與，是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難以向人民交待的。我們不敢(怕得罪中央政府)或不肯(因戀棧權位)去實踐它，卻在橡皮圖章的立法會中贊成全民公決議案，或緣木求魚要求特首辭職及解散立法會，不怕被市民私下恥笑嗎？全民公決絕對不只是說說而已的免費政治午餐！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是一個只有贏，沒有輸的行動，因為無論選民的所表達的意願如何，那勝利無論如何也是民意的勝利，而非我們民主派一廂情願的勝利。惟有這樣，縱使人民在補選公投中表達願意接受中央及特區政府的2012年政制方案，中央及特區政府才不致過分玩弄2017年及2020年的普選方案，而令之完全走樣。我們必需向人民交待，將表達人民意願的機會還給人民。

或許有人會問：五區辭職真的能造成實質性的全民公決效果嗎？我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若泛民主派輸掉三席以上，立法會三分一的憲制否決權隨即消失；換句話說，市民可以用直接民主的方式，決定接受或否決政府提出的2012年政制「發展」方案。我們的目的是造成全民公決的事實，還政於民，並非企圖預設全民公決的結果。有人會說：「一旦泛民主派輸掉補選，更不利於爭取普選。」我們認為，若市民現階段決定要接受政府的方案，通過實質的全民公決表達暫不爭取全面直選，泛民主派只

有尊重民意。所以，我們不怕建制派全力以赴，明刀明槍與高舉普選議題的民主派補選候選人進行對決，只怕他們不敢奉陪。

「五區總辭，全民公決」若能成功進行，且得到大多數選民支持而獲得民主派以普選議題勝出的結果，對民主派來說將是很大的鼓勵；正如以陳太出戰補選成功阻截葉劉往特首寶座邁進一樣，那將會是一場喚醒香港市民民主普選決心，激勵民心士氣的世紀硬仗。若「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的議題得到選民投票支持，通過了民主派的議題，那就等於昭告天下，香港人清楚地要求民主，若北京當局繼續以各種爛理由「說不」，那麼，阻撓香港民主化的責任，就不在我們民主派是否願意與中央及特區政府合作，肯不肯通過那些不倫不類、似有實無的政制「進展」方案；而在於中央政府有沒有聽取民意、重視民意、順應民意，兌現《基本法》乃至《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

七、結語

面對中央政府為香港市民及民主人士設的「普選期票」死局，我們斷不能坐以待斃。只有當我們敢於作出有創意的大膽行動，敢於不怕得罪權勢，為了真理甚至敢於得罪中央，才能真正立於不敗之地，得以發出先知的有力聲音，打破歷史的規律、革除歷史的宿命，在中華民族全體邁向真正民主政治上，走前一步，向歷史及人民作出應有的交待。

正如德國神學家潘霍華當年冒生命危險回到德國抵抗納粹政權時說：「若我今天不回去與人民一起同受苦難，我將來便沒有資格參與德國的重建！」若我們今天在2012雙普選上沒有盡力爭取，我們便沒資格參與將來香港的民主選舉。我們繼續作為香港民主過渡受託人的合法性，端的視乎我們有沒有打好這場以「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爭取2012雙普選之戰！

是時候邀請香港的人民出場，將球踢回給中央了！



從台灣「三合一」選舉談到台灣政治 微波

馬英九得益於陳水扁被控於8年任期內的貪污舞弊，在08年大選中當選台灣總統。但在上台後，政績差劣，失業率高企，在今年8月的救災工作中行動遲緩，表現很壞；這些都使台灣民眾失望、不滿，促使國民黨在12月5日的17個縣市「三合一」選舉大敗，得票率從去年大選時的60.5%、05年縣市長選舉時的51.7%，大跌到47.8%；而民進黨則由過去的39.5%，急增為45.3%，國民黨的縣市長席位也從原有的13席減為12席，民進黨除保持原來的3席外，更奪回北部的宜蘭縣1席。

兩黨的主席的民望，據《聯合報》選後次日公佈的民調顯示：蔡英文因帶領民進黨打出漂亮的一仗，民望急升至43%，創歷次民調的新高，而馬英九民望則為33%，繼續低迷不振。

這次選舉和民調顯露出，民進黨及其主席的聲望沒有因陳水扁貪污案而蒙受太不利的影響。

此外，無黨派推薦的傅崑萁也在花蓮縣競選得勝，在縣市議員選舉中無黨籍人士獲得170席，台聯得3席，勞動黨和親民黨各得1席，都反映出各種選舉是在自由、公開的競爭中進行的。雖然有許多賄賂事件，也幾乎都被破獲、拘捕法辦。

當然，在台灣這個資本主義社會裏，財雄勢大的黨（例如 國民黨）一般都會大佔優勢，弱小的政黨由於人力、財力、物力有限，在競選中會相應地不利、因而使台灣的選舉有其局限性；但比諸大陸之毫無民主、選舉有名無實、全由中共操控利用，都是遠為優越、值得台灣人民自豪和珍惜、更值得大陸同胞要努力爭取實現的。

而且，台灣人民平時已享有自由組織政黨（或政治團體）的權利，年前已知有逾150個政黨成立、自由活動。今年11月10日，香港《文匯報》更根據中評社報導：由陳水扁堂弟陳天福所創立的台灣民主共產黨，6日已取得台灣主管機關「內政部」的政黨証書，編號第157號。

陳天福在「共產黨」之前冠上「民主」兩字，

顯示要與毫不民主的中國共產黨根本不同，但又跟着說：「民共 是一個『經濟、文化』的政黨，所以民共的中央辦公室選擇離開政治中心的臺北市」，其用意是要與一般所稱的「共產黨」劃清界線，祇是不搞政治的政治黨派，實際倘真如此，豈非一般所說的名不副實或有名無實嗎？但不管怎樣，這仍然表明台灣人民有組織政黨的自由權利，到那時為止已有這麼多的政黨得到合法證書，還有多少尚未得到證書的政黨或政治團體存在呢？在一個2千3百多萬人口的台灣有這麼多的政黨（而且幾乎都是合法的），但在彼岸的大陸，13多億人民，除了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及其陪襯物8個舊有民主黨派之外、可還有哪些政黨容許合法存在和自由活動嗎？實際上，儘管有許多人士自行組織了政黨，但卻遭到當局壓制，加上「顛覆國家政權」等莫須有罪名判刑監禁。

馬英九在競選總統時，曾以「不統、不獨、不武」為口號，在當選後對北京當局採取友善政策，企圖實現三通；北京方面也對他進行統戰工作，企圖拉攏他孤立民進黨，因而對台灣釋出善意，使兩岸關係從緊張對立走向緩和。在「三合一」選舉失利後，馬英九重申「三不」政策，否認自己親中，祇是親台，高唱「中華民國是主權的國家」，意圖討好台灣民眾，在2010年的5個直轄市和2012年總統選舉中重獲勝利。

美國政府在台灣選舉後，宣佈新的向台售武，包括「黑鷹直升機和4艘柴電動力潛艇」，以顯示對馬英九政府的繼續支持、信守《台灣關係法》。

北京中央政府則對選舉結果雖感失望，也只好低調處理（《文匯報》大標題只稱「民進黨小勝、國民黨小敗」，予以淡化），但對馬英九仍然給以支持，繼續簽訂各種協議，以幫助他維持對北京較少不利的統治。

2009年12月10日

建國六十年 結了什麼果？

張開

新中國成立60年期間，在各方面都經歷了許多重大的變化，特別是在經濟總量(GDP)方面，已雄踞到世界第三位。據稱：很快會超過日本，十年內可能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完成了資本主義復辟

這一發展使中國「完成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從1978年的77.6%下降到2007年的29.5%，98%以上商品、95%以上生產資料的價格，已不再受政府管制而由市場決定。」¹

中共在推行實質上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時，曾宣稱這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重要理據之一是中國以國有經濟為主體，起着主導作用，全國經濟按國家的「五年計劃」運行。但幾年前之把一向慣用的「五年計劃」，改稱為「五年規劃」，反映出國家「計劃」已不能指揮市場經濟；如上所述，今天在中國經濟流通的商品和生產資料的價格，已幾乎全由市場決定，依着市場需求和牟利等規律運行，不再受政府控制和規管；國有經濟的比重日益減弱，私有經濟的比重則日益增大。這使得官方今天不得不公開承認：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由市場經濟體制所取代，這等於承認資本主義在中國已完成了復辟，中國已恢復為資本主義國家，三十年來向這方面轉化的過程已瀕臨完結。

不過，中國官方仍然強辯說，中國今天這種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而非資本主義性質的，即使它實質上已是遠離社會主義的方向，而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並無根本的區別；國有經濟已不能佔主體地位和起主導作

用，佔70%的私有經濟仍然像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以利潤掛帥，殘酷剝削工人，所得利潤除納稅外，全都歸企業及其股東所有。像這樣的經濟，可有什麼社會主義性質？！

從實際來看，中國今天的經濟却具有一般資本主義的特性：生產的無計劃、無政府狀態，時而生產過剩。顯著的近例是：據《文匯報》今年10月19日北京報導：內地再次出手整治困擾經濟多年的產能過剩問題，近期國家發改委等十部委聯合發文表示，將通過立項審批、信貸等多種方式共同抑制部份行業的產能過剩和重複建設。其中，被列入重點調控目錄的六大行業中，既有鋼鐵、水泥、煤化工等傳統行業，更出現多晶硅、風電設備等新興產業。

在中國經濟與國際資本主義全球一體化之後，受到國際經濟危機的影響，中國的九大行業中央國有企業08年的業績，除商貿企業利潤僅增1.6%外，其餘八大行業央企利潤均出現同比負增長，航運業更大幅虧損282億元，未能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北京專家預計，今年中央企業的業績或繼續慘淡。²

此外，商務部副部長高虎城表示：今年1至7月份中國海關公佈的數字顯示，中國進出口總額為11,500億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2.7%，其中中國的出口1至7月份下降22%。³

付出的沉重代價

據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鍾偉指稱：「中國經濟世界第三，總量卻只佔全球6.4%左右，約為美國四分之一，而人均GDP則排在全球一百名之外。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經濟多年快速增長的背后，付出了資源和環境的代價，付出了收入分配相對差距拉大的代價。」⁴

關於後一種付出的代價，中國問題評論員林和立先生指出：一些簡單的資料可以說明國富民窮的怪圈。中央國庫的收入，從2003年的兩萬億元飆升到08年的六萬多億元，增長速度比GDP（國民生產總值）快一倍以上。但城鄉居民總收入佔GDP的比例卻每況愈下。中國居民收入佔GDP的比重從十年前的百分之五十三降到2006年的百分之四十一點四，比發達國家的同一比例低百分之十五左右。據清華大學著名社會學家孫立平介紹，中國城鄉生活水準的差距是六倍，而世界平均水準只有一倍半。更淒慘的是，為大款們創造財富的打工子女却因為工作環境污染與缺乏勞保而百病叢生。據專家估計，全國有近二億人受各種職業病折磨。

5

中國的市場經濟受世界經濟危機的拖累之後，通貨膨脹加劇、物價飆升。糧食和日用品價格，尤其是房價不斷高漲，人民生活更加艱苦，中國工薪族的納稅負擔，據福布斯發佈的全球指數顯示，竟高踞全球第二位。⁶

資本主義的特徵和弊害之一，是收入差距日益擴大、貧富日益懸殊。據人民網報導，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曾湘泉引用財政部的最新調查指出：我國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經達到「高度不平等」狀態，10%的富裕家庭佔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佔全部居民財產1.4%。另外、內地現有的收入結構中，我國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體合計佔總人數的64.3%。⁷

中國政府推出的4萬億救市措施、雖然多少抵禦了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扭轉經濟下滑的勢頭，但却使經濟結構失衡加劇，政府今年投資於國有企業，佔了GDP增長量的95%；重複建設和產能過剩的現象重新抬頭，致大量高耗能、高污染等行業和企業「死灰復燃」，嚴重影響了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

政府這樣的投資，也成為過於寬鬆的貨

幣政策，導致資產泡沫膨脹過快，並有加劇惡性通脹的危險。

政府為擴大內需，刺激消費，以保持經濟增長，於是推行家電下鄉，汽車下鄉，以舊換新等一系列舉措。但從2002年提出擴大消費政策以來，至今一直多停留於口號層面，消費在經濟增長中所佔的比率逐年下降。按照理想的經濟增長模式，消費需求應是帶動經濟的主要引擎。但中國提振消費知易行難，據北京知名專家們分析認為，這有三大「攔路虎」：

第一是地方官員不重視、沒熱情、落實少，他們祇重視將GDP指標「衝上去」的政績、以應對中央考核的機制；

第二是收入分配不合理，居民可支配收入低，這直接影響了民眾的消費能力。2002至08年，中國的GDP持續增長，但居民收入佔GDP的比例却連續下降；中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0.4%，但職工的實際工資年均僅增長15.7%，明顯抑制了居民的消費意願；

第三是教育、醫療等社會保障體系滯後；家人染病、孩子入學等成為居民消費中主要的「後顧之憂」，限制了居民的消費行為。⁸

這些都基本上由於中國政府推行資本主義的邏輯結果。中央政府雖然每年都召開經濟工作會議商訂對策，也難以阻止「每況愈下」的發展。

政治上的代價

回顧建國以來，中國一直維持着中共一黨專政，全國人民的民主自由人權備受剝奪，人身和生存權得不到保障。

在一黨獨裁之下，尤其是在毛澤東個人獨裁時期，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從三反五反、從肅反到反右，帶來的是殘酷的鎮壓。毛澤東號召全國人民「大鳴大放」，無所不言，言無不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等到一般知識份子，尤其是大量的「民主黨派」人士起而響應，

坦率提出對國事的意見、主張后，毛澤東領導下的國家機關便以「反右派」罪名拘捕他們，判刑監禁，甚至迫害至死，毛澤東還以「引蛇出洞」來辯解他們的出爾反爾惡行。

跟着，盲目發動的大躍進、大煉鋼，尤其是人民公社運動，直接釀成三年大饑荒；文化大革命又造成十年大災難，89年反官倒爭民主的運動更遭血腥鎮壓……。這一連串暴政及其錯誤造成的人民死亡數字，據有關專家的不完全統計，達到八千萬人之多，遠遠超過日帝侵略造成的中國人員傷亡數字。⁹

中共官員們在牢牢把持着政治特權的同時，又貪污腐敗，享受物質方面的特權，但又要全國人民在拚命生產勞動的同時，捱受艱苦的生活，從而形成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迥然不同待遇的對照，更激發和積累起人民的怨憤，特別是長期被歧視、壓榨的農民的怨憤。



在人民不斷爆發其怨憤和反官僚爭民主抗爭的日益強大壓力下，即使在中共領導層中，有個別領導人（例如趙紫陽）企圖向群眾稍作讓步，也要被其他頑固的官僚們聯合起來推倒他，以維護整個特權官僚層的利益。縱使有些領導人在報告或中共的決議中被迫提出政治改革，但在實際上卻沒加以實行。縱使像現時黨政軍最高領袖聲稱要「以民為本」，應人民之所需，急人民之所急，但在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方面，却並無相應的改進。反之，許多異見人士比如劉曉波和維權律師譚作人、黃琦、

郭泉等人，却一一被打壓，扣上莫須有的罪名，予以監禁。許多人僅僅因為行使憲法和人權法規定的應有自由權利，即被橫加迫害。

以新聞工作者為例，不少記者只因履行他們的採訪、報導職責觸怒了當局，便被逮捕、起訴、判刑。因此，據《廣州日報》報導，內地記者已被列為內地十大高危風險行業之一；廣東省各保險公司除拒絕承保戰地記者外，還大幅提高一般記者的意外保費。¹⁰

而且，中國是新聞管制最嚴的國家，「無國界記者」在今年10月公佈，中國新聞自由排名在全球168個國家居倒數第8位。總部在美國的保護記者委員會早前指，中國連續第10年成為全球囚禁記者人數最多的國家，目前共有28名記者遭囚禁，其中24人是網絡記者。¹¹

階級鬥爭尖銳化

關於人民對中國現狀的不滿，筆者在兩年多之前，曾寫出《民怨民憤 遍地浮現》一文（刊於《十月評論》07年第2/3期），較為詳細地列舉許多新近事實加以証明。

中國資本主義經濟越是發展，剝削越加劇，物價越上升，人民生活越困苦，就越是增加了社會衝突和勞資矛盾所激發的大量群體事件。筆者在去年曾援引08年3月15日《明報》的報道：僅據全國總工會屬下的企業調解委員會統計，2007年全國的勞資糾紛約高達40.6萬件，這還不包括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和司法系統的統計。全總的副主席張鳴起透露，近年的勞資糾紛案數量急劇上升，每年增長速度達20%。（詳見本刊總224期）

在2008年，據《中國勞工通訊》資料，中國爆發的工人階級「群體性事件」，便有127,467宗。

吉林省最大的國有鋼鐵集團（簡稱通鋼）爆發的鬥爭，是09年所見到的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其直接原因和經過是：2005年末，北京民企建龍鋼鐵獲入股擁有50年歷史的國企吉林通

化鋼鐵，入股後，建龍有計劃地侵吞國有財產；通鋼07年出現100多億元虧本，並面臨停產；09年初，建龍宣佈退出通鋼；同年3月，通鋼工人因減薪而示威抗議；6月，通鋼出現8,000萬元盈利，建龍隨即再度入股，並持控股權；7月，3萬通鋼工人在24日上街遊行，與公安武警爆發衝突；新上任的總經理陳國軍要求工人復工，遭毆打致死。

據通化當地人講，今年4月，通鋼已發生過一次罷工，反對建龍重返通鋼。陳國軍等人本已離開，此次回來宣佈管理層調整的新方案，結果成為此次群體事件的直接導火線。據通鋼職工介紹，建龍未進入通鋼前，工人月收入在1,800至2,000元人民幣之間，現在普通工人僅600元左右，有的甚至月入200至300元，前後反差令工人難以接受。但總經理陳國軍年薪300多萬元，各部經理全是年薪百萬。另據知情人士分析，通鋼廠區原為農業用地，多數工人都是當地的農民。40多年來，通鋼所在的二道江區幾乎一家幾代都是靠通鋼打工為生。下崗對已經失去土地的農民而言，打擊沉重，也是促成事件升級的重要因素。¹²

通鋼工人鬥爭的啓示

第一、中國的國有企業開放給私人資本家入股，變成了股份公司，資本家代表操控了大權，結果反贏為虧，工人受苦，資本家退股；退股後國企變盈利了，同一私人資本再入股，工人被殘酷剝削，結果迫得工人要起來爭取改善，要求恢復原來待遇。這證明國企變為股份公司後的倒退、弊病，對經濟發展和工人權益的禍害，而這正是國企變成資本主義式生產、經營的結果。通鋼這些事實清楚地揭露出其他國企變成股份後的一般情況。

第二、國企變成股份公司，實行資本主義固有的高度剝削，導致出階級鬥爭的激烈和尖銳化。這也是資本主義社會所普遍存在的現象，中國今天也已經變成這樣的社會，因而達

到毆死資本家的激烈地步；表現出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極度不滿和憤怒情緒！

2009年12月13日

註釋

- ¹ 09年9月27《文匯報》報道。
- ² 10月11日《文匯報》。
- ³ 9月8日《文匯報》。
- ⁴ 《文匯報》出版的60年國慶特刊第12、13頁。
- ⁵ 7月20《蘋果日報》論壇欄所載林和立文。
- ⁶ 12月11日《文匯報》。
- ⁷ 12月11日《文匯報》。
- ⁸ 12月12日《文匯報》。
- ⁹ 關於死亡數字，引自10月2日《明報》觀點欄王丹的文章。
- ¹⁰ 引自11月9日《蘋果日報》轉載廣東《廣州日報》。
- ¹¹ 見同上《蘋果日報》的報道。
- ¹² 7月29日《文匯報》的直擊報道。



資本主義孕育黑惡勢力

青岩

重慶打黑

資本主義經濟導致治安惡劣，犯罪率高攀，滋生黑惡勢力，這已成定律。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特大的貪污、犯罪、走私案件時有所聞，難以剷除。最近重慶警方高調打擊黑惡勢力，引起各界關注。2009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出席世界中文報業協會年會前，陳述重慶打黑的情況。

薄熙來坦言：“打黑不是我們要主動而為，而是黑惡勢力逼得我們沒辦法。”“老百姓聚集在政府門口，舉著血淋淋的照片，畫面讓人神經緊張。黑惡勢力拿刀砍人，就像屠戶用刀砍殺牲畜，慘不忍睹。去年我們清繳刀具，大砍刀堆積如山。那不是一般的匕首，而是砍刀啊！”“謝才萍（重慶黑惡團伙骨幹）開賭場從中抽頭，賭場開在五星級飯店，旱澇保收。這連清朝道光皇帝和林則徐都不能容忍。”重慶市政府新聞發言人周波透露，重慶警方目前打黑專案組已由最初的14個發展到200個，參戰幹警由3000人增加到7000人，相當於重慶總警力的23%。

李定凱綜合各報刊的報導後寫道：重慶警方成功抓捕黑惡團伙成員1544人，469名逃犯受到境內外追捕；收繳槍支48支、子彈877發；查封、凍結、扣押涉案資產15.3億元；累計破獲查處各類案、事件1009起，其中破獲刑事案件892起；14個主要黑社會團伙受到致命打擊，100餘名黑社會團伙骨幹成員被緝拿歸案。

正如薄熙來所說，“這些黑勢力這樣猖狂，是因為上邊有‘保護傘’。”李定凱指出，重慶法政各界涉及黑惡勢力非常嚴重：“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市公安局副局長彭長健、市公安局交警總隊總隊長、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長陳洪剛、市高級法院副院長張弢、市公安局經偵總隊總隊長陳光明、市高級人民法院執行局局長烏小青、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副檢察長毛建平、市煤監

局副局長王西平等一批重慶市原公、檢、法、經系統裏位高權重的官員相繼落馬。”

根據資料，重慶市司法局原局長文強在重慶市公安、司法系統握有重權，前後達17年之久。1992年，他被調到四川省重慶市公安局任副局長；從1997年重慶改為直轄市到2008年，他連續11年擔任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黨委副書記、常務副局長，2000年時被提升到正廳級；2008年調任司法局局長，直至今年8月被捕。長期以來，文強和他手下的四大金剛（重慶市公安局刑警總隊原副總隊長黃代強，治安總隊原總隊長陳濤，公安分局原副局長趙利明，墊江縣原副縣長、公安局長徐強）與6大“民營企業黑幫”形成盤根錯節的社會關係。文強聚斂近億資產，包括一處價值3000萬元的雙棟別墅，位於著名旅遊景點和避暑勝地仙女山，佔地20畝，地是武隆縣領導白送，房子是建築商免費建設。當地流傳：“文強買地沒花一分錢，別人送的，建房子沒花一分錢，也是別人送的。”文強藏匿各種外幣和金條，價值3800萬人民幣，還在重慶機場高速公路邊的深水魚塘的淤泥裏藏匿2000萬元現金。

諷刺的是，文強曾是重慶警界的刑偵破案高手。李定凱引述某媒體報導：“文強是因為（2000年破獲新中國成立以來死傷人數最多的）張君暴力搶劫特大案件而聞名全國的。其實在此之前，隨便點出幾個文強辦的案子，人們的崇敬之情便會油然而生：1992年那次震驚全國的重慶警匪槍戰；1994年中國第一盜案；重慶的搶劫運鈔車案……他破獲的好幾個案件被公安部記一等功。”

李定凱評論這場黑白兩道交戰實際上是階級鬥爭，乃“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在經濟、政治、法制方面與新生的不法資本家之間的嚴重較量。”事實上，那些黑惡團夥頭目都是從市場化經濟改革中崛起來的“民營企業家”，更糟糕的

是，他們披戴政治代表的外衣。

例如，黎強是重慶渝強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擁有20多家企業，主營道路客運、房地產開發、汽車維修等行業。黎強曾經擔任重慶市人大代表，還有重慶市巴南區第十二屆政協常委、巴南區工商聯（總商會）會長、中國道路運輸協會出租與租賃協會常務理事、重慶市道路運輸商會（協會）常務副會長。

陳明亮被稱為重慶最大古玩商，2001年在重慶市渝中區大世界酒店開設雲夢閣夜總會，2004年開設豪城夜總會，2006年在澳門賭場開設洗碼公司，糾集刑滿釋放、解除勞教和社會閒散人員，以創辦經濟實體為掩護，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組織，經營賣淫、吸毒和賭博，洗錢，放高利貸，暴力綁架敲詐等犯罪手段，斂財高達數億元人民幣。重慶警方披露，重慶高利貸超過300億，規模佔重慶市全年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陳明亮曾經是渝中區人大代表。她是重慶公安史中的第一位女總隊長、重慶公安刑侦戰線唯一的女總隊長、全國省（市）級公安禁毒戰線唯一的女總隊長。多次榮獲個人二、三等功和重慶市先進工作者、“全國三八紅旗手”、“全國勞動模範”、“第五屆全國十大女傑”、“重慶市首屆十大女傑特別獎”等榮譽稱號，2007年出席重慶市第三次黨代會，在會上被推選為黨的十七大代表。

龔剛模曾是重慶摩幫（1990年代開始崛起的重慶民營摩托車製造群體）重要人物，重慶銀鋼集團銷售公司總經理。他與黑惡勢力頭目陳坤志成立重慶萬貫財務公司。2005年，東方資產管理公司重慶辦事處將金額21億元的不良債權以4300萬元打包給重慶萬貫科技有限公司（重慶萬貫財務公司的關聯公司），即變相吞沒國有財產。

王天倫是今普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控制西南地區最大的生豬屠宰企業，於2006年進入重慶市各大中小學食堂，成為“放心肉供貨企業”，佔據重慶豬肉市場41%。今普公司網站介紹王天倫“富而思源，熱衷於公益事業，已先後為家鄉修

路、辦學、改善公安部門工作條件等，捐贈近500萬元。”王天倫曾擔任重慶大渡口區政協委員。

重慶市民形容黑惡勢力滲透生活各個層面：“身在重慶，你不得不和這些涉黑犯罪團夥發生聯繫。過去你要住他拿地建成的房，吃他控制的豬肉，坐他的馬仔壟斷的公交車。他一不高興就可以叫你家破人亡，跺一腳就可能導致大面積的肉價上漲。”

黑惡勢力那麼狂妄，但往往以“紅帽子”遮黑，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分析，現今黑惡勢力都做形象工程，像表面的慈善事業，“為的是贏得社會的榮譽，為的是去買那個紅頂子，所以現在的黑惡勢力已經不是過去的那個叫穿風衣、戴墨鏡穿風衣手拿AK47，他不是那種形象。”正如毛澤東當年抨擊黨內走資派所說：“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不斷滋長

自從1970年代末，社會治安日趨惡化，多次出現震驚全國的重大刑事案件。根據官方資料，刑事案件以1978年54.8萬起為基數，至1981年，平均年增加10萬多起。僅1979年8至10月間，北京、天津、上海就發生凶殺案99起，強姦案141起，搶劫案616起。

中央政府一直採取強硬政策，實施嚴打。1983年，鄧小平提出在全國開展第一次大規模“嚴打”。1986年3月，公安部明確把黑社會性質犯罪團夥列為最主要的三個打擊重點之一。當時在遼寧錦州破獲一起5人犯罪團夥，其中4人是鐵路公安民警和保衛幹部。這些人在8年時間內，結夥作案38起，而單位領導全然不知。1989年，深圳查獲潛入的港澳黑社會組織46個，成員280多人。1990年，中央政法委指出，“犯罪團夥急劇增多，並且愈益向黑社會組織演化”。1992年破獲台灣“四海幫”黑社會組織滲透案。1993年，公安部刑侦局成立有組織犯罪偵查處。全國政法機關通力配合，成功打掉黑龍江省“喬四”犯罪集團、

吉林省梁旭東黑社會性質組織。

2000年12月至2003年4月，摧毀河北省李建設、山西省宋魁祥、遼寧省劉湧、河南省宋留根、廈門賴星昌等犯罪團伙，同時，打擊境外黑社會組織滲透活動，像香港張子強、澳門葉成堅等犯罪集團。2006年5月全國打黑除惡專項鬥爭協調小組辦公室宣布，成功打掉吉林省桑粵春黑社會性質組織，該組織採用非法手段騙取銀行貸款2億元人民幣，揮霍其中1.7億元。

2009年7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發出《關於深入推進打黑除惡專項鬥爭的工作意見》，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嚴厲打擊黑惡勢力，強調要堅決防止黑惡勢力向政治領域滲透，鞏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中國公安部刑偵局局長杜航偉表示，公安部門先後打掉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900多個，鏟除惡勢力1.2萬多個，抓獲涉黑涉惡犯罪嫌疑人8萬多名，破獲各類刑事案件近10萬起。杜航偉坦白指出，當前中國的黑惡犯罪仍然處在活躍期。這類犯罪仍然嚴重破壞社會和諧穩定，影響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擾亂市場經濟秩序，危害基層政權建設。

那些“民營企業家”“以商養黑”與“以黑富商”，而有些地方甚至私自建立軍隊，以武力壟斷本地經濟，儼如當代軍閥。根據《現代漢語詞典》解釋，“軍閥”是指擁有武裝部隊，割據一方，自成派系的人。猶記得二十世紀民國時代，軍閥橫行，乃催生革命原因之一；到了二十一世紀，卻頗有死灰復燃之勢。

根據網上一篇題為“民兵淪為私人軍隊，下一步就是解放軍正規軍的私有化”文章，上海、浙江、福建、廣東、江蘇、山東等地的富豪黑社會招兵買馬，私建軍隊。規模小的幾百，多的達到幾千，包括退伍軍人、當地民兵和外地青年。各省市私人軍隊估計已經超過百萬，並且迅速增長。私人軍隊設備優良，軍紀嚴明，嚴禁士兵吸毒賭博嫖娼，而且戰鬥力強，甚至優於解放軍與武警部隊。

文章以浙江桐鄉的一支私人軍隊為例：浙江桐鄉市建築裝飾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長沈金木因建材市場搬遷，部分經營戶要求妥善安置，沈金木口出狂言：‘民兵、法院、政府我只要一句話好了，你們不服從，有你們好果子吃！’。

2009年4月10日，沈金木在桐鄉市崇福鎮個別領導和幹部的帶領下，指使上百名民兵武力搬遷。有一名六旬老人被打斷4根肋骨，十幾名百姓被打成輕微傷。雖然浙江省有關部門領導判定這是一起嚴重的違法政治事件，要依法嚴查，可是沈金木及行兇者至今逍遙法外。

黑惡勢力此起彼伏，儘管上有對策，可是始終無法根除，原因何在呢？

貧富懸殊

中國公安部刑偵局局長杜航偉分析黑惡犯罪存在多年，原因如下：一是中國正處在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特殊歷史時期，刑事犯罪持續高發，社會矛盾還比較多，滋生誘發黑惡勢力的各種社會消極因素大量增加；二是由於市場經濟管理體制的不完善，綜合治理存在著薄弱環節，還存在黑惡勢力滋生、發展的條件；三是受各種腐敗現象和不正之風的影響，少數黨政幹部腐化墮落，非常容易被犯罪分子腐蝕，成為黑惡勢力的保護傘；四是由於黑惡勢力犯罪的組織性、隱蔽性特別強，抗打擊的能力也非常強，打黑除惡工作存在法律武器滯後，專業力量薄弱，保障不到位，機制不健全等等。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提議：打擊黑惡勢力需要一個長期的標本兼治的過程，公安機關要培養一支高效、科學的打黑隊伍，在經濟領域中黑惡勢力能夠滲透，是經濟領域中的一些規章制度還不完善，經濟的監管力度還不完善。”

旅美的中國政治評論員陳破空向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網分析，中國黑勢力如此囂張的原因，一是中國發展過程中過分強調經濟，吸引黑道介入經濟領域；而發展經濟要借助權力、官商勾結、權錢交易，使黑惡勢力有機會滲透到政治

領域。其次，中國法律制度不健全，沒有獨立的司法體系，三是中國政府主動引進黑社會。

不論政府官員、大學教授，或者境外評論員均從經濟與司法分析黑惡勢力猖獗，可是他們卻沒有指出這是“具有資本主義特色的”經濟與司法。19世紀的馬克思早就批判說，資本的屬性是不斷追逐利益，公共財富向少數人集中，趨向壟斷，最終造成社會貧富懸殊，就像《共產黨宣言》(1848年)一針見血：“資產階級……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而這種由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與剝削所形成的社會貧富懸殊則靠各種勢力維繫，可以是披掛合法的外衣的勢力，命名國家規章制度，也可以是不合法的勢力，所謂黑惡勢力。因此，只要遵循資本不斷擴張的邏輯，不論小至一國之內的合法／黑惡勢力，或者大至一國出兵侵略他國，都必然造成一國以至全球的貧富懸殊。

因此，黑惡勢力滲透的網絡，亦即資本存活的網絡。看來要消弭黑惡勢力，不得不抓住源頭：資本主義。動員警力鎮住黑惡勢力，僅是治標不治本，若要長治久安則不能走資本主義的道路。



引用資料：

- (1) “全國‘打黑辦’負責人就打黑除惡專項鬥爭答問”，2006年5月25日，中新網，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MATERIAL/1219699.htm>
- (2) “公安部：少數黨政幹部腐化墮落成黑惡勢力保護傘”，2009年05月19日，中新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legal/2009-05/19/content_11401089.htm
- (3) “中國要求各部門嚴防黑惡勢力向政界滲透”，2009年07月31日，
<http://dailynews.sina.com/bg/chn/chnoverseamedia/cna/20090731/0931527205.html>
- (4) “中國強調防止黑惡勢力向政界滲透”，英國廣播公司(BBC)網站，2009年7月30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8170000/newsid_8177500/8177517.stm
- (5) “重慶市司法局長涉嫌嚴重違紀被查，或與涉黑有關”，中國新聞網(北京)，2009-08-08。
- (6) 李定凱，“重慶打黑肅貪反腐鬥爭的標本意義”，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910/107301.html>
- (7) 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重慶鏟除經濟毒瘤》，10月17日，
<http://news.sina.com.hk/cgi-bin/nw/show.cgi/9/1/1/1298516/1.html>
- (8) “薄熙來首陳打黑初衷：黑惡勢力逼得我們不得不出手”，2009年10月17日，中國新聞網
http://big5.ce.cn/xwzx/gnsz/gdxw/200910/17/t20091017_20216604.shtml
- (9) “社評：黑惡勢力活躍期 中國打黑須有方”，2009-10-17，<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人爲的水患 破謎



近三十年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但付出沉重的代價之一乃環境日益惡化。北京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曾經指出，中國現在面臨著水的挑戰，包括缺水、水污染、水資源破壞等。北方缺水很嚴重，很多城市因地表水的枯竭，超度開採地下水，已經處於不可持續的狀態。南方雖然水資源豐富，但是水污染十分嚴峻，以至缺乏飲用水。全國有三億多的農民的飲用水是不安全的，五分之一的重點城市的飲用水源地的水質也達不到標準。中國600多的城市中有400多個城市存在缺水，32個特大城市中30個面臨缺水。

關於水患的新聞多不勝數，例如最近廣西新聞網〈南國早報〉報導（2009-09-27），廣西壯族自治區農業與廢水污染嚴重，目前還有飲水不安全人口1900多萬。該區農村中小學校發生的腸道傳染病疫情80%以上是由於飲用水污染引起，農村中小學校飲水安全存在較大安全隱患。

專題調研組發現，該區農村飲用水環境差，村莊環境“髒、亂、差”問題突出。全區農村每年產生生活污水4.4億多噸，生活垃圾約600萬噸，而大部分農村供排水、生活污水及垃圾處理等基

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後，“污水靠蒸發，垃圾靠風刮”等現象普遍。

再者，目前全區農作物單位播種面積的農藥、化肥使用量均超過安全使用標準，而化肥利用率為30%左右，農藥利用率為30%~40%，大部分流失進入水體和殘留在土壤中，造成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目前全區畜禽養殖污水年產生量約6億噸，佔廢水（工業、生活、養殖）總排放量的22.2%，已成為主要水源污染。

相隔兩天，《中國環境報》又報導，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隆安縣環保局接到群眾反映，右江百色平果與南寧隆安交接斷面雁江，有野生魚類浮頭並有少量死亡。經查實，平果縣凱特酒精有限公司未經環保部門同意，擅自在生產原料中摻加糖蜜，又私設排污暗管，將未經環保設施處理的超標酒精廢液共計800噸通過暗管排入溶洞，通過溶洞排入右江，導致右江水質惡化。

當地環保局根據《水污染防治法》有關規定和《規範環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若干意見》，對該公司開出廣西史上最大的罰單，總額為62.511萬元，同時做出責令公司立即停止向溶洞排污、

停業整頓和拆除暗管等行政處罰。

生態環境遭破壞，老百姓生活遭殃，都迫逼在高位者不得不正視。早在兩年前，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2007年07月06日），公開呼喊：“水污染已經逼近危險臨界點”、“治水不力將是我們的失職”。潘岳指出，目前中國7大水系的26%是五類和劣五類，9大湖泊中有7個是五類和劣五類。五類和劣五類水不能接觸人體，連農業用水也不能做。換言之，7大江河除了幹流因水量大水質尚可之外，大小支流幾乎全部壞死，80%的湖泊的水也全部壞死。“如果不能有效地治理水污染，我們恐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完成之前，就將面臨嚴重的社會和諧問題。”

潘岳分析水患的原因：一是工業園區環保評估、“三同時”（按《環保法》規定：“建設專案中防治污染的設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使用”，即‘三同時’制度）執行情況差，存在未批先建、越權審批、越級審批的情況。在檢查的126個園區中，有110個工業園區存在違規審批、越權審批、降低環評等級和“三同時”執行率差的問題，佔抽查工業園區的87.3%。比如山東省莘縣工業園區共有項目30個，其中19個未履行環評手續，環評執行率僅為36.7%；應完成“三同時”驗收的專案11家，實際驗收0家，環保“三同時”驗收率為零。

二是城鎮污水處理廠運營不正常、處理能力低、管網不配套或超標排污。在抽查的75家城鎮污水處理廠中，有38家運轉不正常、超標排污或停運，佔抽查污水處理廠的50.6%。河北省滄州市運東污水處理廠設計處理能力10萬噸/日，實際日處理污水僅3萬噸，其他4萬噸工業和城市生活污水未經處理直接排入滄浪渠，是造成滄浪渠水質污染的重要原因。

三是結構性污染突出。比如陝西渭南市韓城市龍門工業園共有工業企業35家，僅焦化行業就有20家，佔57%以上，近半數企業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

四是一些企業違法或超標排污，在檢查的500

多家企業中，有200多家企業存在違法或超標排污的情況，約佔被抽查企業數的50%。

五是一些企業無治污設施，直排廢水，行為惡劣，性質嚴重。比如在山西、內蒙古檢查的63家企業中，有15家無治污設施，佔被抽查企業的24%。

六是養殖等面源污染加重了水體的水質污染，比如太湖藍藻大量繁殖，嚴重影響了無錫市的飲用水源。

根據北京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兩年前的分析，太湖藍藻污染事件不是自然災害，當地污染源必須擔負起責任。太湖流域內有超過三百家污染企業，包括化工、印染、電鍍、制藥等高風險企業，在這些違反環境法規的企業中，既有規模不大但污染嚴重的鄉鎮企業，也有像均瑤乳品集團公司、常柴股份有限公司、正丹集團等國內知名企業，甚至還有無錫夏普電子元器件有限公司、蘇州三星電子有限公司、蘇州市迅達電梯有限公司等跨國企業。馬軍直斥其非：“世界工廠的後院到頭來就會成為世界的垃圾場和下水道。”

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寫的文章《論社會主義生態文明》（2006年）明確點破：“資本主義制度是造成全球環境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生態危機成為轉移經濟危機的新手段”。

潘岳分析，中國出現生態危機，根本上是因為中國經濟現代化模式是複製於西方發達國家。中國20年內實現西方國家100年的經濟成就，卻也在20年內集中引發西方100年的環境問題。中國在創造GDP增長速度第一、外資引進第一的同時，也成為煤炭、石油、鋼材消耗第一、二氧化碳排放第一、COD（化學耗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簡稱COD）排放第一。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發達國家通過產業轉移對發展中國家實行生態殖民主義；而在中國，東部的污染轉移到西部；城市的污染轉移到農村；富裕人群消費、貧困人群來承受生產的污染。他直斥“中國某些幹部不正確的發展觀與政績觀所帶來的社

會不公平與環境不公平，違背了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結果，脫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結果。”

潘岳論述現行的綠色運動產生於對西方工業文明的反思。西方工業文明的產生與發展，雖然有宗教改革、文藝復興、科技工業革命等諸多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拓展海外殖民地，使發達國家大規模地轉移本國的經濟社會矛盾。資本主義爲了保證這種“轉移”的順利進行，就需要制定維護自身利益的一系列國際規則，生態問題是明顯的例證。發達國家只有全球 15% 的人口，卻佔有85% 以上的資源；他們提高本國的環保標準，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大批高耗能高污染產業，設置一系列綠色壁壘，減少承擔生態責任。

潘岳解釋，綠色運動者們認爲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雖然在政治上尖銳對立，但在完成工業化的模式上基本一致，都是西方工業文明經濟學的產物。他們認爲社會主義的本質追求更符合生態社會的內涵。社會主義較之資本主義，除了生產力外，更追求公平正義、更講道德誠信、更能帶來人的全面發展。尤其是在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分配平等、基層民主等方面，綠色運動者們與社會主義者更能說到一起。

潘岳指出，蘇聯東歐變局後，新馬克思主義者發現生態問題正是揭露資本主義制度、團結社會主義者的天賜良機。他們從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出生態觀點，例如“自然主義等於人道主義等於社會主義”的三位一體學說；例如“人與自然的關係就是人與人的關係，正像人與人的關係是人與自然的關係一樣”等和諧社會學說；再例如“我們這個世界面臨兩大變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自身的和解”等等。他們將世界生態危機歸咎於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又提出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來批判純粹的經濟理性。因此，生態運動與社會主義者們開始團結，很多原共產黨員和左翼人士都參加進來，政治上被說成是“紅綠結盟”，思想上就被說成是“生態社會主義。”

潘岳身爲國家環保總局高級官員公開直斥資

本主義不是，一方面反映上層十分重視生態危機，另一方面也反映資本的邏輯依然佔據中國的主流社會。現行的環保政策十分被動，即奉行十分流行的說法“先發展，後治理”，僅求防治與約束企業，可是，資本的屬性乃不斷生產與擴張，作爲其表徵的工業化與城市化必不斷損耗自然資源以爲繼之，故此，只要一天還做世界工廠，維持出口導向的工業政策，追逐GDP上升，那麼就不可能扭轉現行的生態危機，這也是環保政策沒法貫徹，只能稍作一點修修補補的根本原因。

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乃西方左派從經濟以外的角度，特別從文化的視角，批判資本主義及工業文明。其實，在19、20世紀，亞洲的思想家與社會活動家，例如印度的甘地與中國的儒佛兼信者梁漱溟，已展開批判“野蠻的”西方文明，稱西洋社會乃個人本位，講究私利與競爭，而他們不約而同地說明人之爲人乃克己謙讓，著重情義，並推動以“非武力”或“禮／理”作爲改造社會的力量。中國傳統思想也教導人不可貪婪，像老子《道德經》說人之貪婪，遺禍天下：“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道德經》第二十九章），又“禍莫大於不知足”（第四十六章）。簡言之，重新詮釋與激活古人的文化思想，對人類的未來發展將必有所裨益。

歡迎郵購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10144 號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一卷)	劉家良等著	30 元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二卷)	曼德爾等著	30 元
彭述之選集(第一卷)	彭述之著	30 元
彭述之選集(第二卷)	彭述之著	45 元
彭述之選集(第三卷)	彭述之著	35 元
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前因後果 ——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	彭述之著	6 元
毛澤東思想論稿	雙山著	30 元
我的回憶	陳碧蘭著	30 元
記尹寬	鄭超麟著	40 元
馬克思主義與第四國際	曼德爾著	30 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一卷)	兆立譯	40 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二卷)	兆立譯	40 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三卷)	兆立譯	40 元

新疆騷亂與民族自決權

軍行

新中國建立以後，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日趨嚴重，少數民族人民的示威騷亂時有發生。以近年的事件為例，去年3月西藏等地爆發了示威騷亂，軍警開槍鎮壓，造成逾300名平民死亡；同年4月的四川藏人示威，又有8藏人被軍警槍殺。同月7日，一名維吾爾族少女攜汽油從烏魯木齊上機，企圖中途炸毀赴京的飛機，同歸於盡，後來被機上人員制服，等等。

新疆又爆發騷亂

但有壓迫就有反抗。統治者的鎮壓，並不能阻止少數民族的反抗。今年7月5日，新疆烏魯木齊市維吾爾族又爆發大規模騷亂，上萬人上街示威，放火燒車，大肆破壞，與漢人毆鬥；其導火線是抗議4月26日在廣東韶關港資玩具廠工作的800維吾爾族工人被該廠2千漢族工人毆打，導致兩名維族工人死亡，100多人受傷，傷者大部份是維族人。

7月5日烏市的維族人騷亂，官方公布有184人死亡，內有漢人137名，維族人46名，回族人一名；而世維大會則指死者多達600人，逾800人受傷，有9成死者是維吾爾族人。

這就使漢維兩族人民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升級。7月6日數千漢人組織自衛隊，手持刀斧等武器，上街示威，大肆破壞維族人商店，見維族人就打。當局開進大批武警部隊，阻止雙方再流血衝突，同時搜捕維族男子，部份維人遭到起訴；第一宗審訊便有8人被判死刑（內有一漢人），3名維人被判死緩，一些人則判有期徒刑。

除首府烏魯木齊外，新疆一些城市如喀什、伊犁等地也引發維人上街示威。在當局鎮壓後，一些維族人用針刺傷漢族婦孺作為報復。

香港記者也遭殃

當地武警公安等平日任意壓迫少數民族人民，肆無忌憚，無法無天。從武警對待前去採訪

的漢族記者的以下行徑，便多少可反映他們對少數民族人民的殘暴態度：

「香港新聞工作者黃嘉瑜八月二十日在四川準備採訪維權人士譚作人案時，被四川公安誣陷涉嫌藏毒，阻撓她前往採訪；在九月四日，再有三名香港新聞工作者林子豪、劉永全及林振威在新疆烏魯木齊市進行正常採訪時，被當地武警毆打和拘留，其後更被誣陷為指手劃腳，煽動群眾。」

以上是香港記者協會和香港外國記者會在報章刊登的聲明所指出的最新事實。聲明跟着提出：

「我們一群香港新聞工作者和新聞系師生，絕對不能接受這個粗暴阻撓採訪、公然踐踏新聞自由及指黑為白的行徑，並就此提出嚴正抗議和強烈譴責。」

最後，他們提出四點要求：

- 1、四川、新疆政府必須全面調查事件真相，公開澄清記者並沒有犯法，還記者清白。
- 2、四川、新疆政府必須懲罰事件中犯錯的官員，並停止一切打壓採訪自由的行動，公開承諾尊重新聞自由。
- 3、上述省市的做法，不單止有損國家開放政策，亦反映要求境外記者須要事先申領記者證到內地採訪的規定不符合新聞自由的精神，促請中央政府撤銷有關規定。… …

儘管當局採用鎮壓手段把騷亂平服了下去，但維族等少數民族與漢族，尤其是與中共統治層之間的矛盾不僅沒有解決，前者對後者的不滿和怨憤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更加深加劇，以後還會時常起來反抗、鬥爭。其基本原因在於中共在統治中國後，始終不肯效法列寧領導的布爾塞維克黨實施的民族政策，給予國內少數民族以自決權。

列寧主張的正確性

中國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儘管名義上稱為「自治區」，但並無自治之實，嚴格地控制和管治他們的，始終是北京派來的中共黨委書記及其行政

首長；即使部份選派少數民族人爲行政首長等，他們也幾乎都是効忠和聽命於中央的中共黨員。

內地少數民族有1.06億人，佔全國人口的8.41%，少數民族聚居地佔國土總面積64%。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是內地最大的自治區，人口2100萬人，維吾爾族佔900萬人，佔總人口的46%，哈薩克族有138.16萬，佔總人口的7.04%。新疆與內地的貧富差距仍很大，全國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每年可支配收入爲20667.9元，全國最低爲新疆，每年8871.3元，人均收入差距2.33倍；新疆當地城鄉居民年收入相差5508元，貧富差距也在加大。（2009年7月7日《明報》報道）

漢族人民長期來不斷遷入新疆等自治區，人數日益增多，操控着當地的主要經濟命脈。當地雖然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例如石油的儲存量很豐富，但當地少數民族人民卻依然貧苦。

在維吾爾族（以及其他少數民族）人民看來，並且也親身體驗到：他們是被大漢族官員所統治、欺壓，甚至宗教自由也被干擾，因此產生脫離漢族而獨立的要求，從而有所謂「疆獨」、「藏獨」、「東突」等組織，進行獨立的運動。

對於解決國內少數民族問題的正確而有效的

途徑，筆者在評論去年3月的西藏等地騷亂時，曾撰文介紹列寧在俄國實行民族自決權的政策。他在1914年寫的《論民族自決權》一文中指出：無產階級「承認各民族平等，承認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國家的平等權利。」「一個國家的民主制度同分離自由的完全自由越接近，在實際上要求分離的願望也就越少越弱」。

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前，已多次撰文宣傳民族自決權的必要，並寫入黨綱之中；在領導十月革命勝利之后，新的國名定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由15個加盟的蘇維埃共和國組成，可以各自決定加盟或分離，這是布黨黨綱中境內「少數民族有自決權」主張的落實。（詳見《十月評論》2008年第一期《西藏等地騷亂及其解決之道》一文。）

由於中共不肯採取列寧所實行的民族自決權主張，加劇了境內少數民族怨憤的累積，時常被迫起來抗爭。要消除少數民族的反抗、騷亂，就必須讓他們享有自決的平等權利，從而達到互相融洽、共同構建和諧的社會。這是從馬克思到列寧所主張的政策。

2009年10月1日



摘錄大陸順口溜數則

民聲

最近大陸網上流行順口溜，內容多嘲諷官員與針砭時弊，現摘錄數則如下。

(一) 嘲諷官員

黨國領導

打麻將三天五天不累，
喝茅臺三瓶五瓶不醉；
下舞池三夜五夜不睡，
幹正事三年五年不會。

新三大作風

密切聯繫領導，
理論聯繫實惠，
表揚與自我表揚。

貪官心態

有權不用，過期作廢；
勞苦應該，撈點應該；
無人監督，渾水摸魚；
升官無望，多勞多得；
行將退休，揩上浮油；
傍住大款，分一杯羹；
貪圖享受，金錢至上。

官僚機構有十怪

八點上班九點來，品茶看報好自在。
好煙見抽不見買，革命水酒把胃壞。
樓堂館所爭著蓋，小車牌子認老外。
成天文山加會海，哪里熱鬧哪里在。
遇事研究慢等待，坐在岸上玩下海。

四清四不清

開啥會不清楚，開會坐哪清楚；
誰送禮不清楚，誰沒送清楚；
誰幹得好不好不清楚，該提拔誰清楚；
和誰睡不清楚，睡覺幹什麼清楚。

幹部不學習

讀書讀個皮兒，看報看個題兒。
文件看大意，過後鎖在抽屜裏。
不看書不看報，跟著感覺湊熱鬧。
經商僅看《胡雪岩》，作官僅看《曾國藩》。

工作就是喝醉，
聯繫就是行賄，
公關就是陪睡。

只吃不帶，作風正派；
又吃又帶，不算意外；
不吃不帶，才算意外。
生命在於運動，提升在於活動。

要想有進步，常去組織部；
要想被提拔，常去領導家。

年齡是個寶，文憑不可少；
德才做參考，後臺最重要。

大吃大喝作報告，
小吃小喝作檢討，
不吃不喝聽訓導。

當官靠後臺，掙錢靠胡來。
真理在報上，清官在戲臺。

各部不同

跟著商業部，發財又致富；
跟著外貿部，準成萬元戶；
跟著統戰部，處處有照顧；
跟著鐵道部，出門坐臥鋪；
跟著組織部，年年有進步；
跟著宣傳部，越幹越糊塗；
跟著教育部，肯定沒出路；
跟著國安部，腦袋保不住。

(二) 針砭時弊

同志情誼

50年代人幫人——比學趕幫；
60年代人整人——階級鬥爭；
70年代人防人——萬馬齊喑；
80年代各人顧各人——人心渙散；
90年代見人就宰人——惟利是圖。

廠長書記漂洋過海，科長股長深圳珠海，
車間主任五湖四海，一線工人刀山火海。

不正之風面面觀

貨不怕假，回扣則靈；
飯不怕貴，公款就行；
學不在深，有爹就靈；
分不在高，後門就行；
調動不難，送禮就靈；
獎狀不在大，發錢就行。

全民皆兵

要想富，請上路，搶劫也有專業戶；
復員哥哥組隊伍，搶了水路搶旱路，
搶了公路搶鐵路，一路搶進城裏去；
刀子下麵出金庫，司令就在黨支部！

對聯：

上級壓下級，一級壓一級，
級級加碼，馬到成功；
下層蒙上層，一層蒙一層，
層層摻水，水到渠成。
橫批：和諧社會。

巧立名目

遊山玩水稱考察，亂吃亂拿稱檢查，
錢權交易稱下海，亂賣戶口稱開發，
公費讀書稱投資，亂戴烏紗稱提拔，
截留公款稱獎金，偷漏稅費稱辦法，
造成損失稱學費，易地為官稱處罰。

百姓語錄

狠抓就是開會，管理就是收費，重視就是標語，
落實就是動嘴，驗收就是宴會，檢查就是喝醉，
研究就是扯皮，政績就是神吹，彙報就是摻水。

這年頭，到處都是錯別字：

植樹造零〔造林〕；白收〔白手〕起家；勤撈
〔勤勞〕致富；擇油〔擇優〕錄取；得財兼幣
〔兼備〕；檢查宴收〔驗收〕；大力支吃〔支
持〕；為民儲害〔除害〕；提錢〔提前〕釋放；
攻官〔公關〕小姐。

十五等人

一等人，掌實權，批條畫圈就來錢；
二等人，是官倒，倒了批文倒指標；
三等人，有後臺，弄點名堂就發財；
四等人，大蓋帽，吃了原告吃被告；
五等人，交警隊，馬路旁邊吃社會；
六等人，管車船，馬達一響就要錢；
七等人，當導遊，年年月月吃回扣；
八等人，幹個體，宰了老張宰老李；
九等人，當電霸，不給好處就抽閘；
十等人，手術刀，拉開肚皮要紅包；
十一等人，管收稅，不塞票子你倒楣；
十二等人，是教師，一年四季欠工資；
十三等人，老大哥，工廠關門沒吃喝；
十四等人，作田佬，交了糧食收白條；
十五等人，是盲流，不知何處是盡頭。

“怕”字歌

商怕奸，官怕貪，企業怕的爛攤攤，
不怕職工心不安，就怕頭頭沒心肝；
筍怕剝，肉怕割，經營怕的伸手多，
不怕稅局來上稅，就怕都來亂收費；
男怕亂，女怕賤，夫妻怕的把心變，
不怕家裏沒有錢，就怕有了婚外戀；
相怕扮，貨怕贗，顧客怕的受欺騙，
不怕假貨不能用，就怕假貨要人命；
戲怕髒，片怕黃，影視怕的亂上床，
不怕大人看做愛，就怕小孩也學壞；
醫怕黑，藥怕貴，百姓怕的醫療費，
不怕偶爾把病害，就怕醫院刀子快。



【無常行】 之 顛覆記

伊藥

廿萬人不忿的晚上
我把您的「顛覆本證」字字如光的接到手上
(註)

整本是厚耷耷

人卻心沉沉

我們這處小刊物也曾大字標題：

《不義便要顛覆》

氣如虹且準備捨身力反

第二十三條

君今檄文八百篇揀出罪字三百五

無一語顛覆

換得再次向未來家國

牢底精忠日月十一年 坐它個真的朗天

是啊 您祇字字指明曰

但明日有變他也怕

我們唯有堅信

他們終將全部怕死於 明日

必然光臨的最暗一刻

零玖年己丑冬至後耶誕翌晚

(註) 二零零九年「六四」廿週年晚會場旁聯
署救人後，得《開放》雜誌執行編輯張詠梅手
贈《零八憲章》一書。

之 烈妻記

——致王慶華與劉霞

終於得長見識

那貨式普通的家電批發店員是妳

妳是從平日燒菜燒出來的戰士

並且

談做人竟談出祇剩作戰士一途

老百姓長吃豆腐但渣滓祇許省下

不餵豬 你們那崽拿了去幹甚麼

人人長了見識

妳原來在牢裡成親

麻木慣了的以為是說戲文劇情

以為米面夫妻天下無啥事值得幹

不碰他幹事的電腦但妳寫了詩

這年血憶六月動筆——

《那片空地》《失眠》

悠着的人得記着：

兩位來日多艱決不滴淚的女子 和光永存

一如遠古的第一位她

零玖己丑冬至後閏判與待判

之 巨人記

巨人 你畸型發育的軀體倒下時
可曾使早已斷流的江河
再流腥臭的血污
你向孩子餵毒
三聚氰胺毒不死他們每日長大
青頭娃娃頂着大頭症做人
個個都信大頭崛起
人人都在遊戲
愛各愛自己的獨角
你終於明白可以更狠印鈔
祇要死控着外方同樣印出來的鈔

外方便來膜拜與服役
便認命受箝制
巨人 你很快發現快樂的墮落
因為有即效的墮落性快樂
巨人 你巨無畏巨虛無
但你無法不倒下 讓曾有過的美好說法
包裹不了屍身

玖己丑冬至後將遊行

海棠葉

伊藥

——給久疏的同志們

我把記掛的海棠葉
展開 並說
誓不反心
雖然知道，無數的惡蟲背裡正在飽噬
葉殘將盡

妳着實吃了一驚
忙不絕口這句不引用
情況 其實大家都已心裡有數
大家 就這樣有數了六十年
有些詞兒提不得
春睡夏暍秋閒冬眠就此沉沉
怎個苦字了得

我把海棠葉悠悠展開 凝視
千年百年歲月
妳嚥聲 （暗吞聲）
惟勞看顧她
看她紅褪恨無香成永憾
人花兩茫茫

餘事留空字
恨史迷身份
還能說甚麼

妳是一代慧黠
請接去祇餘葉脈脆化的
不可預知未來
以慰我的不能瞑目
莫失莫忘不離不棄

是問天不語後 的
囑咐
我們終將持節向前遠去
餘穗獵獵拂揚
原來是
回首 再
回首

二千零九年九月九 夜何其久
翌未曙天完稿

(轉載)

林希翎北京追思會 在當局重壓下如期舉行

鐵流

林希翎北京追思會今天（2009年10月18日）在北京鬧市區中心工體北路天下鹽餐廳（凱富大廈後面）如期舉行，參加者近百人，除57難友外，還來了不少青年學者和知名人士。在會前的十天由鐵流先生出面預訂了80人的桌席，並交了1,000元的訂金。為使追思會能預期舉行，負責此次會議的朱毅、王書瑤、鐵流三人，約定不打電話、不發郵件，用口頭和書信形式通知相關人士。以為這樣很保險，沒有想到在會前四天有關部門即瞭若指掌，他們通過公安、維穩辦、居委會告知參會人員不能前去，並對朱毅、鐵流實行重點監控。

到了16日下午鐵流先生所在地區維穩辦正式通知鐵流不能去，並明確表示要派人守候。為此，鐵流先生不得不在17日上午離家住在賓館中，以確保按時到會和完成所負工作，並用賓館電話告訴各方：當日8點到會，縱坐牢砍頭也不退縮！

鐵流再三表示：“林是右派，我是右派，為一句話一篇文章，毛澤東整了我們一輩子，直到今天當局不向我們道歉，不補發工資，不進行賠償，連我們用眼淚、用哀思來悼念難友都不准許，真是欺人過甚！

為了尊嚴與人格，我不後退半步，必須支持參加這個追思會，送林希翎一程！”凡接到電話的人，都憤然表示堅持參加！

18日早晨8點，鐵流與遠道而來的難友熊習禮（四川雅安）、吳興勇（湖南長沙），從賓館趕到天下鹽，可是大門深鎖，門上貼有物業管理通知：社區檢修水電不營業。最先來到的難友李家駿被拒之門外，並告知四周全是布控的便衣。鐵流一笑：“管他的，我們又未違法怕他什麼？找得多一陣才找上店主易先生。易十分抱歉說：社區臨時檢修水電不能營業，請換地方。”

鐵流不露聲色說行，“你打開門待我們人來後另找地方。”進得店後，店家將門鎖上而去。參會的人陸續來到擁在門外等候。鐵流一行四人卻鎖在門內已達35分鐘，店家藏躲不露面。鐵流踢門聲言店家違法，要報警。熊習禮則依次搜索，最後找到店家，表示到另一處去，但請開門。店家打開門，鐵流等人即把持大門，請擁在外面的參會人員火速進店。進店後，大家就在無燈光的一間靠窗戶的房裡，拉上“林希翎北京追思會”的巨幅橫幅和林希翎遺像以及15塊展版，並向參加追思會人員每人發一枝白菊花。

人越來越多，氣氛越來越重，可四周全是布控便衣。開會前鐵流提議：“歡迎國安、公安參會，看我們有無顛覆國家的言行？有無違憲活動？”在熱烈的掌聲中便衣終不露面，並悄悄遁去。

追思會在9點如期舉行，由北大“5·19”右派學生王書瑤主持，中央黨校杜光致開幕詞，接著宣讀錢理群、陳奉孝、譚天榮的追思文稿，接下來是張志新的妹妹、楊佳的辯護律師和原國務院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姚監複、北大教授李林、民運人士陳子明、高瑜、伍修權女婿、崔衛平、美國趕來的黃肖璐等十多人先後在會上作了發言。

正如姚監複先生說：今天的追思會是在一遍黑暗中召開的！這是民主的勝利！人權的勝利！正義的正義！

會議進行到11點，店主迫於壓力，數度要求摘下橫幅，移開遺像，近而哀求說：你們不怕我們怕，我們是做生意的呀！大家諒解店家苦衷，同意這樣做了。但追思會繼續開，直到下午2點結束。

〔原載《參與》2009-10-18；<http://crd-net.org/>〕

中國：新武器，新地位 — 新的泡沫？

彼得·曼



多年來第一次，北京舉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的閱兵慶典。胡錦濤主席在天安門檢閱了最新的武器裝備。無人駕駛飛機、巡航導彈、核導彈通過檢閱台，官方評論強調，這些武器不僅是中國製造的，而且是中國設計的。

該消息再清楚不過了。即今年早些時候公開揭示了其第一艘核潛艇的中國，仍可能稱自己為“發展中國家”，但它已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力量。這不僅是軍事硬體或軟體問題。西方認識到，20國集團已取代7國集團成為全球主要的經濟論壇，實際上，是它認識到中國的新興經濟影響力。

似乎為了證實這一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6個月預測，同北京自己的預測一致，預期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9%。9月中旬，國家統計局的報告稱，8月零售銷售增長15.4%，工廠產量增長12.3%。像這樣的數字，同帝國主義的主要經濟體美國、歐盟和日本形成非常尖銳的對比，促使索羅斯認為，中國現在可以成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之一”。

事實上，中國已經是這樣的發動機。但是，它是否能拉動世界其他地方，則是另外一個問題。首先，許多經濟學家懷疑中國的統計資料，因為其過去的紀錄並不良好。例如，去年4月的GDP資料還顯示一個同期增長7.3%的年份，但該段期間發電量下跌3.5%，出口下降22%，而外來投資下降21%。

同樣，官方數位顯示，頭6個月城市居民的收

入增加11.2%。這個數字離大眾的經驗是如此遙遠，以至於官方的報紙，人民日報也提出過質疑。這種差異通常表明，作統計資料的部委，經常修飾資料，把自己部門的功勞最大化。

毫無疑問，這些情況過去發生過。去年，現在仍可能發生。雖然誇大經濟增長有時可能在政治上是有用的，然而政府本身，更不用說資本主義企業，最終還是需要制定政策所依據的準確數字。在某種程度上，問題起源於過去的會計標準，這些標準則傳自於官僚計劃經濟。於是，“城鎮收入”是（國有）企業工資的衡量，幾乎包括全部就業。用於今天的這個數字，把按GDP（國內生產總值）計算的經濟的65%的私有經濟排除在外。因此，根據定義，血汗工廠及建築工地流動工人的往往是微薄而可憐的工資並沒有納入計算。可是管理人員和官員的薪金卻被包括在內。

不管它們的絕對準確性如何，分析一系列時間上的GDP（國內生產總值）數字，給我們一個關於這個經濟相對表現的清晰指示。最近的數位，記錄了政府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畫的影響，其金額大約相等於四千億英鎊，生效於去年11月。如此規模的支出，對於估算商品和服務總開支的指標，必然產生一個重大的正面影響。然而，比年增長率數字更多意義的是經濟內部的消費問題。

北京宣稱的目標是，通過增加內地基礎設施建設，刺激消費，從而幫助抵銷出口的急劇減少，所以經濟刺激方案應會使經濟重新獲得平衡。最新的數字確定地表明，“固定資產投資大幅增長”，比去年同期增長33%。但是，正如溫家寶總理在9月初的世界經濟論壇上表明的，“中國經濟的回升是不穩定的，不平衡的，還不穩固”。他的意思，由北京的國慶招待晚會上的一項政府聲明清楚地表達了出來。太多的投資已經用在擴大生產能力上，而不是產品本身。這些開支可能

加劇導致危機的問題。

政府已經對開辦新鋁冶煉廠頒佈了三年的完全禁止令，並譴責在鋼鐵和水泥行業上的“盲目擴張”。金融時報援引政府聲明，稱“一些地區非法行事，允許違反規定的工程，或允許工程獲准以前就開工的做法。”這證實了這些文章在3月作出的預測，“北京希望的並不一定是北京獲得的。雖然許多最大的公司仍是國有的，但它們不再受任何計畫調節，很多會追求它們的優先利益。”（《工人力量》，2009年3月）各個工業部門的嚴重過剩的結果，是北京擔心的，因為，如果中國生產商在世界市場上拋售產品，將導致國際局勢緊張。

金融部門的情況同樣存在問題。國內生產總值數字顯示，北京鼓勵的銀行貸款大量增加，為經濟刺激計畫的很大一部分提供資金。然而，寬鬆的信貸，也助長了房地產市場和證券交易的投機泡沫。上海證交所已經從去年以來的最低點上升了100%。根據彭博，在7月的一個星期，開立了50萬個新帳戶。收費公路運營商，四川高速公路，在其10月交易的第一天，股票價格漲了三倍，提供了一個市場氣氛日益狂熱的印象。

零銷售數字增加15.4%，這也須要仔細審查。乍一看，這似乎證實了北京達到了其增加消費的目標。然而，在中國，“零售”不同於“消費者銷售”。這些數字包括政府採購，因此，也反映了經濟刺激計畫的影響。來自消費零售部門的數字表明了低得多的，5%或6%的增長速度。

究竟應怎樣理解經濟統計數字？當然，經濟活動已恢復到相當程度，這最終反映了中國仍然是一個相對年輕的資本主義經濟。美國背負著過度積累的資本，其龐大的政府舉債基本上被用於銀行的資本重組，與美國不同，總是可以期待中國經過幾年的經濟衰退後，新的經濟週期的開始，中國會恢復增長。不過，在國家消費和放鬆信貸條件或延緩老式資本的破壞的意義上，他們將拖累延長復蘇過程。

政治上，這些數位背後的事態發展顯示，儘

管是個獨裁政權，共產黨卻遠未完全控制一切。資本主義的復辟必然地創造了一個新的資產階級，並且請回臺灣和香港的華人資本家。這個階級絕不是該政權的挑戰者，事實上，它依賴該政權維持利潤，但它顯然有其自身的利益，而這些利益並不總是與黨一致的。

最近的投機泡沫的快速發展很清楚的說明了這一點。共黨會如何反應，這還有待觀察。如果讓炒家繼續下去，那麼，當泡沫破裂時，它們可能會使整個經濟戰略脫軌。

另一輪的公司破產，當復蘇仍然無法自我維持時，再次緊縮信貸，這些當然會有超越上海和深圳的炒家隊伍的影響。但是，北京可能計算的是，通過例如稅制改革這樣的措施迅速刺破泡沫，不只是保障經濟，但也會使不夠愛國的資產階級名譽掃地。

最後而更重要的是，過去10年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也形成了迅速增長的工人階級，它也已經開始維護自己的利益。今年早些時候中國勞工通訊公佈的一個關於中國工人運動的研究¹，不僅詳敘了工人階級騷亂的規模，僅在2008年就有127,467起“群體性事件”，而且也增加了官方工會內部和獨立工會的工作層面的組織。

從歷史上看，新一輪經濟週期的早期階段往往鼓勵工人積極檢討在經濟衰退中損失的是什麼。在中國2006年蓬勃發展的高峰時，針對通貨膨脹和勞動力短缺，工人能夠迫使工資上漲，但在過去兩年，他們受害於失業率的急劇上升和生活水平的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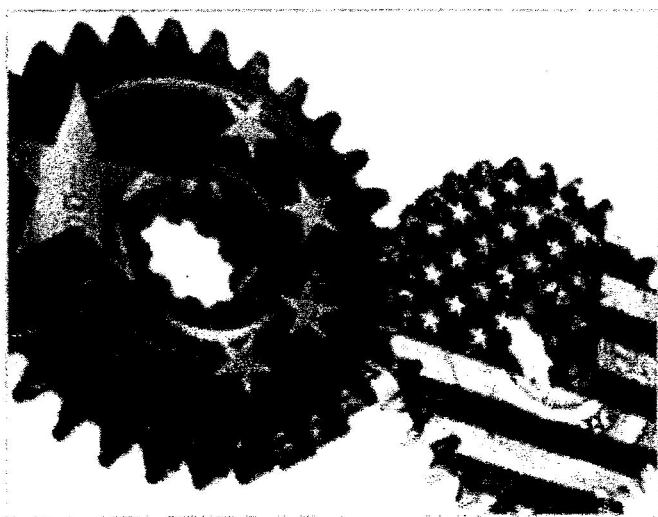
革命者和工人階級活動家的鬥爭，現在不僅要力爭補償這些損失，還要推進建立獨立的工人階級組織的任務。當然，這必須包括工會或者更好的是產業工會，但是最優先的是爭取建立一個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該黨不僅致力於維護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工人利益，而且要在中國和國際上推翻資本主義。

¹單幹：《中國的工人運動》，中國勞工通訊出版

中國—美國：危機的不確定後果

蜜雪爾·胡森

現在是提出危機後果的問題的時候了。不是因為它在結束，像只巴望一切復歸原樣的說官話打官腔的樂觀主義者引導我們的那樣，而是因為這樣做，有用於識別可能的復蘇將要面對的障礙。這個問題雖涉及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經濟，但它是由中國-美國的共同命運主導的，一些人稱為“中美共同體”（Chinamerica），甚至“中美共生體”（Chimerica）。



不久，至少在以下一點會有一個廣泛的共識，即：2009 年將是已知的全球經濟最糟糕的年份之一。2010 年，可以看到經濟衰退的緩解，或換句話說，出現微弱的增長。但即使在這種相對樂觀的情況下，以後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這個問題仍然存在。幾個原因似乎排除了回歸原狀的可能。

第一，危機後顯現的情況不同於以前。首先，在各個方面相互關聯的壞帳的驚人積累，不會在兩年裏被清除掉。我們可以在這裏建立一個定理：金融恢復的必要時間同有關銀行和金融機構的國有化（新的‘國有化’字義）程

度成反比的。更引人注目的是，即使是《經濟學人》雜誌也已經贊成國有化了[1]。

經合組織把其最近的經濟展望報告[2]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以比較瑞典和日本在 1990 年代初面臨危機時的經驗，那場危機同剛剛襲擊了整個世界的危機相似。瑞典做了國有化（清賬後重新私有化）而日本掉以輕心。在第一種情況下，危機長度是有限的；在第二種情況下，它在至少 10 年的時間裏萎靡不振。到現在為止所採取的措施，照其邏輯，有助於使日本式情況成為可能。

經濟恢復和保障方案計畫將導致巨大的預算赤字。經合組織估計，2010 年整個歐元區赤字是 GDP 的 7%，美國的赤字是 GDP 的 11.9%。同時，就業的破壞將導致失業率的大幅變化。根據經合組織估計，2008 年至 2010 年，在歐元區它會由 7.5% 升至 11.7%，美國則從 5.8% 升至 10.3%。於是，一個 2010 年後恢復增長的問題，在相互矛盾的目標的背景下，被提出來：創造就業機會的同時，提高競爭力，恢復需求的同時執行新的社會預算削減，以減少赤字。當然，這些都是資產階級項目，一般地，它們關係到資本主義邏輯的恢復，特殊地，則關係到他們的收入來源。必須推動非常不同的方案，挑戰這一競爭性增長的邏輯，這種邏輯背離社會的需要和對氣候變化的足夠處理。

但是，認為資本主義能夠在沒有社會運動壓力的情況下自我改革，那是完全錯誤的。上述經合組織的報告還令人不寒而慄，因為它毫不含糊地表達了統治階級的意志，即讓一切回到以前，因為處理危機所實施的措施可能有有害後果；它強調整頓公共赤字的必要性，這意味著在社會預算上的新削減。

美國模式還能像以前那樣起作用嗎？

稍加事後分析，對於美國模式，我們可以更好地衡量一下，像溫·戈德利那樣清醒的經濟學家的分析，是預言式的，十年前他就列舉出7個不可持續的過程[3]。

美國模式[4]可以歸納為以下方式：內部需求趨向結構性地高於國內生產，而且這種不平衡主要原因是家庭消費的增長快於家庭的收入。在危機之時，家庭儲蓄率幾乎是零，這實際上意味著，他們消費了100%的收入。三個因素使得這種輕率行為成為可能：

- ▶ 金融幻覺：通過股票或物業的家庭收入之膨脹，給了他們一個持久的財富幻覺。他們不再根據他們的目前收入，而是根據其資產的（虛擬）價值的增長來消費：這就是財富效應。
- ▶ 總體性的過度負債：推動消費的是影響家用生計每個方面的債務。20%的最貧窮家庭增加的負債最多（2000年至2007年間增加了90%）：這是該系統的薄弱環節，是次級貸款的天然負債大眾。但在大量的信貸中，最富有的20%的家庭自己占了2000年至2007年登記的信貸的一半[5]。
- ▶ 信貸增長：這個過度消費，導致了日益嚴重的貿易赤字，這個赤字由來自世界各地的資本流覆蓋了。

美國能夠再次找到同危機前一樣的增長節奏嗎？顯然地，因為家庭的行為，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一旦他們的淨資產財富開始下跌，必會使債務下降，他們的儲蓄率將增加，並已開始這樣做了。上述麥肯錫研究所的研究報告估計，家庭負債率和其歷史趨勢之間的差距在27點。為了降低5個百分點，就需要把居民儲蓄率由2.3%增加至5%。但是，這可能在未來幾年導致損失數千億美元的消費。

另一種方法[6]是把家庭消費的演變同其資產的評估聯繫起來，由標準普爾500股票指數

來衡量其資產。要點如下：為了維持消費，股票市場價格回歸甚至超過危機前的水準是必要的。要言之，新股票交易的繁榮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如果股票價格穩定在相當於過去10年的平均水準上，消費則會下降3%，如果價格回到其互聯網泡沫前的水準，消費則會下降6%。

貿易赤字趨於萎縮，但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增長持久減少的時期。考慮到社會不平等的程度，這種減速將很難忍受。在這裏，我們觸及到美國模式最驚人的特點之一，就是“增長成果”非常不公平的分配。1992年至2006年，每個家庭的稅後平均收入，在通貨膨脹前，每年上升2.1%。但最貧窮的20%的家庭的增幅僅為1.1%，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為2.9% [7]。換句話說，由增長所帶來的收入增加的三分之二落入到了最富有的20%的家庭，其中三分之一被最富有的1%攫獲！如果再考慮到龐大的公共赤字的形成，結論是，美國恢復比較平衡的經濟增長的主要條件是：通過徹底的稅制改革以及較好的收入分配方式來平衡緩解不平等現象。面對這樣的前景，出現了一個非常強大的反對派陣營，它的成員有這個模式的受益者，在不平衡的全球化過程中發現了利潤的重要來源的企業機器的主要部分，更不要說各種形式的金融業。在短期內，按他們的觀點，重要的是，在一個恒定的稅收結構中，轉移納稅人的危機成本。從中期來看，障礙在於另一種模式的經濟條件和各個勢力的目前關係之間的巨大差距。

中國能否繼續資助美國？

在危機發生之前，人們可以說，作為一個整體考慮，美國-中國搭檔已獲得相對的一致性。簡單地說，中國銷往美國，積累美元，然後用這些美元投資於美國國債，以便資助美國的貿易赤字。這種模式讓兩個國家持續增長，互相

獲利，還有，中國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是美國在中國投資的結果，而低價格的進口，可以減低美國勞動力價格的壓力。

這次危機代表了對這一模式的很大衝擊，使其可能的重建成了問題。主要的問題是，中國和一般的新興和/或石油生產國是否願意無限定期地同意資助美國的赤字。中國已經積累了 1700 億美元的資產，這使得它實際上是美國的主要債權國[8]。

“樂觀主義者”強調，中國有興趣繼續資助美國，以免美元貶值，導致其持有的以美元計價的資產貶值。根據中國銀行業監管委員會總幹事的說法，這實在是“唯一的選項”[9]。但這一進程的限制是什麼？美國的巨額預算赤字確實越來越必要求助於外部融資。根據一些估計，到 2015 年，美國的淨外債可以乘以 3，達到 10 億美元，外債總額將達到 23 萬億美元[10]。因此，美國的重建必須有中央銀行的合作。另一方面，美國貿易赤字的重新吸納，有減少全球失衡的優點，從而減少全球流動性的過剩，而流動性的過剩是當前危機的根源之一。

但是我們已經看到，這涉及美國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徹底改變，以及/或者增長的持久放緩，從而使得中國的出口減少。於是美元似乎成了問題的中心。為了恢復其貿易平衡，美國必須將美元貶值，但這般貶值使得資本流入更加困難。它可以被更高的利率吸引，但有增長趨緩與債務加重的風險。

持“依然故我”立場的用戶的另一大論據是，經濟增長只能通過出口，而中國將繼續資助美國赤字，以確保擴大市場開放。但是，這只能持續一段時間，因為中國的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在經濟層面，該需求的結構是異常的。隨著出口（2007 年國內生產總值的 41.3%）和投資（42.7%）的過重，以及私人和公共消費的市場銷售份額（2007 年國內生產總值的 49.6

%）的減少，使它面臨過度積累的風險，相應地，也面臨消費萎縮的風險。

近年來，貿易盈餘起了發動機的作用，但它受到市場開放的較低增長的威脅，從長遠來看，則受到對能源不斷增長的依賴的威脅。有人甚至預測，從 2020 年起中國會有能源危機，這將制約其發展[11]。從現在起，在關係到就業，醫療和養老金這樣的社會緊張問題的壓力下，中國需要再注重於國內市場。這些社會和能源的首要問題會進一步出現在中國政府採取的經濟復蘇措施中。不過，有點像美國，這個增長模式的轉型問題碰上了它隱含的對社會不平等性的挑戰。

在這兩個國家，必須加上另一個經常被忽視的因素，就是國際勞動分工的相對不可逆轉性。美國根本不再生產它進口的那部分貨物，而中國，因為其生產結構的剛性，以及非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制度，其生產機制也不可能輕易地轉向，面向內部需求的滿足。

主要障礙就是人民幣匯率。中國貨幣（元或人民幣）被低估，過去的幾年裏，美國對中國施加壓力，要其貨幣升值。這是在 2005 年 7 月至 2008 年 7 月所做的事：人民幣定期對美元升值，結果在這 3 年期間，升值 21%。自那時以來，中國當局又維持了與美元的固定匯率。

然而，這種結構並非確定的，中國政府剛剛採取了兩個旨在重塑國際貨幣體系的動作。第一個是一項建議，在最近的 20 國集團上提出，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發言權的擴大，提出由一個國際貨幣取代美元。這一建議得到了俄羅斯，巴西和阿根廷的支持。第二個是貨幣交換協定的簽署，從 2008 年 12 月來，與一些國家、地區（馬來西亞，韓國，香港，白俄羅斯，印尼，最近的阿根廷）簽署了總值 95 億美元的貨幣交換協定[12]。這些措施表明，中國正在尋求與其他貿易夥伴建立非美元的關係，從而避免與美國的正面交鋒。

結論：別無選擇的資本主義

世界經濟的不平衡，加上工資的普遍下滑，是這次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爲了擺脫它，確保對滿足大多數國內需求的經濟的再注重，全面改造世界經濟是必要的。這將使通貨緊縮，讓貿易交流合理化。因而，這樣的調整是必要的 --- 但可能還不夠 --- 一個對環境挑戰的正確管理的條件。

然而，從目前的混亂結構過渡到新的均衡結構會碰到兩種類型的障礙。首先是社會的，來自於主導社會利益相關者的抵抗，他們的計畫是回到原狀，過去的狀況完全適合他們。第二個是經濟的：全球化造成的國際分工中的相對剛性引起轉型過渡，這種轉型過渡可能不是立即的，卻是不明朗的。在這種情況下，維持現有秩序的意志和經濟社會以及環境方面深刻重組的需要之間的緊張關係，開啓了一個不穩定和不確定的長時期。在本質上，資本主義對導致危機的安排別無選擇 --- 可以看得到的選擇 --- 在這個意義上，危機的真正出路是資本主義的替代者。

（蜜雪爾·胡森是經濟學家，負責巴黎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的就業問題研究（IRES）。他是左翼智庫科培尼克基金會和阿塔克（ATTAC）科學委員會成員。他剛剛出版了‘純粹資本主義’，2008年，洛桑，第2版。可以在<http://hussonet.free.fr> 參考他的著作。）



注釋

- [1] “在國有化的纏節裏” 《經濟學人》，2009年2月26日，<http://gesd.free.fr/inknots.pdf>
- [2] 經合組織，中期經濟展望，2009年3月
- [3] 溫·戈德利，“七個不可持續的進程”，利維經濟研究所，1999年，<http://gesd.free.fr/godley99.pdf>
- [4] 蜜雪爾·胡森，“美國：一個模式的終結”，角礫岩，第3期，2008年，<http://hussonet.free.fr/usbrech3.pdf>
- [5] 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美國消費者債務的削減會削弱復蘇嗎？” 2009年3月，<http://gesd.free.fr/cripplec.pdf>
- [6] 奧利維·帕薩特，“什麼是對中期增長危機的影響？” 新聞觀察 113 期，2008年10月，<http://gesd.free.fr/eveil113.pdf>
- [7] 資料來源：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聯邦稅和家庭收入分佈資料，2009年4月，<http://tinyurl.com/cboquinti>
- [8] 金融時報，2009年2月22日
- [9] 金融時報，2009年2月12號
- [10] 派翠克·阿特斯和瑪麗·皮埃爾·裏佩爾，“美國的外債：2015年將高達23萬億？”，閃光，219期，2009年5月，<http://gesd.free.fr/flas9219.pdf>
- [11] 李明其“中國經濟增長的能源頂峰和界限”，麻塞諸塞州阿姆赫斯特大學，2008年，<http://tinyurl.com/minqili8>
- [12] “中國與阿根廷簽署貨幣互換協議”，中國經濟評論，2009年3月31日，<http://tinyurl.com/yuanswap>

第四國際的作用和任務

第四國際第 16 屆世界大會

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決議草案

第 16 次世界大會的準備，是在全球經濟危機和全球生態危機前所未有地結合的背景下進行的。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捩點。這種雙重危機表明資本主義制度的失敗，並把反資本主義的工人運動的改組和重建提上了議事日程。

1. 反對大眾階級的社會經濟攻擊和新自由主義反改革行動將增加。將會有更多的戰爭和衝突。生態災難將打擊數百萬人。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出現在地平線上。世界經濟政治的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新力量關係正在成形，並出現了新的資本主義勢力，比如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巴西。美國霸權的削弱，同歐洲、俄羅斯、亞洲和美國之間資本主義競爭的尖銳化相結合，加上北約的更大作用，對新的政治和軍事結構和新的國際緊張局勢，也有地緣戰略影響。美帝國主義重新部署其在世界各地的軍事霸權，以彌補它的經濟疲軟。在美國，社會經濟的矛盾導致喬治·布希的共和黨團隊聲名狼藉。作為美帝國主義的一種替代解決方案，選舉奧巴馬，是對這種惡劣聲名的回應，雖然他的選舉也是對美國一個社會階層的變化要求的回應，這個社會階層將會失望，但這就是現實。

總之，這場危機使得無法提供一個解決辦法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明顯失敗。這種社會制度的所有固有矛盾將要爆發，而社會民主黨和中左派不能夠提供足夠的反應。即使是尚未實施的新凱恩斯主義措施，也不足以解決這場危機。

2. 全球範圍內社會反擊繼續上升，但反擊方式很不平衡，仍然處在防守階段。全球正義運動失去了它直到 2004 年都具有的動力。然而，

貝倫世界社會論壇表明，在鬥爭更加零碎和分散的框架下，國際凝聚的需要和可能性。

■在某些歐洲國家 — 法國、希臘、德國、波蘭、義大利 — 社會鬥爭對政治舞臺有中心影響，但這些鬥爭都不足以阻止或扭轉資本主義進攻和危機影響中的基本趨勢。他們還沒有成功地克服工人運動的四分五裂進程。這些鬥爭仍然是防禦性的。他們還沒有找到用反資本主義覺悟作表達的方式。在此框架內，在缺乏反資本主義左翼反對派的情況下，甚至排外和種族主義的方案和趨勢能夠變得更有力量。

■在中東、巴勒斯坦、伊拉克和黎巴嫩人民繼續抵制西方和以色列的佔領和侵略。侵入黎巴嫩兩年後，猶太復國主義政府在加沙地帶施行的殺人侵略戰爭，一直無法挫敗抵抗運動。雖然哈馬斯和真主黨目前是抵抗運動的主要政治代表，但有一些團體在社會和民族解放的背景中，安排他們的行動。

■拉丁美洲仍然是最具社會爆炸性局勢的大陸，儘管在如阿根廷和巴西這樣的國家，這些局勢有所不同和有所限制。這些地方，特別是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和巴拉圭，有同帝國主義決裂的部分經驗。

■在一系列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或資本主義復辟國家 — 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前東歐集團 — 全球化的旋風正驅使數以億計的人無產階級化。但這一在今後幾年可以發揮關鍵作用的新社會力量，尚未形成獨立的群眾組織 — 能夠面對全球重組之挑戰的工會、協會和政治組織。

► 爲圖利於資本主義的大跨國公司，與現有政府合謀的、對非洲資源的掠奪，正日見增加。近幾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持續增長並沒有利於人民，只有社會不平等現象在增加。面臨日益惡化的生活條件，出現了一些重大的鬥爭，例如幾內亞大罷工，多哥的示威，南非公共部門的大罷工。糧食危機在 2008 年底引發了許多示威。然而，政治選擇的缺乏是鬥爭取得成功的一個沉重障礙，比如在幾內亞或在喀麥隆。它們要麼改行資產階級政治，比如在馬達加斯加，要不他們就迷失於宗教死角，比如在尼日利亞和剛果（金），甚至更糟，訴諸民族或種族主義，就像在肯雅或南非。

民主的人民和工人組織的建立，對鬥爭的成功，仍然是絕對必要的。

► 蘇聯集團解體和金融全球化的綜合長期影響，繼續在亞洲感受到：熱戰中心（阿富汗，斯裏蘭卡，菲律賓的棉蘭老島），國際對抗區域（朝鮮，巴基斯坦，印度），對以前的地緣政治力量平衡的挑戰（東南亞，中國，日本），已經贏得民主的國家之民主空間的減少（泰國，菲律賓，印尼...）。

今天，金融經濟和糧食危機使這些不平衡變得尖銳，從而促使不同領域的社會反擊運動有越來越多的區域協調和更大的凝聚，例如：反戰反核，反對債務，爭取糧食主權，捍衛社會和生態權力 ...

3. 資本主義全球化動力和當前的危機也改變了傳統左派演變和發展的框架。改革派官僚已看到了自己的迴旋餘地大爲減少。從不改革的改革主義，到反改革的改革主義，在一系列主要或發展中國家，社會民主黨和類似力量，正在經歷朝向社會自由主義的演變，也就是說，這些力量直接承擔新自由主義或新保守主義政策。所有在政治上或是體制上與社會自由主義或中左派相連的力量，在不同程度上都捲入工人運動中這些質的變化，無法制定一個計畫以

擺脫危機。還有，我們看到的政策，如巴西盧拉政府的政策，正使生態危機惡化。

傳統的共產黨在繼續其長期沒落過程。他們試圖中斷這種沒落過程，於是抓著自由主義左派和體制機構裏的主導力量的大衣尾巴，要不就回落到其懷舊和自我肯定的立場。雖然有些團體或群體希望與一些反資本主義力量一起建立社會運動，如希臘左派運動和生態主義聯盟。因爲它們的改革派性質，他們註定有矛盾和分歧。社會反抗和傳統左派機構演變的相結合，爲激進的左派開啓了一個新的空間。這把工人運動在新基礎上的改組重建一事提上了議程，這個基礎就是反資本主義與生態社會主義。

4. 我們希望能參與這一重組，以創建一個新的左派，使它有能力的迎接本世紀的挑戰，重建工人運動，重建它的結構、它的階級意識、它在政治和文化的水準上相對於資產階級的獨立性。

- 反資本主義的，國際主義的，生態主義的和女權主義的左派；
- 顯然替代社會民主黨及其政府的左派，爲 21 世紀的社會主義而奮鬥，自我管理，民主和有達到目標的連貫綱領的左派；
- 這個左派意識到，爲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同資本主義和它的邏輯決裂，因此它不能與它想要擺脫的東西一起執政；
- 一個多元化的左派，植根於社會運動和工作場所，整合工人的鬥志，植根於婦女和 LGBT（同性或雙性戀者）自由解放和生態的鬥爭；
- 一個非體制左派，立基於無產階級和被壓迫者自我組織的戰略，其原則是工人的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任務；
- 一個左派，它整合新的社會階層，整合如貝倫世界社會論壇所表示的新主題，最重要的是，整合新一代，因爲你不能用舊材料做新東西；

- 一個國際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左派，它反對統治和戰爭，為群眾的民主國際奠定框架;
- 一個能夠把關鍵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寶貴遺產同女權主義、生態社會主義和拉丁美洲土著運動的發展聯繫起來的左派。
- 一個獨立和階級鬥爭的左派，它爭取廣泛的聯合行動，對抗危機，為工人和所有被壓迫者爭取權利，爭取收益和願望的實現。



5. 這是個願望，它把建設第四國際和新的反資本主義政黨以及新的國際運動的問題提了出來。我們以自己的方式表達了它，從1992年起，在過去兩年的世界大會，以“新時期，新方案，新政黨”三部曲，在國際檔中演繹展開。在2003年的上屆世界大會，關於建立廣泛的反資本主義政黨，我們確定了我們選擇的本質。整體而言，第四國際正面臨一個新的階段。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激進分子、核心、運動和組織，必須用建立一個工人階級的新獨立政治代表的觀點，提出建設反資本主義的革命政治組織的問題。在每個國家規模的水準上，在國際的水準上，這是真的。在階級鬥爭經驗的基礎上，過去十年的全球正義運

動，防衛鬥爭和反戰動員之發展，尤其是巴西勞工黨（PT）的演變和義大利共產黨的重建的經驗教訓，以及從法國的反自由主義左派，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辯論中所引出的經驗教訓，都應用於近年來的巴西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義大利左翼批判黨，法國的新反資本主義黨，英格蘭的尊重黨的建設。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在繼續積累葡萄牙左翼和丹麥紅綠聯盟的經驗。通過不同的路徑，共同的目標是廣泛的反資本主義黨派。這不只是一個採取重組或革命運動的舊公式的問題。遠大的目標是，除了革命力量，還要彙集革命力量以外的力量。這些可以是力量凝聚過程中的一個支援，只要他們的確是要建立反資本主義黨派。雖然沒有模式，因為每個集聚的進程考慮到國家的具體情況和力量的關係，因此，我們的目標必須是尋求建立獨立於社會民主黨和中左派的，廣泛的反資本主義的政治力量，建立這樣的組織，該組織拒絕對階級通敵政府，也即今天的社會民主黨和中左派政府的任何政策的參與或支持。正是基於這樣一個觀點，我們必須作調整。我們所知道的非洲和亞洲的分化和重組的經驗，指向同一方向。正是通過這一過程，我們才能取得新的進展。正是這個問題，必須形成下次第四國際會議的框架。

6. 在該框架內，我們必須處理這個問題，即：在國家，大陸和國際水準上，相逢一起的第四國際建設和反資本主義政策之間的關係。我們必須討論如何加強和變革第四國際，以便從新的國際分組的角度上看，它是有效的工具。這是我們已經開始做的，雖然結果有限，在反資本主義左派會議和其他國際會議的範圍內，它必須被接納。在國際層面，根據這個政治基礎，我們參加了許多會議和國際認同的倡議，並與葡萄牙左翼集團，丹麥紅綠聯盟和蘇格蘭社會主義黨一起達成了歐洲反資本主義左派（EACL）的憲法。我們與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那樣的組織一起工作。其他黨派 --- 甚至是時而會政治演變成“左派”的左翼改革

派，像義大利共產主義重建黨（Tor Synaspismos），也參加了這些會議。在印度孟買和巴西的阿雷格里港的世界社會論壇之際，我們還舉行了革命和反資本主義組織的國際會議。在這個層面上，在巴西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同盧拉的巴西勞工黨（PT）決裂時，我們建立了與PSOL的團結紐帶。我們支持義大利同志的努力，他們努力為共產主義重建黨的政策建立一個反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這幾個因素顯示我們想要的執行方向的類型。今年，如巴黎或貝倫那樣的不同會議表明，在歐洲，大量的組織和反資本主義左派運動的聯合行動及討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現在有必要繼續這樣的政策，即：就戰略和綱領的準則和通過國際動員而激發的聯合行動這樣的議題，召開各種會議。

7. 第四國際及其各個支部扮演著並仍然扮演著維護促進和實施一個綱領的重要道路，該綱領包含朝向社會主義的即時而又過渡的要求；它們擔負著一個統戰政策，其目的是為了工人和他們組織的大規模動員；它們維護促進和實施一個工人階級的團結獨立，反對任何類型的與民族資產階級戰略結盟的政策；反對任何參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行為，因為這些政府僅僅照顧國家和資本主義經濟而放棄所有的國際主義。

第四國際已經發揮並仍在發揮一個功能作用，就是保持革命馬克思主義傾向的歷史活力，“瞭解世界”，正視革命戰士、各個運動和組織的分析和經驗，把各組織、派系和積極分子聚集起來，在革命的基礎上，共用相同的戰略看法和廣泛一致的同樣選擇。一個使人們有可能“思考政治”的國際框架的存在，對於革命者的參與，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資產。一致的國際主義必須提出一個國際框架的問題。但是，由於其本身已分析過的歷史原因，第四國際本身不具備代表我們需要的新群眾國際的合法性。因此，當這是反資本主義力量的聚集向前

邁步的一個問題時，這些新的組織，特別是在歐洲和拉丁美洲，不能聯繫到並加入某個同第四國際的傾向，無論從什麼參考點看 --- 各種的阿根廷社會主義工人運動（莫蘭奴派），工人黨，社會主義工人黨或其他類型的托洛茨基主義黨（林巴特派），這都是真的。儘管如此，讓我們注意第四國際和所有這些運動之間超越政治立場的一個重大區別，第四國際的信譽是，它立足於各個支部和中堅分子民主協調的基礎上，而其他國際流派是“國際派別”或協調基礎上的“黨的派別”，它們不尊重民主運作規則特別是傾向的權利。這些國際“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歷史限制，“像其他前毛派或前共產主義的流派，今天阻擾我們在新的國際凝聚的結晶中前進。至於查韋斯或其他人對新的國際主義者的呼籲，他們並不位於同一環境。他們顯然提出了根本的政治問題，但也提出了國家和組織的關係問題。

在目前的力量關係中，通向群眾國際的政策，必須公開和定期的，就主要政治問題--- 活動，具體的主題或討論 --- 召開會議，使得反資本主義和革命的支柱力量有可能聚集和出現。新的反資本主義黨派在今後的歲月裏可能形成，它們表現最致力於尋求反資本主義替代方案之團體的現階段的鬥志、經驗和覺悟，在這些黨派中，一個新的國際的問題會提出，或將會提出。我們採取行動，我們將繼續採取行動，要使它不以意識形態或歷史選擇的方式提出來，因為那樣做很可能導致分裂。它必須在一個雙重水準上提出來，一方面，在國際幹預的任務上有真正的政治凝聚一致，另一方面，新組織的多元化，必須把各種起源的流派聚集在一起，這些流派有：各種托洛茨基主義者，自由意志主義者，革命工團主義者，革命民族主義者，左翼改革派。因此，一般來說，如果有邁向新黨派的具體步驟，我們建議新的廣泛的反資本主義黨派有操作傾向或派系的權利，並且這些新黨派中的第四國際支持者應當根據各

黨派的具體情況，按既定方式組織起來。我們在左翼集團中的葡萄牙同志，我們的紅綠聯盟的丹麥同志，我們在社會主義自由黨中的巴西同志，作為第四國際的派別，按特定形式組織起來，或者與其他政治傾向在階級鬥爭的流派中組織起來。

8. 在這個運動中，我們面臨各國內部黨派的建立和新國際集團的建造之間的非同步性問題。在目前情況下，或在未來幾年內，新的反資本主義黨派可能出現在一系列的國家，但是新國際力量的出現，尤其是一個新的國際的出現，在現階段尚看不出來。一個新的國際，只會產生於長期的聯合行動，和對推翻資本主義的活動和任務的共同認識。在我們肯定一個國際凝聚政策的同時，它證實了第四國際的特別責任，因此有加強它的需要。我們可以而且也謀求展現一個組織框架，對於有著同我們一樣的政治計畫的革命組織來說，該框架是有吸引力和民主的。菲律賓的同志，巴基斯坦和俄羅斯同志正是處在這種動態中，而且可以成為例如波蘭或馬裏同志的明天情況。

9. 事實上，我們有一個為一系列的政治派別所承認的特別作用。我們可能是唯一可以使各種起源的政治力量凝聚起來的力量。舉例來說，這是拉丁美洲玻利瓦爾省進程左派的委內瑞拉同志對我們說的。在歐洲，在歐洲反資本主義左派（EACL）和其他傾向的關係框架內，情況也是這樣。因此，未來的世界大會，對所有這些力量的聚會，必定是一個重要步驟。這次大會將是一個國際的大會，在這個階段，不會有組織的增長。但是，我們希望第四國際扮演新的國際集團視野中的凝聚性的“促進者”角色。

10. 因此，為了加強自己和發揮這種作用，第四國際的所有機構必須加強：定期會議，國際委員會及其與各支部之間的往來交流。有必要加強過去幾年裏國際已經部署的活動：第四

國際領導機構——歐洲執行局會議的正常運作。該國際委員會（IC）會議，每年都舉行，代表約 30 個組織，必須確保我們國際運動的組織連續性。

每年舉行一次的大約 500 同志參加的青年營，在我們的歐洲分部的青年工作中，必須據有一個中心位置。

教育組有了新的動力。我們現在必須確保訓練和研討會的舉行，並確保管理和組織的平衡。第四國際也必須開放其會議及其研究所。該研究所佔有中心位置，不僅是為了教育各支部的幹部，而且還有助於各派之間的交流，有助於各種國際經驗交流。向一系列國際專家開放氣候變化的研討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像其他會議一樣，它表明這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即對於處理反資本主義和革命的黨派的基本問題，我們制定的綱領也是經得起考驗的。婦女，青年和工會的會議也必須開放給他人，並按這一觀點作改變。總之，在今後一段時期，旨在建立一個新的國際力量或一個新的國際，按照這個方向，第四國際，作為一個國際框架，是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個重要的資產。

【第四國際 — 爭取社會主義革命的國際組織，由各國支部以及接受和應用其原則和綱領的積極分子組成。他們聯合在一個世界範圍的組織裏，就主要的政治問題共同採取行動，並同時遵照民主規則進行自由討論。】

譯自國際線上雜誌：IV410 期

氣候變化和我們的任務（決議草案）

丹尼爾•坦努樂

我們已經在ESSF網站上登載了丹尼爾•坦努樂在第四國際2009年2月的國際委員會（IC）會議上作出的報告‘氣候變化和氣候運動’ [1]。即將到來的第四國際世界大會關於這些問題的決議，是以該報告為基礎而擬定的。

我們現在發佈關於氣候變化的決議草案（最初版本，2009年10月11日），該報告將提交給即將召開的第四國際世界大會表決。

1. 眼前的氣候變化，一般來說，並不是人類活動的產物，而是因為這樣的事實：即資本主義制度，基於短期利潤和超額利潤的考慮，不僅把剝削勞動力，而且也把對自然資源，尤其是對有限的不可再生的廉價化石燃料儲備的掠奪，一直不停地作為其發展的基礎。

在19世紀最後幾十年和20世紀初期，一些尋求以太陽能利用為基礎的替代能源系統的合理建議，不是被資本主義盈利律擱置一旁，就是毀於煤炭企業的壓力下。1945年後，為了延續其超額利潤，石油壟斷企業和依賴石油的部門壓制許多技術替代方案，並且迫使運輸，消費和城鄉規劃的方式只能服從於銷售越來越多的商品的願望，特別是汽車和其他大規模生產的個人消費品。在過去40年中，儘管有日積月累的越來越可信的證據，資產階級政府和媒體仍然無視科學家們的警告。相反，它們支持資本主義遊說團體的歪曲宣傳，與此同時，生產和交換的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正在導致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爆炸性增長。

在21世紀初的今天，全球變暖的原因有完備的資料記錄，危險是政府已知也承認的，技術解決方案是存在的，並且情況的嚴重性隨著專家們的每個新報告而增加。儘管這樣，資本主義仍然

不顧一切地繼續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包括非傳統能源（重油，瀝青砂，葉岩油）以及巨大的廉價煤炭儲備。由於構成該制度基礎的是積累邏輯，從而啟動了生產主義的賭博，它意味著危險的技術：發展核電和發展旨在增加生物燃油的有害生產的基因工程，以及發展捕捉儲存億萬噸二氧化碳於深部地質層的“清潔煤”技術。對資本而言，可再生能源，只是一個新的價值積累領域，這解釋了為什麼它們的實施形式會特別地帶有破壞性，它們被用作化石燃料供應的補充而非替代。

資本的唯一限制是資本自身（馬克思）。這一制度的瘋狂競爭，造成兩極分化，在一端積累財富和過度消費，另一端則是貧窮和匱乏，它威脅著促成人類生態災難，這是一個歷史尺度上不可逆轉的災難，會對生態系統，特別是對生物多樣性造成無法挽回的破壞。儘管這一危險臨界點，同前工業化時代相比，大大低於2°C，它已在許多地區（島嶼國家，安第斯國家，北極地區，半乾旱地區...）遭到反對，但是，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層面上已經通過或正在討論的一些計畫，對應於一個60釐米至2.9米的海平面上升（不計兩極冰蓋的脫位），為均衡起見，卻提出3.2°C到4.9°C之間的變暖。儘管千年發展目標並不足夠，但它卻不能達成，不僅如此，還有千百萬人面臨他們生活條件的嚴重惡化。對於其中最貧窮的人而言，他們的生存受到威脅，特別是來自海岸洪水，淡水資源緊張，熱帶地區的農業生產力的預期下降所造成的風險之威脅。

2. 要讓氣候穩定在危險最小可能的水準上，需要大幅減少能源的消耗，因此需要減少物質的生產。同時，能源和其他資源必須確保30億男女的發展權利，這些人生活在不符人性的條件中，是全球變暖的第一批受害者。資本主義制度是無

法分開接受這兩項挑戰的。對於它來說，同時對付這兩項挑戰等於要它做不可能的事。要不計代價地實行世界性的過渡計畫，完全基於可再生能源，基於人類基本需求的滿足，建設一個經濟高效的能源系統，要執行這個計畫，徹底的反資本主義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看法，要讓氣候穩定在最小危險可能的水準上，需要全世界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在2015年之前達到峰值，並從現在到2050年之間，減少到2000年的百分之50至85。按照預防為主的原則，至為重要的是把這些目標最嚴厲的部分作為最低限度要做的事。事實上，氣候模型沒有納入已知的“非線性”現象，特別是格陵蘭島和南極冰蓋的脫位以及永久凍土（凍土）釋放的甲烷，就算納入了也是做得非常不完善的。但是，這些現象已經明顯，很可能會強烈地加速氣候變化，並大大增加今後幾十年的負面影響。

除了這些物質的限制外，還必須加入社會，政治和技術性質的其他限制：

為了計算帝國主義國家和其他國家的不同歷史責任，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估計，參照1990年，從現在到2020年，首先必須減少25%至40%的排放量，從現在到2050年，要減少80%至95%的排放量，然後，2050年在所有地區和從2020年開始在大多數地區（非洲除外），相比目前的預測，輸出曲線必須下降15%到30%。在此，同樣基於上述理由，最低限度必須採取最嚴厲的目標。

考慮到它們對全球變暖的決定性責任，這些目標中有關發達國家的部份，必須由它們使用國內措施加以實現，即減少它們自己的排放量。這些排放量削減，不可以代之於通過在發展中國家或經濟轉型國家的所謂“乾淨”投資而購買的污染權，也不能代之於種植樹木---它並不提供結構性的解決辦法，也不能代之於對現有耕地和森林的保護---土地和森林的保護，本身就是必要的，必須停止讓污染者繼續污染。

為了氣候正義和償還生態債務，帝國主義國家必須向帝國主義主導的國家轉移知識和技術，使他們在發展的同時，尊重氣候穩定的物理限制。他們還必須資助對不可避免的氣候變化作適應的那部分人，其中貧窮國家的貧困人口，多半是婦女，是主要的受害者。

從技術角度來看，可再生能源可以充分面對人類的未來需要。但是，由於需要改變能源系統，未來40年過渡的成功的前提是能源消費的重大減少（百分之五十，發達國家更多）。這反過來又意味著物質生產的大量減少，於是關鍵問題是：有必要減少整體生產，同時又要滿足30億人的合理需求，因為他們的許多基本需要仍然得不到滿足。

根據氣候變化造成的破壞成本，給碳賦價，從而讓這些條件得以遵循，這個想法是一個完全的幻想。價值是一個純粹的量化指標，表達通過資本的發展，在某一時刻付諸實施的抽象的人類勞動量：按定義，它不能考量自然財富，不能考量子孫後代的需要，無能力從人的角度區別有用或無用的具體勞動，也無力考慮到氣候穩定的眾多數量和品質參數。這種無能為力，已經體現在實踐中的事實裏，即資本主義壟斷者盡其全力，成功地阻止了全球變暖的帳單放在其門口，歸根究底，他們是根據自己的利益，確定推行政策的節奏和形式。最後，在社會層面，一個碳的世界價格的實行，將使工人和窮人為全球變暖買單，從而加重了北方和南方間的不平等現象，也加重了北方和南方的社會內部的不平等現象。

資本是無法解決關鍵問題的，因為它在結構上無法做到，更多地為不能消化的需求生產的同時，減少整體的物質生產。要完全在可再生能源的基礎上，不計成本地、有計劃的，民主的和合理的實施向經濟高效能源系統過渡的世界方案，同時兼顧人類發展的合法權利，這只有訴諸徹底的反資本主義措施，才有可能。這些措施特別包括：徵用信貸和能源部門；大規模的削減工作時間（半天的工作）以及減緩工作節奏，但不

減工資並且額外雇用工人；對資本利潤課以重稅；通過對農民農業的支持，盡可能地使生產，特別是農業生產，重新本地區化；改變消費模式，在住房和交通領域提倡公共化；用壟斷利潤資助建立適應期世界基金；為研究作公共再融資，結束其對企業的從屬地位，向南方國家無償轉讓清潔技術；以及在所有這些不同的層次上，由人民和地方政府機構控制的民主參與機制。

3. 200多年的資本主義發展，依賴的是化石燃料，留下有毒的產物，氣候變化之所以集中在文明危機上，乃是因為這個事實，即這個制度的社會生態破壞潛力目前遠遠超過確定人類需求和應對這些需求的能力。在資本主義人口律的框架內，經濟氣候和糧食危機的組合，造成一項重大的人類災難威脅，甚至是一個退回到野蠻時代的威脅。兩百年資本主義發展遺留的有毒產物，氣候變化，構成了一個制度的全球性危機之最明顯的示範，這個制度的社會生態的破壞潛力現在遠遠超過其確定人類需求和回應需求的能力。生產力的增長，已成為破壞性力量的增長，這不僅是因為越來越多的社會和生態上的破壞性技術已付諸應用，而且，整體而言，因為破壞氣候的資本主義邏輯，正把人類帶向全範圍的嚴重困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意味著特別的人口律，表達了對“產業後備軍”的永久需要。在這個定律框架內和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歷史性衰落的背景下，經濟氣候和糧食危機的組合，在其中產生了深刻的威脅，一波規模空前的“創造性破壞”

（熊彼特），這不僅意味著物質生產力和不可替代的自然財富的大量淘汰，而且也意味著對億萬人類造成身體破壞的重大風險。這地獄的邏輯已經在作用，在聚結投資於農業、能源、汽車和石油化工的各個大資本，把他們的手伸向土地，伸向用作能源的生物資源的工業開發，正在加快小農的破產和農村人口的外流，威脅土著社區，大大增加了作為慢性饑荒災民的次級無產者。缺乏一個全球性的替代，這個制度的內在動力將前所

未有地強力推動全球危機滑坡，這場危機殘暴和野蠻的水準可能是史無前例的。

4. 氣候變化加強了一個世界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和一個同生產主義徹底決裂的社會主義計畫兩者的緊迫性。和以往不同的是，碳迴圈的飽和以及不可再生資源的枯竭，實際上意味著，不同時考慮到主要的自然限制，工人的解放是不可想像的。

反對資本主義增長的本身，既不是社會的項目，也不是支持另一種社會的廣泛社會動員的戰略。物質生產和消費的減少對氣候的穩定是即刻必要的，因為在把人類驅向死亡之路這方面，資本主義已做過頭了。但是，這並不以任何方式預先判斷發展的未來可能性，一方面，它只要求先讓氣候系統穩定下來，另一方面，它只是朝無化石碳經濟必要轉型的一個定量標準。如果我們不想被引向反社會的甚至反動的結果，這種定量的標準必須與品質標準相結合：特別是財富的再分配，減少工作時間而不減工資，公共部門的發展。如果這些要求得到滿足，達到了它針對無用或有害生產制定的條件，那麼，通過對社會部門的投資，一個不同的城市 and 國家規劃，免費獲得的重要服務，以及重新掌握必要的自由時間，用於各階層的自我活動，自我組織和民主自治，這樣的話，物質生產的減少實際上將與絕大多數人的生活質量、財富和幸福同步增加。

資本主義制度同物質生產和消費的增長是分不開的，但這是效果而不是原因。作為交換價值之抽象形式的價值的生產，它導致財富在一端無限積累，並同時導致貧窮和匱乏在另一端積累的永久趨勢。沒有考慮到這種雙重現實的氣候政策是註定要失敗的。從而，反資本主義替代方案的關鍵點和杠杆，基本上仍然是那些社會主義性質的項目：動員被剝削和被壓迫者反對以利潤競賽、生產資料私有制、生產商品、競爭和工資為基礎的制度。但是，對於解釋替代方案，這個關鍵點和這個杠杆是不夠的。碳迴圈的飽和實際上

構成了這個事實最明顯最全球性的顯示，也即：不像過去，不考慮自然的主要制約因素，工人的解放是不可設想的，這些制約因素有：依照歷史尺度，不可再生資源的儲量有限，再生資源的補充速度，能源轉化的規律，生態系統和生物週期及其節奏的運作條件。

光是肯定社會主義必須接納生態問題，這是不夠的。真正的挑戰，在於創造條件，使社會主義專案同陸地超級生態系統的全球生態相容。發展的設想，不能僅是旨在滿足真正民主確定的人類需要，還要兼顧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性，更要接受這樣的情況，即：複雜性，未知因素和生物圈的演化特徵賦予這項事業某種程度的不可逆轉的不確定性。應該放棄“人類控制自然”的概念。從現在起，唯一真正可能的社會主義，是一個滿足真正的人類需求（擺脫商業異化）的社會主義，它是由利益相關的各方自己民主地決定的，做決定的同時，要小心謹慎地反省自己，這些需求對環境會有哪些影響，以及滿足這些需求的方式對環境會有哪些影響。

從社會和生態的相互滲透方面考慮，意味著首先要超越關於自然的分割、功利且簡單的觀念，不能把它當作人類操作的物質平台，不能把它當作商店，從中提取對社會存在之生產所必要的資源，也不能把它當作垃圾場，堆積這項活動的垃圾。在現實中，自然同時是平台、商店、垃圾場和所有的生命過程，由於太陽能的外部供應，使這些環節之間產生迴圈，同時不斷地重組它。因此，廢物和它的處理方式，在品質和數量上，必須同生態系統迴圈的能力和節奏相容，以免破壞生物圈的正常運作。但是，這種正常運作取決於生物操作者的數量和多樣性，以及取決於聯結它們的關係多重鏈的品質和複雜性，取決於最終確定供應給人類的資源的平衡流。

其次，從社會和生態的相互滲透方面考慮，意味著汲取現實教訓，即：生產方式不只是由生產和財產的關係確定的，它還取決於其由能源選擇規範的技術結構。氣候變化清楚地表明：爲了

滿足人類（糧食，熱，光）的需要，一個生產模式使用的能源和能源轉換的方法，並不是社會中立的，而是有一個明顯的階級性質。資本主義的能源系統是集中的，盲目的，浪費的，效率低下的，物化勞動密集的，基於不可再生能源的，並具有商品過度生產的趨勢特點。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要求把它逐步摧毀並代之於一個分散的系統，這個系統是有計劃的，經濟的，高效的，活勞動密集的，完全基於可再生能源的，並且其生產指向具持久實用價值的可回收利用的東西。這一轉變不僅關係到狹義的能源“生產”，而且關係到整個工業機制、農業、交通、休閒，以及城市和鄉村規劃。能源/氣候挑戰迫使我們對社會主義革命做這樣的設想：它不僅要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政權，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這個國家一旦建立就開始儘快地消亡，並且逐步進入人民自治狀態，它還要作爲一個老的資本主義生產機制銷毀進程的開始，代之以另一種機制，利用不同的能源，不同的技術和不同的結構服務於民主決定的目標。這種極其深刻的歷史巨變可以開始於一個國家或一組國家，但它必須包含其全部特點，並且完成於世界範圍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也就是主要的發展不平等的廢除能夠名副其實地滿足每個人生存的基本權利後。其實，它的前提是能源自主權，尤其是不同國家的糧食自主權的初步實現。遠非人類發展終點的代名詞，它意味著科學技術以及民主運用它們的社會權力的重要進展，在一個“審慎照顧”生物圈的文化框架內，有每個人的積極參與，對此土著社區的貢獻將是非常寶貴的。

革命馬克思主義認爲，一旦人類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人類發展的品質將比發展的數量更重要。這種觀念同馬克思是一致的，對他來說，真正的財富是自由時間，社會關係和對世界的理解。一個完全利用可再生能源——主要是太陽能——的共產主義的前景，持續地存在於這個非生產主義的思想中，深化它，並根據需求，任務和方案擬定出新的結論。這一深化證明了生態社會

主義新概念使用的合理性。作為反對資本主義剝削人類勞動和破壞自然資源的共同鬥爭的集中體現代表，生態社會主義不是從一個建立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理想和空幻的“和諧”觀出發，而是從管理社會與環境的交流問題的唯物主義必要性出發，同時有意識地，集體地和民主地控制人類需求和生態系統正常運作之間的緊張關係。



我們的任務

5.1. 預備社會運動的積極分子，使他們可以幫助群眾意識的發展，有助於就氣候問題發起群眾動員。有關氣候變化的鬥爭需要優先建設社會的力量關係。面臨問題的緊迫性，面對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罪惡政策，我們在各個國家工作，建設一個強大統一的，在世界範圍內協調的群眾運動。這一運動必須看成是現存社會不同階層的社會抵抗網，在最小的共同平臺上，有一致協調的行動與定期的多元示威。它的目標必須是迫使政府至少達到IPCC提出的最基本的排放量的減少，尊重“共同但責任有分別”的原則，尊重社會民主權利原則以及每個人名副其實的生存權的原則。保護氣候的民眾動員是一項艱巨的任務，特別是由於現象及其影響之間，在空間和時間上的雙重錯位。關於全球變暖及其影響的資訊廣泛的宣傳運動，是必要的。它的目標必須特別針對各種社會運動和左派政治組織的活動家核心，因為這些核心，在建立全球氣候威脅和特殊社會問題之間的具體鏈結上，在推動使社會鬥爭同環境鬥爭的結合成為可能的戰略方面，發揮決定性作用。

5.2. 建立一個連接氣候鬥爭同社會正義的左派運動。沒有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被剝削被壓迫者的動員和積極參與，必要的變化是不可能取得的。資本主義的氣候政策使這種參與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在社會層面上是不能接受的。事實上，這政策意味著帝國主義統治和資本主義競爭以及暴力的加強；因此也即意味著剝削、壓迫、社會不平等、工人之間的競爭、侵犯權利和資源的私人佔有行為的強化。特別是，對於大量排放溫室氣體的各部門的數百萬雇工的就業，工資和社會成果所代表的主要挑戰，這一政策並沒有提供任何答案。因此，它只能遭遇合法的社會抵抗。大型環境非政府組織試圖激進化各國政府的氣候目標，卻又拒絕承認這個激進化作法同時也會加劇反社會的攻擊。這是一條死胡同。我們捍衛把氣候鬥爭同社會正義相結合的需要。在廣泛的運動中，我們努力組建一個左翼，它連接這兩個方面，並堅持反對這樣一些建議，這些建議的基礎是市場手段、積累、新殖民主義統治和技術冒進。這個左翼將設法彙集工會成員、生態學者、全球正義運動、女權運動和第三世界左派、“影響力減少的”左派、激進左派組織、批判性科學家組織等。

5.3. 進行反對綠色新馬爾薩斯主義的思想鬥爭，保護窮人和婦女的權利。根據它的全球性質，和它可能引發的災難程度，全球暖化有利於一整系列的意識形態思潮的發展，在基本生態的掩蓋下，這些思潮試圖修復馬爾薩斯論，把它包裝在一個帶有強烈宗教聲調的世界末日的說法中。這些思潮在統治階級的一些部門中找到最高的回聲，在那兒，幾億人的消失比資本主義的消失更容易想像。正因為如此，他們代表的是對窮人尤其是婦女的潛在嚴重威脅。反對這些思潮的鬥爭，代表了一項重要任務，是我們的組織必須承擔的、並要與婦女運動聯結的任務。人口水準顯然是氣候變化的一個因素，但我們要堅決打擊這

個欺騙人的說法，即人口增長是氣候變化的原因。發展中國家的人口結構正處在大規模的轉型中，進展之快，超過預期。它的繼續是可以預期的，但那是社會進步、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的結果，是婦女有權處置以及控制自己生育（包括正確條件下的墮胎權）的知識的結果。這顯然是一項長期的政策。除了訴諸野蠻的辦法，沒有任何人口控制政策能夠應對氣候的緊迫性。

5.4. 把氣候問題引入社會運動的鬥爭平臺。從紮根于現有鬥爭的廣泛動員的角度來看，我們的行為要使保護氣候成為社會運動的重大關切，並找到所有層面的要求的具體體現。例如：

- ▶ 爭取和平的鬥爭：生產和使用武器對於氣候變化來說是不可接受的愚蠢行為...其本身就是增加衝突的一種可能原因；

- ▶ 與貧困作鬥爭，爭取發展和社會保障的權利：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同資源和發展水準是成正比的。社會的不平等會增加遭受攻擊並且妨礙能源的改變；

- ▶ 婦女的鬥爭：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會加強婦女的具體要求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這些要求包括平等權利，社會負責照顧和保護兒童，反對讓婦女作雙重工，墮胎避孕的權利；

- ▶ 爭取就業的鬥爭：從根本上降低能源消耗，重組的領土和城市，照顧生物多樣性，發展公共交通，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以提供巨大的高品質的潛在就業機會；

- ▶ 為獲得土地、水和自然資源，為有機農業而奮鬥：實行勞動密集型之有機農業的農村社區，知道如何增加土地有機質含量，減少農業的溫室氣體排放；

- ▶ 反對農業市場全球化和自由化：全球化和自由化是造成農村荒蕪、饑荒、農村人口外流和/或生態系統被掠奪的一個原因，這些市場的自由化，直接（出口產品運輸）和間接地，也是廢氣排放的主要來源之一；

- ▶ 爭取庇護權：面臨環境難民特別是氣候難

民的增加，移居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它成了合乎人性的唯一反應；

- ▶ 土著社區的維權鬥爭：按照他們的知識，按照他們的生態系統尤其是森林的開發模式，這些社區最有能力維護和發展碳沉積；

- ▶ 反對工作的多變性和不穩定性，反對延長工作時間：多變的工作日程表，使勞動力流動性增大的資本主義競爭，迫使工人使用汽車。“及時”生產是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的一個主要來源。要大規模發展一個消費和休閒的替代模式，工作時間的減少是必要條件；

- ▶ 反對私有化，爭取在運輸、能源和水等領域的優質公共部門。只有優質的免費公共交通部門才能夠調和人的出行和碳排的減少。電力生產的自由化，使得間歇性可再生能源網路的引入變得複雜。只有不求利潤的公營企業能夠接受挑戰，在二、三十年內抑制住房方面的整體碳排放量。

5.5.反資本主義的鬥爭超越財富的再分配，按照這個觀點，力求使氣候成為工會左翼的一個軸心。大型國際工會聯合會的領導人，隨資本主義氣候政策起舞，交換他們就某些政策模式談判的可能性。這個定位在以幻想為基礎的“綠色新政”的建議中具體化，這個幻想就是綠色技術將有可能吸收失業，並推動繁榮和資本主義擴張的一個新長波。工會官僚接受生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盈利的要求以及主要的氣候政策手段：政府援助“綠色”公司，“生態稅”，清潔發展機制，排放權市場，甚至支持核能和生物燃料。這項政策很可能使工會運動成為災難的幫兇。它分化國際工人，在不同國家的各部門之間製造分裂。考慮到氣候和能源挑戰的重要性，使之成為其爭取改變之鬥爭的一個要素，這對工會左翼是決定性的。這場戰鬥是困難的，因為它不涉及“經濟復蘇”，而是關係到能源消耗的減少，抑制無用或有害的生產，這些行業工人的再轉業等等。由於工人同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聯結方式，是他們的

日常生存所依賴的，因而此戰有相當大的障礙。爲了接受這一挑戰，工會左翼必須離開以財富再分配爲中心的狹窄視野，以便駁斥財富的觀念與財富的生產方式，即該模式生產的根基。這種做法會引起一些重要的要求，如減少工作時間（連帶降低工作節奏，不減工資和雇用相應比例的新工人），擴大公共部門，免費獲得基本服務以及工人控制（工作節奏，生產，能源等）。

5.6. 向帝國主義主導的國家大量轉讓清潔技術，和資助這些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的影響，需要世界範圍內共用知識和資產，因此，要對資本主義利潤課以重稅。拯救氣候需要世界範圍內共用知識和資產。因此，它必須涉及：

- ▶ 取消第三世界的債務，和把南方國家獨裁者在西方銀行的資產歸還給人民；
- ▶ 解除銀行保密，抑制避稅天堂，對遺產徵稅，對投機活動徵稅等；
- ▶ 大幅增加帝國主義國家分配的政府的發展援助預算；
- ▶ 除了這種援助外，創建一個單一的世界基金，幫助發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化帶來的必然影響，並向這些國家的公共部門轉讓清潔技術，而不附加資金條件；
- ▶ 這個基金的來源應該來自稅收，來自對氣候變化最有責任的經濟部門（特別是石油、煤炭、汽車和電力生產部門）的利潤和過度超額利潤的徵稅；
- ▶ 抑制衛生系統的專利權，抑制生產基本消費品和服務（運輸、輕工、水和能源、通訊）技術方面的專利權，使所有的地球人都能獲得基本商品；
- ▶ 對放棄開採其礦物燃料資源的南方國家的財政補償制度。

5.7. 同預測相比，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的排放量將無法減少至少百分之三十，除非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受到質疑。在把氣候穩定在最低危險的水

準方面，帝國主義主導的國家的貢獻，可能只能通過回應大量人口的需求，由內部的發展達成，因此，與有利於農民農業的土地改革有關，同生產的方向轉向國內市場有關。因此，人類發展與氣候穩定的協調，需要採取措施反對地方統治階級，因爲他們使用發展權爲藉口，拒絕任何對燃燒礦物燃料的阻礙，掠奪自然資源，把森林據爲己用，充當碳排放額度買賣中間人，生產生物燃料，並向發達國家市場低價出口農產食品或工業品。爲了防止他們助長這種社會和生態有害的模式，置於南方國家處置的資金和技術手段，必須置於人民及其社會運動的民主控制之下。

5.8. 反對技術冒進，並把所有巨大的生態挑戰納入一個真正可持續發展的前景中。資本主義的歷史充斥著環境危機，沒有從全球生態角度去“解決”它們，只做了從屬於利潤的部分技術解決，其有害的環境影響稍後隨即出現。而按照這個同魔法師門徒一樣的方法，解決氣候/能源危機，可能有更加危險的後果，特別是在三個領域：增加訴諸核能，轉基因生物，以及煤炭開發新熱潮框架下的二氧化碳地質封存。反對這些資本主義的作法是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他們應該受到譴責，因爲這是瘋狂而肆無忌憚的資本主義增長的象徵，因爲該制度妄圖跳過自己頭，要不顧一切地維持產生利潤的積累。更一般地，氣候挑戰彙集了所有的環境問題。因此回應必須結合所有巨大的生態挑戰，特別是：（一）熱帶森林的保護，尊重依賴那些資源（碳匯）生活的土著社區的權利；（二）生物多樣性的保護；（三）水資源的合理和公共管理；（四）反對來自石油化工的幾十萬分子對生物圈的毒化，這些分子並不存在於自然界，因而在某些情況下不能用還原劑破解；（五）消除破壞平流層臭氧的氣體，代之於沒有其他危險的生態影響的化合物；（六）反對大氣污染及其對人類健康（哮喘，心血管疾病）和生態系統（酸化，對流層臭氧）造成的後果。

5.9. 譴責資本主義計畫和科學家們對局勢的判斷之間的鴻溝。建立與主要科學家的聯繫。提出知識產權和研究的社會作用問題。各國政府正試圖使我們相信他們的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氣候政策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必須大力反對這個做法。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譴責把政府目標同從IPCC報告之預防原則得出的結論分隔的鴻溝。這一公開譴責意味著，在批評主導意識形態和由大部分專家傳達的社會成見的同時，充分理解科學知識的本質。左翼必須建立與科學家的關係，邀請他們傳達他們的社會運動專業知識，挑戰他們一般的政治立場，依據他們自己的科學知識，推動他們解說這樣的矛盾，該矛盾的一方面是抗擊全球變暖所需要的全球合理解決方案，矛盾的另一方面，則是為部分資本主義合理性服務的極端各自為政的科學。考慮到政策擬訂中科學知識的地位，建立社會運動和重要的人文研究之間的關係，就是相當重要的。在此框架內，為爭取社會正義框架內的氣候穩定，我們要發展關於科學和研究作用的一個較普遍觀點。我們不拒絕技術解決方案，也不拒絕發展和進步的概念。相反，我們認為科學研究和技術要從資本的影響力下解放出來，使它們的潛力，可以用於大量和迅速地服務於能源效率方面的進步，合理的資源管理和可再生能源的可持續發展。我們要求為研究作公開大規模的再融資，終結把大學同企業和金融資本聯結的合同，在轉型背景下，在社會正義的框架內，朝向建立一個沒有化石燃料的社會，民主地決定研究的優先次序。

5.10. 反對使個人感到內疚的企圖，但肯定社會上對能源需求盡可能的清醒。政府的說法旨在使人們感到內疚，它把全球氣候變暖的責任置於個人行為上，尋求用魔法驅除社會不平等，掩蓋資本主義的責任，設法轉移人們對必要的深刻結構變化的關注，為“碳稅”這一類的不公正措施鋪平道路。在超過一半的人類生活在長期低消費

水準的情況下，相信通過反對過度消費的“文化蔓延”運動，可以拯救氣候，這是一個錯覺。但是，押賭注於假設的革命性科學突破，以避免質疑個人過度消費及其引起的後果，這也是一種幻想。不是把消費領域的行動同生產領域的結構性變化對立起來，而是必須把前者理解為一種使人們意識到後者之需要的手段。替代性的社會習俗，民主運動和動員，甚至那些只涉及少數人的，對抗生產主義和消費主義的運動，也可以對集體意識的形成發揮積極作用，這個集體意識就是生產領域的結構變化是必要的，而這些變化將伴隨著更高品質的生活。

5.11. 實習災難發生時的大眾援助。氣候變化大大增加了災難的風險，特別影響到工人和窮人，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面對這一威脅，我們必須準備在兩個不同的層面干預社會運動：需求層面，也即把國家和政府擺在他們的責任前面，以及直接的，民眾的和相互依存的援助層面，這個由地方居民及其組織負責，加上一個世界範圍的活動分子網路的援助。事實上，在自然災害中所取得的經驗表明，這些民眾的援助措施更快，更直接地指向窮人和他們的實際需要，而且花費較低。此外，他們贊成發展不同種類的社會關係和既定秩序的論爭。

2009年10月11日

註釋

[1] 見在第四國際會議上的氣候報告

·丹尼爾·坦努樂，農學家和生態社會主義者，環保主義者，“左翼”雜誌撰稿人，（LCR-SAP的月刊，第四國際比利時支部）。

關於氣候變化的報告

丹尼爾·坦努樂

第四國際的國際委員會（IC）在 2009 年 2 月的會議上，討論了丹尼爾·坦努樂起草的關於氣候變化和氣候運動的報告，以下是我們對該報告所作的修改版本。此報告已被用作第四國際世界大會撰寫關於這些問題的決議的基礎。

我們希望該報告喚起其他人的來稿——來自參加了該文本討論的國際委員會成員，或來自從事氣候變化運動的活動分子，尤其是來自研究生態和社會之間的聯繫的積極分子們的來稿。我們期望，這類稿件的出版，有助於集體的反思。

I. 氣候威脅：原因，責任，社會和生態的影響



遭受了環境災難的辛巴威的加里巴湖（民主開放，公共創作）

1. 氣候變化是一個沒有先例的事實。

氣候變化是一個事實。在 20 世紀，地球表面的平均溫度上升了 0.6 攝氏度，海平面上升了 10 至 20 釐米，冰川幾乎處處都後退了很大的比例，北大西洋的旋風暴力增加了，有更多的極端天氣現象，如暴風雨，洪水和乾旱，記錄在案。

這不是一個週期性變化的問題（例如，“厄爾尼諾”現象），而是深刻長期的變化問題，顯示了氣候系統的嚴重總體不平衡。這些不平衡的發動機——平均地表溫度的上升——已經

達到至少一千三百年來的空前規模。這種上升同另一個現象是密切相關的，是八十萬年來史無前例的：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以碳酸氣和甲烷形式的增加，——這二種氣體對溫室氣體效應的作用，已經由物理學確立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溫室氣體的排放是目前全球變暖的主要原因，這個解釋，超過百分之九十是確定的，不再是科學層面上可信與否的爭論問題。眾所周知，目前的全球變暖是前所未有的，根本上不同於其他已知的地球歷史過程中的全球變暖階段。在過去の間冰川期，地球相對於太陽的位置自然變化，或在太陽活動中引起全球變暖，有利於生命的發展，這發展反過來又導致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的上升，進一步加劇全球變暖進程。今天，因果關係已經反轉：自然因素只解釋了非常有限的一部分的全球變暖（約百分之五至十）；當前氣溫上升的主要部分，直接來自於人類活動造成的大氣中二氧化碳和甲烷濃度的急速上升。換句話說：以前氣候變暖造成溫室氣體效應的增加，今天溫室氣體影響的增加，直接導致氣候變化。

2. “氣候變化”的說法是誤導性的：我們面臨著一場殘酷的動盪，它在人類時間上是不可逆轉的。

“氣候變化”的說法是誤導性的：它使人覺得那是一個漸進的改變，而我們面臨的是一場殘酷的動盪，它的速度正在加快。其肇因是三種增加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的經濟活動：

（一）森林，天然草地，土壤和泥沼碳含藏有機質形式的碳。砍伐森林，把自然草場改造成耕地，濕地的排水和不良種植方法會使這些碳釋放出來。此外，過度使用人工硝酸鹽的化肥（17.9% 的排放率）造成另一溫室氣體氧化亞氮的排放；

（二）任何燃燒都會引起二氧化碳（CO₂）的排放。但是，生物材料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同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天然氣）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之間，有很大的差異。前者因為生

態系統（綠色植物和海洋）不斷的吸收和排除二氧化碳（即“碳迴圈”），它的迴圈回收沒有任何的問題。相反，後者只能在一定限度內被回收。現在，兩個世紀的化石燃料的燃燒，已非常迅速和持續地把大量二氧化碳（56.6%的排放），注入到了大氣中；

（三）某些工業生產過程，對溫室氣體（氟化氣體）的排放是有責任的，它們的性質卻還是未知的。

大氣中，天然存在的碳的濃度非常微弱。正是這個原因，人類的活動才能對氣候系統產生這樣的影響。目前，我們送到大氣中的溫室氣體總量，是自然吸收能力的兩倍。未吸收者積累下來，導致溫室氣體增加，溫度因而升高，而這種積累往往隨著全球變暖而增加。因此，全球變暖的主要機制，可以總結為，來自人類活動的氣體排放使得碳迴圈飽和。

這氣候變暖對於人類是不可逆轉的。即使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立即穩定下來，全球變暖的影響也會讓人感受近千年，由於巨大海水的溫度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變均勻。在完全不穩定的條件下，該機制將不可避免地疾速加快，引發出極其危險的現象，例如兩極冰蓋解體，或者釋放永久凍土中甚至海洋深處含藏的大量甲烷。

押賭於以下的想法是錯誤和危險的，該想法就是：煤，石油和天然氣的存儲耗盡的時間，正好是可以讓人類免遭這些重大危險的時候。事實上，已探明的化石燃料儲備（特別是煤炭）足以造成無法控制的危險加速來臨。在這種情況下，地球可能會再次發現久違了六千五百萬年的條件，因而是人類從未經歷的狀況：世界上沒有冰，海平面將比目前水準高約 100 米。

3. 一般來說，氣候劇變不是因為“人類活動”，而是由於資本主義工業革命以來這種活動的形式。

就像媒體和 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報告所說的，一般來說，氣候劇變不是因為“人類活動”，而是由於資本主義工業革命以來這種活動的形式，特別是化石燃料的燃燒。這種現象的原因基本上是在於資本主義和

生產主義的積累邏輯，其歷史的重心位於帝國主義大都市。

沒有煤炭，工業革命的經濟起飛不可能大規模地實行。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氣候變化一概歸咎於“進步”，那不過是簡單粗鄙的說法。事實上，相當快地，一些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新可能性出現了，它們有可能把合理的發展和環境的保護協調起來。在這方面，有一個明顯的對比，就是：資本主義（和非資本主義國家）持久地漠視光伏效應（或光電理論）（1839 年發現的），而立即地迷戀於原子裂變。不提供大量的公共投資，核工業的發展就不可能，儘管這種技術有可怕的危險，這種公共投資仍舊獲得批准授權。太陽能的潛力卻從未受益於這種關心。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大能源集團獲得了舉足輕重的分量，使他們能夠根據自己的利益塑造能源系統。這些團體的權力，不僅來源於這個事實，即：對於任何經濟活動而言，能源是至關重要的，並且能源投資是長期的，而且還基於這一事實，即：化石燃料儲量的有限性及其私人佔用的可能性提供了實行壟斷價格的可能，從而以能源租金的形式，獲得穩定的巨大超額利潤。

石油作為一種高能而廉價的液體燃料，它特別的關鍵作用是越來越多地聚集和集中資本，控制這一部門以便同時在經濟和政治層面上，佔據戰略地位。電力工業和依賴石油的大部門（汽車，造船，航空，石油化工），同煤炭生產企業一起，還有石油跨國公司，有系統地阻擾替代能源資源，技術和分配模式的使用，同時在系統和產品的層面上，鼓勵過度消費，並限制能源使用效率的進步。

為了瞭解氣候變化的機制，我們必須補充分析，考慮資本主義總體上聚集中心的傾向，考慮不斷用死勞動替換活勞動，技術標準化和世界市場上大眾消費品的過度生產的資本主義趨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趨勢特別導致數以百萬計的私人汽車的生產。在“拉動”戰後數十年的長期擴張波的同時，這種生產也造成化石燃料使用的爆炸性增加，因而造成碳排放量的爆炸性增加。

最近，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向新興國家的大規模資本輸出，面向世界市場的精益生產，公共交通（特別是鐵路）的拆除，以及航空運輸及航海運輸的大量增加，進一步加劇了該現象。

4. “實現存在的社會主義”國家也負有重大責任：放棄世界革命，他們盲目模仿生產主義和複製資本主義技術。

在氣候變化的分析中，試圖走另一種資本主義道路的國家的責任，是無法逃避的。主要是由於其官僚蛻變性，這些國家返回生產主義，使自然資源特別是能源的浪費，到達前所未有的程度。

沙皇俄國是一個落後的國家。革命和內戰結束後，不訴諸化石燃料，它不可能重新站起來。這部分地有助於解釋，對於不可再生能源基礎上的制度的必然僵局，蘇聯理論家缺乏前瞻性的思考，但其他因素可能必須加以考慮（見下面的第4章）。看來，肯定的是，隨後的蘇聯經濟發展，有可能利用其他的選擇，但史達林獨裁政權和“社會主義先在一國實現”的蛻變阻止了這種可能性。

放棄世界革命的觀點，指望與帝國主義和平共處，希望維護自己的特權，扼殺創造性思維，史達林官僚集團選擇既要遵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發展踪跡 --- 由軍事技術推進 --- 又要模仿資本主義能源系統 --- 配合資本的需要。在赫魯雪夫趕超美國的幻想下，這種邏輯達到了高潮。它特別導致了無意義的核能發展，導致了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災難。

以材料消耗的噸位為基礎的獎金制度，為生產結果而以物質獎勵管理人員的官僚模式，構成了浪費的一個特定因素。以資本主義模式作為比較參考點，其結果是一個更加污染和浪費而效率更低的能源系統。

最後，蔑視群眾的需要，把他們排除在政治決策之外，把他們維持在互不來往的社會原子化狀態的意願，導致在主要的一系列領域（城鎮和農村規劃，建築，城市規劃...更不用說強迫型的農業集體化）中的非理性選擇。這些選擇的結果加劇了資源浪費和整個系統的能源效率

低下，更不用提在其他領域的嚴重後果，特別是污染和公眾健康。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開始代表世界排放量的一個重要份額。把這些國家每年碳氣體人均排放量噸位，和同一時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排放量的噸位作比較，清楚地表明了“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在破壞氣候上的特別責任。例如，就在柏林牆倒塌前，捷克斯洛伐克每年人均排放 20.7 噸二氧化碳，東德每年人均排放 22 噸。相比之下，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 --- 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最大二氧化碳排放者 --- 那個時候的每年人均排放量分別為 18.9，16.2 和 15 噸的二氧化碳，而它們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則相當高。

5. 氣候變化給人類和生態系統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氣候變化給人類以及生態系統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毫無疑問，即使是有限的溫度上升，其負面影響遠大於其積極作用。根據 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報告：[1]

►對於 1°C 到 5°C 之間的任何溫度增加，亞熱帶和半乾旱熱帶地區的乾旱會強化。增加 2°C 時，每年有數百萬人可能會受害於沿海洪水。增加 3°C 時，大約有百分之三十的沿海濕地將會消失。

►目前，全球變暖正在減少為當地居民生產生活資料的小農們的收穫和小型漁民的捕獲。增加 1°C 以上時，預計熱帶地區某些穀物的生產率損失將會有增加，增加 3.5°C 以上時，這些地區所有穀物的生產率損失會增加。在溫帶地區（高緯度地區），據估計，增加 1°C 以上時，某些穀類的生產率將有提高，然後，從 +3.5°C 起，則生產率的下降越來越普遍。

►另外，由於營養不良，腹瀉，心肺呼吸和傳染病的增加，衛生系統已經面臨著額外的工作量，而那些疾病的增加是氣候變化的後果。發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已經體現在熱浪、洪水和乾旱中，就像某些疾病的傳播媒介（按蚊傳播瘧疾，虱蠅傳播萊姆病...）覆蓋區域的變化所反映的那樣。更有甚者，燃燒化石燃料造成的空氣污染，特別是細微顆粒污染，是令人極為

擔憂的、哮喘一類呼吸系統疾病增加的一個主要原因。

▶從增加1°C起，據估計，百分之三十的動物和植物物種滅絕風險會增加。至於上升5攝氏度以上，這將意味著世界各區域大量的物種滅絕。這些預測更令人吃驚的是，同60萬年前地球所經歷的恐龍消失時候相比，今天其他因素（如土地使用）對物種滅絕浪潮有更大和更迅速的作用。超過其重要的審美，情感和文化的影響，這個生存資料的根本貧困問題構成嚴重威脅。事實上，調節生態系統特別是耕地生態系統的適應能力的，是生物多樣性，例如，選擇種植適應氣候變化的植物的各種可能性。

▶從大約2.5攝氏度增加起，15%至40%的陸地生態系統排放的二氧化碳開始多於吸收的，這表明，碳迴圈的飽和將增加，全球變暖自身將因為無法控制的雪球效應（“失控的氣候變化”）而加強。

據某些預測，在人類層面上，隨著溫度的上升，各種災害，疾病和短缺的附加受害者趨於增加得更多更迅速。3.25°C的上升（相對於前工業化時期），這個數值位於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預測的中段左右，這時，從現在到2050年，沿海洪水將造成1億至1.5億受害者，饑民高達6億人，瘧疾患者達3億，而水資源短缺將影響到35億多人。

這些估計的明顯特點，是或多或少的高度不確定性。此外，特別地，如果全球變暖仍然是有限的，這些影響受制於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增加或減少它們的社會因素。沒有政策的改變，它的情形仍然如此，即：威脅的總體規模相當大。

6. 今天，南方各國人民已經為氣候動盪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們是氣候動盪的主要受害者。

平均而言，2000到2004年間，每年有326次的氣候災難的記錄：他們造成二億六千二百萬受害者 --- 幾乎是1980年和1984年之間的3倍以上。2億多的受害者生活在非經合組織國家中，而這些國家對溫室氣體的增加，只負有微小的責任。2000-2004年，在發展中國家，19個居民中就有1名受到氣候災難的影響。經合

組織國家的相應數位是1500人中有1人受害（比發展中國家低79倍），參見[2]。

除非應用適當的政策，否則氣候偏差問題將加劇並達到戲劇性的比例。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承認，由於氣候變化，即使是“千年目標”也將無法實施，而它們顯然是不夠的。在氣候災難事件中，一些最貧窮的國家可能陷入一連串沒有出路的社會和經濟倒退。例如，數以億計受到海平面升高威脅的人中的絕大多數，處在中國（3000萬），印度（3000萬），孟加拉（1500-2000萬），埃及（1000萬）和其他三角洲 --- 特別是湄公河和尼日爾三角洲（1000萬）... 海平面升高1米，越南四分之一的人口，將不得不轉移。

糧食不安全性的升高是氣候偏差的另一個顯著範例。根據某些資料來源，到2080年，發達國家的農業生產潛力，可能會增加百分之八，而發展中國家將會減少百分之九。拉丁美洲和非洲將成為受影響最嚴重的大陸，生產率的損失高於百分之十二，甚至百分之十五。按照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報告，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亞洲的某些地區，非灌溉農業的生產率，在未來20年可能減少一半。

其後果可見諸於這些情形：對資本主義農業的強烈依賴，大莊園主統治的增長，打擊小農戶的日益嚴重的貧困和饑荒，農村移民和環境退化。

7. 卡特裏娜颶風的例子也表明發達國家工人和窮人面臨的危險。

2005年9月，襲擊新奧爾良的卡特裏娜颶風表明，面對氣候變化，發達國家工人階級中最貧困的階層幾乎沒有比帝國主義主導國家的群眾更好的裝備：他們居住的地區最容易受到災難，他們沒有逃難工具，或者因為擔心無法返回家園和失去一切而害怕這樣做，他們的財物沒有投保，或不足以投保。

卡特裏娜導致1500人死亡和78萬人流離失所。其中的75萬人沒有任何保險。新奧爾良人口包括百分之二十八的窮人（美國平均數是12%），而非洲裔美國人中的窮人占百分之三十五（美國平均為百分之二十五）。他們居住的

街區受影響最嚴重：淹沒區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是黑人。

由於公共部門當局並沒有組織疏散，48萬城市居民中的138,000人，陷入了困境。沒有飲用水，沒有電或電話，援助來到以前，他們等待了5天多。他們絕大多數是窮工人，失業者，貧困兒童和沒有資源的老人。

這張清單同美國統治階級一般的階級，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政策，尤其是布希政府的政策，是分不開的。從2003年起，爲了給“反恐戰爭”提供資金，聯邦政府系統地減少了分配給負責維持堤防部門的預算；2005年，該部門只收到了它所要求的資源的六分之一。災難後，通過一項旨在驅除窮人出城和攻擊工人贏得之社會成果的（特別是最低工資條款的廢除）重建方案，這種傲慢和殘酷的政策，在繼續實行。

這張清單也離不開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其他社會不平等現象，首先是加諸在婦女身上的不平等現象。美國黑人婦女（和她們的孩子）付出了最沉重的災難代價，這並非偶然的。一方面，婦女處在氣候威脅的前沿，因爲在13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們中，她們占百分之八十。另一方面，因爲她們所受的壓迫，婦女以一特殊方式受到影響。例如，在最不發達國家，由於氣候變化，導致必須收集較多的木材取暖，農業工作的收入則減少，而兩項工作主要由婦女擔任。在較發達的國家，不穩定的就業，非全日制工作和低工資特別影響婦女，因此她們較少可能保護自己免受氣候變化的影響。在這兩種情況下，其後果更嚴重地影響到獨自撫養孩子的婦女，特別是其中的年輕婦女。

II. 拯救氣候的物質和人力限制

8. 最大的緊迫性。看起來，情況並非即使溫室氣體的排放非常疾速的減少，也不再能使我們不越過危險臨界點。

按照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說法，從現在起到2100年，維持溫室氣體排放的目前趨勢將導致平均地表溫度的上升，同1990年比較，上升的範圍在1.1到6.4攝氏度之間。範圍幅度的解釋，一方面來自氣候模式的雙重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來自人類發展的方式。

立足於這樣一個事實，即1990年至2006年觀察到的氣溫升高處在各種預測範圍的較高水準上，我們得出結論，隨著不變的政策，在相對短的期間，人類很可能會面臨至少高出18世紀末氣溫4.5攝氏度的熱變化。

這個變動將代表這樣的一個變化，其存在的條件，至少同2萬年前分隔現代時紀和上一個冰期的那種情況是相當的。但是，遠非用幾千年的時間，這個變化可以在幾百年，甚至更少的時間裏發生。這種速度，嚴重降低人類社會和生態系統的適應可能性。

1996年，歐盟把最多上升2°C定爲其氣候政策的目標。上述決定的基礎是對危險臨界點達到時間的估計。自那時以來，這些估計數已向修正，因爲專家把臨界點定在1.7°C左右。事實上，我們看到，對於這個修改的臨界點，風險已經很高，尤其是在三個方面：生物多樣性的下降，海洋水平面的增高，熱帶和亞熱帶國家的農業生產率。

前工業時期以來，地球平均地表溫度增加了0.7攝氏度，而且一個0.6攝氏度的不同的氣候變暖可能已經在醞釀中。因此，拯救氣候的迴旋餘地是極其狹隘的。局勢的緊迫性，必須被視爲最高級別的。

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活動，或多或少都有一長段時間（CO₂有約150年）。由此推斷，溫度的穩定意味著排放量減少，在溫度的穩定目標定得低的情況下，意味著更迅速和嚴厲的排放量減少。

在其第四次評估報告（2007年）的框架內，IPCC測試的最爲徹底的方案，包括一個穩定在百萬分之三百五十至百萬分之四百單位（ppm）之間的CO₂的大氣濃度，相當於445-490 ppm濃度的二氧化碳當量[3]。這種方案意味著：（i）從現在到2050年，總排放量減少50%到85%；及（ii）最遲到2015年，溫室氣體排放的數量在世界水準上開始下降。

發達國家應承擔超過百分之七十的氣候變化的責任，因爲二百多年來他們一直在燃燒化石燃料。因此，發達國家和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的努力，必須聯繫其歷史責任做驗證。在這種情況下，從現在到2050年，前者應減少其排放

量的 80%至 95%，從現在到 2020 年，開始減少 25%至 40%。至於後者，按照 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報告，從現在起到 2020 年（對於非洲，到 2050 年），它們的排放量將“大大偏離所參照的方案”。[4]

二氧化碳是任何種類燃燒的一個必然的產物，礦物燃料之燃燒提供了世界能源供應的百分之八十。因此，上述目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它們意味著，要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內實現這些目標，差不多要求完全放棄使用礦物燃料，因此必會有深遠的社會經濟突變。

即使上述目標實現，氣溫上升可能會稍微超過 2 °C：按照 IPCC 的說法，結果數字在 2 至 2.4 °C（在大約一千年的範圍裏）之間。換句話說，似乎不再可能不越過危險臨界點。我們只可以得出一個理智的結論：最嚴格的減排目標是必要的，盡可能地不讓所定的目標模糊不明，而是一個不能避免的“必須”。

9. 鑒於 IPCC 的報告低估氣候變化的某些參數，故所制定的目標更是必須遵守的。

爲了充分衡量挑戰的規模，有必要明確，IPCC 所得出的結論依賴於保守的假設，因此，爲謹慎起見，我們應該以最壞的估計，作爲將要採取的行動的基礎，並把它們作爲最低限度的必要條件。

此謹慎的需要特別地來自兩個因素：

a) IPCC 低估非線性現象。預測的不確定性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於所謂的非線性現象的極其複雜性，如格陵蘭和南極冰帽的可能解體。冰的融化是一個連續的過程，與其相反，冰帽位移的進展，直至目前爲止，日新月異，還沒有能夠給它建立起一個模型。這無疑有助於解釋，爲什麼 1990 年至 2006 年間觀測到海平面每年提高 3 毫米，也就是高於模型預測的百分之六十。格陵蘭和南極的冰累積總量分別相當於海平面上升約 6 米和約 60 米。然而，根據某些專家的說法，大氣二氧化碳濃度處在一個跨越的過程中 --- 在另一個方向 --- 跨越相應於 3 千 5 百萬年前南極冰蓋形成的品質臨界點。因此在短期或中期，部分突然崩潰是可能的。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內，它可能會導致海洋水

平面提高數米。這是中短期內氣候變化加諸世界的一個最嚴重的威脅。

b) IPCC 過度估計經濟的碳強度的自發下降。生產一單位 GDP 需要一定量的礦物能源，從而產生一定的排放量，我們可以經驗地觀察到，自工業革命以來，經濟的能源強度和碳強度相當規律地有所下降 [5]。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不用說，按既定比例減少排放的必要努力，如果同該強度是靜態或增加的情況相比，就無須那麼大了。IPCC 的工作就是基於這樣的假設。然而，這同近年來觀察的現實矛盾：自 2000 年以來，我們可以看到，同有關預測的情形相比，它增加了。這特別是因爲中國和印度大量的資本投資，導致在這些國家建築許多燃煤發電廠，生產廉價電力 --- 和爲西方市場生產廉價產品。根據某些消息來源，2000 年以來，世界排放量的百分之十七的升高是由於經濟的碳強度的增加，換句話說，由於使用更多污染的技術。

10. 從源頭上減少排放量，是唯一的結構性戰略。減少來自礦物燃料燃燒的排放量是當務之急。

從理論上講，緩解可有三種方式：碳沉積的保護和發展，二氧化碳的捕獲和地質封存，從源頭上減少排放。只有減少排放量提供了一個結構性的解決辦法。

由於濫伐森林是溫室氣體排放的第二大原因，保護現有森林是阻止氣候改變惡化的一種手段。但這並非是一個結構性的解決辦法：(i) 因爲一個成熟森林的碳排放（呼吸放出）同它吸收的（通過光合作用）一樣多；(ii) 我們已經看到，從某個角度上說，全球變暖使得森林排放量超過其吸收量。

成長中的樹木吸收的碳多過排放的。因此，在某些社會生態條件下，種植樹木是抗擊氣候變化的一種手段。但這也不是一個結構性的解決辦法，因爲：(i) 森林的擴大受限於可用的大地表面；(ii) 樹木倒下（或在一定時間後，取決於木材作何用）時，儲存的碳被釋放。

“碳捕獲和封存”法（CSC）是把二氧化碳從污染工廠的煙霧中分離出來，隨後把它深深

注入密閉的地庫裏。可能的地點似乎有大量的容量。這些技術令人作迷的原因是這個事實，即：它使得有可能使用煤炭儲備，而煤炭儲備量遠遠大於石油和天然氣的儲量。然而，很明顯，CSC 也不是一個結構性的解決辦法：地庫的容量必然是有限的，而且只有大企業排放的二氧化碳可以捕獲到。

關於碳迴圈飽和的問題，減少溫室氣體源頭的排放量基本上是唯一的結構性解決辦法。可以對所有有關的溫室氣體，實施減排戰略，但大幅度削減化石燃料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拯救氣候戰略的軸線：（i）因為燃燒化石燃料是全球變暖的主要原因；（ii）因為二氧化碳是目前主要的溫室氣體；（iii）因為它在大氣中的壽命比較長。

除了這些技術上的原因，應當強調的是，從社會的角度來看，我們不能把這兩者放在同一水準上，一方面是，汽車或航空運輸造成的化石二氧化碳排放的減少，另一方面則是，水稻種植產生的甲烷排放的減少或者森林土著人進行刀耕火種農業所造成的非礦物二氧化碳排放的減少。

11. 發達國家能耗的絕對降低是通向可再生能源和氣候拯救的條件

大幅度削減化石二氧化碳排放量，意味著在同一時間訴諸兩個杠杆：（i）用可再生能源更換化石能源；（ii）降低能源消耗。

各種形式的太陽能技術潛力（風力發電，太陽能熱，太陽能光伏發電，水力，海洋），相當於全球能源消耗的 7 至 10 倍[6]。由於科學研究和技術的進展，在今後幾十年裏，它可以大為增加。因此，不訴諸核電的世界經濟的總脫碳化，不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自然而然，這並不意味著人類發展的大幅倒退，也不意味著在擺脫繁重，重複或危險工作方面的倒退。

然而，這一巨大的技術潛力，並沒有使可再生能源簡單地取代化石能源這樣一個方案生效，一切保持不變。事實上，（i）太陽能是分散的；（ii）在世界各個地區，它採納的形式多種多樣，或多或少地可以使用；（iii）這些形式的大部分是間歇性的，所以它們的使用，要求發展使用新載體和特殊基礎設施的存儲系統。

這就是說，過渡到可再生能源意味著建造一個新的國際能源系統，一個分散，多樣，經濟和面向效率最大化的能源系統，它完全立足於太陽能潛力的開發。這是一個巨大的事業，需要重要的投資；因此它需要能量，至少在過渡時期的第一階段，只能依靠化石的能源 --- 從而成為一個額外的排放源 --- 或者...核能 --- 從而成為不可接受的生態、社會和政治危險的來源（見下文）。

我們已經看到，爲了不超過 2 攝氏度的氣溫上升之幅度太遠，最晚到 2015 年，全球排放量應開始減少。由此推斷，過渡所產生的額外排放必須在其他地方作補償。換言之，具體地說，氣候狀況的緊迫性和嚴重性是如此厲害，以我們目前的知識狀態，如果最“耗能”國家的能源消費大幅度減少，在這樣嚴格的條件下，可再生能源之旅，也只提供了一個出路。反過來，這種減少意味著物質交換的減少 --- 不是很大但仍然可觀 --- 即生產和材料消耗上的交換的減少。

從而，對付氣候變化的鬥爭以決定性的方式證實了更一般的環境問題，即日益快速之節奏的不可持續性，按照這個節奏，資本主義經濟從自然環境索取資源，而不考慮它們再生所需要的時間。

12. 發達國家能源消費的減少必須嚴厲。它不僅等同於維持先前的戰果，而且也等於社會的進步。

能源消耗的減少，實質上關係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那裏能源經濟排放量的可能減少是非常可觀的。國與國之間的差別證明了這一點：例如，美國居民平均每年消費 8 噸石油量，在同等的的生活水準下，瑞士居民是 4 噸。

雖然它們都非常高，但目前對削減潛力的估計數卻是大為偏低了。事實上，他們沒有考慮到，大多數的結構機制，使資本主義社會成了一部浪費能源和資源的機器：生產過剩和過度消費的趨勢，無用或有害的生產（廣告業，武器製造等），熱能和電力的分開生產，低能源效率的各種器材生產大規模移向新興國家，而新興國家則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生產，

爲了世界市場的及時生產，使得運輸業超級發展，加速淘汰的產品，由於戰爭引起的破壞/重建的錯亂，荒謬的資本主義領土組織（郊區，工業區的擴大等），更不用提富人控制物質財產的瘋狂，和難以抑制的消費這種大眾社會弊病的代價。

在歐盟和日本把能源需求劃分爲兩個，在美國是四個，這是一個在技術上可實現的目標。鑒於能源浪費的具體機制，至少我們可以說的是，這一目標同社會成果的維護是相合的：它可以等同於相當大的社會進步。這取決於政治選擇。

13. 沒有南方的參與，已不再可能拯救氣候。南方人民發展權的具體化只能求助於清潔技術。

即使是發達國家水準上的最嚴厲的努力都不再足以挽救氣候。除了少有的幾年外，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首先是新興大國的某種參與已經是不可缺少的。IPCC 的數字，建立在不同歷史責任的基礎上，它們規定，到 2020 年（非洲爲 2050 年），這些國家必須“大幅度偏離有關的參照情況”。結合森林保護和能源效率的提高，偏離“一如往常”的排放情況的 15% 至 30%，是可以達到的。但是，除了社會戰略外，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權利的具體化，需要大量轉讓清潔技術，使這些國家能跳越過化石燃料基礎上的經濟模式。

14. 同氣候變化作鬥爭是不夠的，必須適應這個現象的現在不可避免的部分。這對南方人民是一項重大挑戰。

即使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一個非常激進和迅速的減少，也不再可能防止氣候變化，其影響正在顯現。任何戰略，不管它怎樣，因此必須清楚闡述這一現象的緩和過程，以及對它部分影響的適應調整，從現在開始，在世界範圍內，根據各個國家的歷史責任和它們的能力，這一適應調整不可避免。

按一般的情況，緩解和調整適應兩者的關係是，前者越是強有力和迅速，後者則越是有限，反之亦然。比前工業時期的溫度上升 2°C 以上時，調整適應將會越來越困難和昂貴。從某種程度起，調適將是不可能的 --- 除了代價爲數

以億計受害者的人類災難和一個非常大規模的生態災害。

一方面，適應調整並不限於人口保護基礎設施的建造或加固（抗洪水或水位上升的大壩，風暴避風港，排水系統等），另一方面，也不限於發生災難時可用以動員的工具的增加。氣候變化影響到社會生活和所有生態系統的所有領域，並有可能在未來影響它們更甚。因此必須採取調整措施的領域有很多，比如：水資源管理，城鎮和農村規劃，農業，林業，公共衛生，環境政策（尤其是濕地和紅樹林的保護），飲食習慣，風險保險等。

對於帝國主義國家，適應調整代表一個重大挑戰，在這些國家氣候變化的影響已被實實在在地感受到。發達國家爲家庭的適應調整在做大量的投資。由於發達國家要承擔氣候變化的主要責任，他們應當支付欠發達國家適應調整的相關費用。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的估計，這意味著，到 2015 年，每年 860 億美元的南北財金轉移。

超越技術方面，實際上，最重要的適應調整措施是制止貧窮和大幅度減少社會不平等。事實上，適應調整能力直接關係到資源，社會權利和社會保障系統的有效性。對於最貧窮國家婦女，適應調整是一個特別重要的挑戰，因此也是對整個社會的重要挑戰，因爲婦女的工作提供了百分之八十的食物生產。

15. 人口水準是氣候演變起限定作用的一個因素，而不是氣候變化的原因。持續的人口結構的轉型是可取的，但沒有任何人口控制的政策能夠接受氣候的挑戰。

世界人口的演變明顯影響氣候穩定情況：對於 60 億人口，把排放量除以 2，則表示每個人每年可以排放 0.5 噸碳；對於 90 億人口，所有其他條件相同，則排放量應分爲三，那麼每年的碳配額將降低到每年人均約 0.25 噸。但這個總體演算法掩蓋了一個事實，即一些國家，例如美國，人口占世界的百分之五，消耗的能源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五，對四分之一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有責任。

發達國家的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多 8 至 20 倍。如果考慮

1950-1990 年期間，我們看到：（一）所謂“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增加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一定低於發達國家消費量的增加，甚至低於這些國家的人口增加；（二）如果南方國家的人口維持在 1950 年的水準，同時採用北方國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準，那麼全球變暖將比現在嚴重得多；（三）另一方面，如果北方國家的人均排放量相當於南方國家的人均排放量，那麼即使沒有任何控制人口增長的政策，全球變暖也將肯定會比現在輕得多。

因此，人口，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人口，不能被認為是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甚至也不是一個重要原因。人口的增加，首先在發達國家，然後是在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本身就是隨著工業革命而創建的生產消費模式的一個產品。相對人口過剩是這個系統人口規律的一個重大特點，這個系統需要一個長期“後備軍”。很顯然，根據 IPCC 的報告，該系統有引起氣候災難的威脅。因此，急需質疑挑戰這個系統。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一方面，它在我們所有的很短時間內挑戰全球變暖，另一方面，又兼顧了對人權尤其是婦女權利的尊重。

人口結構的轉型主要進行在發展中國家，它進展之快，超過了設想。由於一系列的環境原因，可以期望這一轉型繼續下去。這意味著社會進步，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為婦女提供資訊，並擴展她們控制自己生育能力的權利（包括在適當的條件下墮胎的權利）。它必然是一個長期政策。缺乏訴諸前所未聞的野蠻手段，沒有任何的人口控制政策能夠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

III. 資本主義的反應

16. 資本主義的遊說行動，使我們在氣候鬥爭中失去了 30 年時間。

有關全球變暖風險的第一個科學警告要回溯到 1957 年。1958 年，莫納羅亞火山天文臺（夏威夷）成立，自其成立以來，它已確定了大氣中溫室氣體積累的加速。但是我們不得不等待 20 多年，才等到聯合國召開第一次世界氣候會議（1979 年於日內瓦），超過 30 年的等待，才有 IPCC 的成立。它成立的兩年後，IPCC 通過

了第一次評估報告（日內瓦，1990 年），其結論只由隨後的三個報告做了證實。

IPCC 所建議的國際行動方向的第一個象徵性的步驟，發生在地球首腦會議（里約熱內盧，1992 年）的時間，在此期間，154 個國家簽署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 氣候公約）。該公約通過的重要原則有：“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最終目標”的確定，“穩定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的水準以防止對氣候系統的任何危險的人為干擾”。但是，並未指定這個水準，檔自我滿足於設定這樣的願望，即各國將自願減少排放量，使它們在 2000 年返回到 1990 年的水準。但我們必須等待到 1997 --- 研究人員第一次警告的 40 年後 --- 才在京都締結第一個具約束力的氣候條約。

對危險的認識極端緩慢，最初的原因可能是不確定性和氣候變化影響的特點非常不同。但後來，資本主義遊說起了關鍵作用。事實上，從上世紀 80 年代起，同化石燃料最相關的美國資本的各部門代表，建立並慷慨地資助遊說組織，讓它們收買有懷疑的政治科學家，記者和政治代表，以防止氣象學家中日益增長的共識，蔓延到決策者和公眾輿論那裏。

有時給“科學”估價，有時輕蔑不信任它，有時強調京都議定書所要求的犧牲，有時強調它的無意義，這些說客無所不用其極，有系統地把氣候變化的現實降低成可疑和有爭議的假說，甚至是世界末日的宗教風尚或反對美國生活方式的國際陰謀。

通過其五花八門的行動，這些說客對各級美國政治代表加諸了霸權性的影響。考慮到美國作為帝國主義超級大國的主導作用，該霸權能夠使得他們（一）在國際氣候談判進程的關鍵時刻（海牙會議，2000 年）施加決定性的影響；（二）在國際舞臺上，給許多資本主義勢力提供“論點”。

歸根結底，問題是“麻煩的真相”本身，包括它對美國統治階級的作用。但是，說客所採取的行動，使跨國公司獲得 30 年的礦物能源，並使人類失去了 30 年。

17. 至今唯一的限制性國際條約，京都議定書不只是完全不充分的：已建立的碳市場會增加社會及氣候的不公正。

政府首次全面應對氣候變化的嘗試，京都議定書（1997 年）責成工業化國家在 2008-2012 年期間，減少其相當於 1990 年的百分之五點二的排放量。說這一條約是完全不夠的，是老生常談。百分之五點二的減排不會讓發達國家達成計畫，在 2020 年減排 25% 至 40%，從現在到 2050 年減排 80% 至 95%。美國不批准該條約，意味著一個難以達成的 1.7% 的有效減排。他們一方面將結構性減排放放在同樣的基礎上，另一方面，又臨時增加森林的碳吸收，因為這個事實，該目標被進一步削弱。此外，空中和海上運輸的排放（占總排放量的 2%）沒有加以考慮。

分配給各國的減排配額仍在進一步軟化，因為有三個“靈活機制”：清潔發展機制

（CDM），聯合履行機制（JI）和排放量交易機制。排放權的交易，使服從減排目標並超越了它們的發達國家的企業，能夠出售相應噸位的碳排放權。清潔發展機制（連帶聯合履行機制）使發達國家能夠用在南方國家（和東方國家）的減排投資，取代一部分所進行的努力。這些投資產生可商討的“排放配額”（或經核證的權利）的轉讓。這整個自由商討做法的出現，是爲了證明，可以依靠資本主義機制，通過建立排放權和排放配額交換的市場，挽救氣候。在現實中，很大一部分的權利和配額不符合任何結構性減排的努力，而且超過百分之五十的清潔發展機制配額不符合任何實際排放量的減少。至於交換權利，歐洲聯盟自 2005 年以來實施的系統（排放貿易）的經驗表明，在實踐中，“上限和貿易”這種類型之機制的結果是，減排的目標（上限）根據團體利潤的必要性而確定，通過謀取巨大的超級利潤（他們甚至不必投資於清潔技術），最大的污染者得到了加強。

通過這些機制，京都議定書就融入了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的世界性進攻，融入了帝國主義對其控制國家的進攻，融入了資本主義佔用自然資源和把自然資源商品化的鬥爭中。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能夠低價獲得碳配額，而不是減少自己的排放量，同時妨礙發展中國家本身未

來的減排能力；清潔發展機制（CDM）和聯合履行機制（JI），聯結到交換權利，使得跨國公司能夠用投資，在發展中國家或轉型期國家打開新市場，加強對工人的勒索；這個碳市場的發展，爲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打開了一個額外的活動領域。因此“碳”新殖民主義的基地設立了；在 1990 年溫室氣體排放數量的基礎上，給各國的排放配額作分配，認可了南北發展的不平等；碳排放權的私有化和商品化，以及佔用能夠吸收碳的生態系統，導致了資本主義接管陸地碳迴圈，因而也潛在地完全佔用了調節這個迴圈的生物圈；京都議定書沒有考慮到發展中大國已經在進行的努力。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因此有一個方便的藉口，以發展的名義，盡可能長時間的燃燒化石燃料或毀壞森林。

與此同時，該議定書包括了一些調控措施：確定了減排的數量與時間表；預定了犯規事件的制裁措施；靈活機制只能作爲國內措施的“補充”；核能投資在清潔發展機制框架內是不許可的；獲自於森林碳沉積方面之投資的配額是有限的（某些國家甚至禁止它）...資本主義說客施加在這些措施上的持續壓力，顯示物理限制和利潤積累之間的敵對，一方面，是爲了穩定氣候而尊重物理限制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利潤積累的邏輯。

18. 資本主義內部競爭尖銳化的同時，氣候變化的現實情況和能源供應的挑戰，迫使統治階級設計一個對氣候變化的全球反應。

面對廣泛而日益牢固的科學共識，面對日益明顯的全球變暖現象，在公眾輿論的壓力下，統治階級不得不設想一個限制方案，它要比京都議定書更加雄心勃勃，更加長遠。

這個轉變在歐洲和日本開始得比美國早，這個事實可用這三大資本主義集團的特定情況作解釋。日本和歐盟尋求通過改善能源效率和多樣化它們的資源，設法減少它們對能源的強烈依賴。他們希望在正在形成的碳市場上，在“綠色”技術市場上，以及特別在核動力的市場上，得出一些競爭優勢。另一方面，石油和煤炭部門在美國資本主義的結構中，有極爲重要的份量，而美國資本主義與海灣的石油君主國另外建立了一個地緣戰略聯盟。

歐洲聯盟處在前列。海牙首腦會議（2000 年）之後，歐洲聯盟在沒有美國的京都議定書的執行方面，通過馬拉喀什協議的談判，起了推動作用。2005 年歐洲排放交易系統啟動，其經驗可能會被用來作為未來的排放權利世界市場的模式。同年，在八國集團首腦會議上，英國首相布萊爾首次提出，從現在到 2050 年，減少百分之五十的總排放量，這項建議在 2008 年洞爺湖首腦會議上通過。

在此背景下，美國和其盟國對氣候檔的立場，變得越來越站不住腳的。雖然布希政府繼續拒絕遵照精確時間表和最後期限的強制性削減，並繼續對抗區別對待帝國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但是，越來越多的美國大資本部門開始為固定排放配額的政策辯護。四個結合一起的原因涉及這一進步的變動：（一）擔心不採取行動的代價，長期下去，會超過行動的成本；（二）相信計畫中的減排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最好是根據全球規則參加它和組織它；（三）擔心歐盟和日本的氣候政策，將會使它們在“綠色”技術領域裏大幅領先競爭對手；（四）歐盟“上限和貿易”戰略優勢連帶清潔發展機制系統所帶來的證明。

美國統治階級的這種調整，通過公司，雇主聯合會，市區及州政府水準的大量舉措而具體實現。漸漸地，對氣候變化持懷疑態度者開始失去其對民選代表和公眾輿論的影響力，以至於 8 項有利於固定排放配額的或多或少重要的私人條例草案被提交到眾議院。這一演變，以細微差別，在接任布希的兩位候選人的政綱中表現出來。

在新興大國的統治階級中，特別是在中國，巴西，南非，墨西哥和印度（在較小程度上），一個平行的演變發生了。起初，這些國家的中產階級滿意於確認他們的發展權，把挽救氣候必須進行的整個行動責任，放在發達國家的門口。因為氣候變化的加速及其具體的社會經濟影響，帝國主義的整體政策中日益重要的氣候/能源問題，以及人口和公眾輿論的日益關注，這一立場是站不住腳的，特別是在某些國家...讓我們不要忘記這種雙重的現實，它是不可能繞過的：全球氣候變暖正在影響並將更為嚴重地影響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而沒有這些國家

在減排活動上一定的參與，穩定在對人類不危險的水準上是不可能。遵循接受與世界努力合作的原則，新興大國的統治階級正在準備與帝國主義就一些條件作艱難的談判，其目的是維護自身的資本主義利益。某些政府（中國，墨西哥）正採取行動，單方面設定自己的減排目標，以盡量避免帝國主義強權把過分不利的條件加諸他們。

按一般的方式，展望由於儲備下降導致的碳氫化合物供應日益增加的緊張情況，漸進演變是有助於所有國家的。除了特殊關頭和投機活動導致的升跌起伏之外，這種緊張會影響油價，把石油價格維持在高水準上，並因此導致其他化石燃料和生物燃料的價格上漲，從而影響農業生產。

合而計之，所有這些因素解釋了，巴厘會議（2007 年 12 月）時，美國行政當局的路線是如何被放置一旁的，而且這次會議多少開啓了就新的國際條約進行談判的大門，新的條約理應接管京都議定書。

19. 目前正在制定的 2012 至 2050 年期間的資本主義政策，比京都議定書更為寬鬆，導致我們設想 2.8°C 和 4°C 之間的表面平均溫度的上升。

巴厘島“路線圖”精確地論及了量化的結論，這些結論應當從 2007 年 IPCC 的報告（見上文，第 8 點）中得出。檔的墨蹟未乾，八國集團就決定，贊同 2050 年全球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減少百分之五十，既不提 IPCC 建議的全球減排範圍的上限（百分之八十五），也不提發達國家的減排目標（從現在到 2050 年，80%到 95%），或這些國家的中期減排目標（從現在到 2020 年，25%到 40%），也沒有提及從 2015 年起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減少。

在 2008 年初，歐盟委員會向各成員國和議會建議了一個“能源-氣候一攬子計畫”（從現在起到 2020 年，百分之二十的減排，百分之二十的能源效率提高和百分之二十的可再生能源 --- 其中包括百分之十的用於運輸的生物燃料）。這“一攬子計畫”低於 IPCC 的建議，也不符合 1996 年 3 月理事會通過的最多上升 2°C 的目標 [7]。2008 年秋季，在次級抵押貸款的

發放和資本主義經濟衰退引起的‘金融危機’的背景下，若干會員國（特別是義大利，波蘭和捷克共和國）和工業部門（汽車，鋼鐵）對“一攬子方案”的內容，尤其是它的方法，提出質疑。2008年12月的理事會保持了象徵性的公式20-20-20，但是，實際上，它現在只是一個幌子。雇主已經相當滿意兩個關鍵點，即：免除“面臨國際競爭”的部門和新會員國的燃煤電廠的排放權付費，以及通過清潔發展機制，大規模外部化發展中國家的努力（對於南方，近百分之七十的減排可能非區域化）。

美國一個類似的方向正在形成中。奧巴馬的“能源氣候”方案設想從現在到2050年減排百分之八十。目標看來令人印象深刻，但它幾乎不對應於IPCC給發達國家提出的減排範圍中較低端的數字（考慮到其排放水準，而美國應在這個範圍內的高端水準上）。到2020年，奧巴馬承諾將美國帶回到1990年的溫室氣體排放水準，這意味著比目前減少百分之二十。再次，目標似乎令人印象深刻。其實，它顯然低於IPCC的數字，也低於美國應在2012年達成的目標，如果他們批准了京都議定書的話。奧巴馬再次宣佈了一個“限額和貿易”系統，拍賣所有排放權和使用該拍賣的產品，一方面，資助能源系統的改革，另一方面，提出方案，為處於最不利地位的階層，減輕改革成本。在歐洲，我們可以預言，美國雇主將施加最大的壓力在這個項目上，他們將以競爭的名義獲得滿意的結果。因此，支付“能源與氣候”政策的社會帳單只能加重，其生態效益會降低。以同樣的方式，很可能就象在歐洲，當氣候目標變得更加宏大和有制約力時，美國公司購買CDM（清潔發展機制）碳信用額度取代減排的可能性將增加。例如，丁格爾-鮑徹提出的法案，使公司有可能購買這麼多的碳信用額，以至於讓他們可以應付任何減排量，直到2029年。

奧巴馬在總統競選時提出的氣候能源政策是一個方向的決定性要素，該方向即嘗試挽救下降中的美帝國主義霸權。同布希政府相比，轉變的特徵有以下幾點：（一）能源獨立於中東石油和政權不穩定區域的願望；（二）混合替代解決方案的發展，其主軸是煤炭，生物燃料，核能和能源效率；（三）接受把美國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的限制和量化的需要，作為一個基本

條件，以便在涉及新興大國的國際氣候協定的談判中發揮作用；（四）與歐盟國家聯盟反對新興國家，目的是質疑這些國家對於氣候努力的參與，在其他問題，如能源技術上，又與新興國家聯盟反對歐盟；（五）大力支持符合“低碳”要求的能源技術領域的美國資本。

20. 為拯救氣候必須履行的條件，對於資本主義而言，等於把圓變方。無力解決困難，它會嘗試用一個技術上的飛越向前開溜，配以商品領域的進一步擴展，把它打發掉。

若要最遲到2015年開始減少總排放量，在四十年多一點的時間內，發達國家減排80%至95%，從根本上減少這些國家的能源需求，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轉讓清潔技術，並且資助這些國家作不可或缺的適應調整：為了把氣候穩定在最好的可能水準上，這些條件必須履行，對於生產主義的系統來說，等於把圓變方。

無法解決困難，資本主義在準備嘗試用生產主義的飛速前行把它打發掉。在技術水準上，其反應主要依賴於下列因素：

（一）開發重要的儲量已探明的煤炭（按目前的開採速度，約200年），以其作為電力生產（隨著碳捕獲和封存技術的發展）一個日益重要的能源，甚至作為運輸部門石油替代燃料生產的能源；

（二）第一代生物燃料（由蔗糖製成的乙醇，由植物油製成的柴油）的大開發，和運輸部門第二代生物燃料（基於纖維素的乙醇）的大開發，這意味著土地使用的一個重要修改，特別是在具有更大生產力的熱帶和亞熱帶地區的修改，以及越來越多地訴諸“基因工程”技術；

（三）發展深海油田和開發非傳統石油資源（重質油，油砂和瀝青葉岩）；

（四）通過能源效率的提升，優先在電力生產部門和工業界（在新興國家和轉型期國家有很大的減排潛力），但是也在建設和運輸部門（按可消化需求的功能）節約能源儲備的開發。但是，資本主義利用這一潛力的能力，受制於可消化吸收的需求；

（五）聯合發展核能，風能和太陽能（熱和光電）電力。事實上，核電同化為可再生能源，

發電站的大量增加和新的核技術發展（第四代發電站，超級增殖(反應)堆）有可能面臨已知鈾層的限制（目前狀況約為 60 年，以及發電站的數目）；

（六）最大限度地利用碳匯（植樹造林，保護現有森林和濕地，低二氧化碳排放的農業方法...），利用廢棄物作為能源。

這些技術對策的實施，需要建立一個碳的世界市場，確定碳的單一價格，需要就吸收的增加量和排放的減少量之間的等量關係達成協定，需要貿易協定，建立規範，配額（如果必要的話，包括可交換個別配額），稅收和獎勵措施，以及評測和報告的機制等。它也特別地意味著一個比京都議定書更為新自由主義的新國際條約，它把帝國主義國家，新興國家和世界其他地方相連接，確定各自在全球努力中的作用，並允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減排向發展中國家偏移的最大化。

這種偏移構成資本主義氣候政策的一個關鍵成分。對於帝國主義，這個問題就是：利用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出口生物燃料和廉價的碳配額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減輕能源轉型費用。這些可以產生於現有森林的維護，或樹木的新種植，或者特別是可再生能源或能源效率方面的“乾淨”投資。因此，該專案符合帝國主義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貿組織發動的對發展中國家的一般攻勢。但其執行情況，由於新興大國地位的加強而產生的世界力量關係的再調整，被弄得複雜了。

雖然不情願地承認，氣候變化是“市場最大的失敗”（尼古拉斯·斯特恩），基於市場越多則商品越多的原則，資本主義的反應，往往完全扭轉優先次序：在滿足人的真正需求的同時，不是讓人去習慣減少能源消耗，而是開發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為資本主義積累開啓新的機會，從而增加能源供應。減排服從於利潤的要求。在實踐中，可再生能源百分比的增加替代了溫室氣體排放的總減少。

21. 除了對氣候穩定而言它是完全不夠的這個事實外，資本主義對策還有十分沉重的極度威脅人類的其他生態後果。

核方案帶有對人類生存的一項重大威脅。核廢料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放射性洩漏風險不可能完全剔除，而且核武器擴散的危險 --- 因此，這些武器實際使用的危險 --- 離不開技術。有必要補充說，核技術是一項技術上不合理的選擇，從環境保護的角度看，是低效率的，同必要的能源革命不協調一致。一個核電廠的能源效率（百分之三十）低於一個燃氣發電廠的效率；因為開採含鈾越來越少的鈾礦，它在整個工業規模上平庸低劣的碳平衡表，只會更加惡化；鈾礦資源是有限的（按產業的目前狀況計，已知的鈾儲量相當於其 60 年的消費量）；考慮到將必須建立的發電站數目（約 50 年內，每星期一座），所需的時間和成本，一個以核電廠為基礎的氣候變化對策是完全行不通的；完全的核電是不可能的，這種技術（2.7%的世界耗電量，17%的電力）無法覆蓋人需求的一個有限部分；最後，能源替代的軸心只能立足于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但這些意味著能源系統從根本上分散化，同核能的超級中心化完全對立。

昂貴的核聚變（ITER）研究專案也是這樣。一種完全無用的項目，因為人類已經有好運氣能夠受益於沒有危險的核電站，它是免費的，將運行大約 45 億年，並自我回收其廢物，這就是：太陽。

雖然生物燃料只涵蓋了運輸領域中能源需求的微不足道部分，但已經充分顯示了其負面影響。不可避免的是，在現實中，利潤生產的邏輯，導致為可消化性需求的乙醇和生物柴油的生產，先於食物基本權的滿足，先於土著社區的權利和環境保護。在這裏，技術的不合理又冒頭，在大多數情況下，對生物燃料生產的全球能源結算是否定的。通向第二代生物燃料之路，其本身並沒有剔出危險。即使假定有足夠嚴格的規定禁止把農地用於纖維素乙醇的生產，來自運輸行業的需求，也會使得有必要把其他土地 --- 或海洋區 --- 的巨大表面投入給生產主義的單一文化的懷中，還加上由此所造成的農藥污染和生物多樣性被破壞的一切後果。

有關生物燃料的批評，適當修改後也適用於非傳統石油資源：稠油，油砂和瀝青葉岩的開

採，需要巨大的能源費用，以及其他資源（特別是水）的巨大浪費，而且其環境影響尤為嚴重。此外，在許多情況下，存積物落在土著社團居住區，他們的權利因此受到威脅。

鑒於局勢的緊迫性和社會原因，在迅速放棄礦物燃料的戰略框架內，碳捕獲和封存作為一項過渡措施，可以被接受：特別是，它可以使人有可能去計畫採掘機的重新調配。但是，目前不是這樣設想的時刻。與此相反，有一個新的資本主義嘗試，要把物理限制撇開而不計後果。這就是各國政府談論的“清潔煤”，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開礦採它的巨大困難，粉塵污染，其對健康的後果和煤礦的生態影響，它就是一個神話。

對付氣候變化可能給“基因工程”一個巨大動力，涉及在這種技術所固有的風險中的品質提高。因此，轉基因樹木（增加碳匯的能力的快速生長的轉基因生物，木質素含量低或纖維素含量高的轉基因生物等）的生產，會增加過敏的風險。然而最危險的威脅可以來自生產第二代生物燃料的“基因工程”，其細菌和轉基因微藻類的發展使傳播和雜交方面的威脅倍增。

22. 資本主義的反應對策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加倍攻擊工人、貧苦農民、婦女、土著社區和一般的窮人，以及加劇的社會不平等。

無論選擇那種“能源組合”，都將意味著能源價格的增加，將在兩個方面打擊到勞動人民：一方面，在他們自己的能源需求水準上，另一方面，在消費品的水準上，因為雇主將把能源價格的上漲轉嫁給商品價格。

作為不變資本一個組成部分的能源，它的增加將加重利潤率負擔，這將導致雇主加倍攻擊工資，物價指數機制和社會保障機制，並且一般地會促使他們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越發努力增加剝削率。

截至目前，我們可以看到，世界碳市場給資本家提供了新手段，加劇工人之間的競爭。工人尤其受到一種新形式的就業和投資的詭詐，其目的是讓他們屈服於跨國公司的新自由主義勒令，或操縱他們，以爭取和實施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或貿易補貼。另一方面，有各種獎勵和

其他市場手段，旨在開放可再生能源市場和提高能源效率，不僅有利於雇主，而且也利於小康的中產階級，工薪小資產階級和高層無產階級，從而加劇收入分佈的不平等，獲得流動性，等等

仍屬假設的個人和可交換碳配額的引入，甚至會進一步強化這種不平等的傾向，以至於最貧窮者將會出售其配額，以獲取消費品。

在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氣候政策，重新促使生產者同傳統的生產方式---首先是土地---分離，結果是，要麼農村人口外流或轉變為農村無產者（能源種植，碳氫物開採...），要不然就流離失所走向較差地區或重歸“旅遊業”。所有這些情況，同自治減少和大量人口---特別是婦女，她們在糧食生產上起關鍵作用---生存條件的惡化有關，也同對土著社區及其權利的攻擊增多有關。

23. 無法創造社會條件，讓總排放量減少，於是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政府用對付氣候變化問題作為藉口，讓緊縮為人接受。

對於資產階級來說，“人類引起”的氣候變化的論文，以科學的名義證明緊縮和犧牲的正當性的嘗試，來得正逢其時，而全球變暖威脅的大眾化，造成了“綠色”經濟部門貨物促銷的有利形勢。但是，把某種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產物歸咎於“人類”，資產階級用這樣的宣傳手法，幫助創造一種病態而非理性的環境，它結合了厭世主義，宿命論，個人犬儒主義和保守的戀舊情緒。

這種蓄意製造的混亂的最危險結果，是重彈馬爾薩斯或新馬爾薩斯論文的論調，把“生態危機”主要或完全地歸咎於人口...，從而歸咎給窮人，因為他們比富人有更多的孩子...，從而歸咎給發展中國家，由於那裏婦女的生育率一般高於發達國家。以前還遮蓋以宗教方面的考慮，今日這些論文是包裝在一個轉移科學生態學概念（如“承載能力”）的偽科學中，以便把社會關係自然化。此外，這些活動中的一些可以指望科學家的合作，這些科學家在生態領域中的工作實際上只是表達了一種先天的資產階級偏見，正如我們在所謂“平民悲劇”的論文中清楚看到的情況。極端反動的政治勢力

從而嘗試使用對氣候變化的擔心，為其仇視移民仇視避難者的運動，為其反對婦女控制自己身體的權利的運動，或反對援助發展中國家的運動，發出更廣泛的回聲。教派和保守宗教潮流則把氣候威脅同末世論結合，宣揚順從既定秩序。

人們擔心，氣候政策的可預見失敗，最終導致資本主義選擇強力政權執行操縱管理的政策，就像在戰時一樣，調動一切可用的手段。這一政策將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對社會民主權利的新攻擊。

24. 資本主義對氣候挑戰的回答使資源戰爭的危險大為增加。

在被資本主義全球化和結構調整削弱得最厲害的國家，氣候變化的影響增加了引發混亂局勢的危機的可能性，加上軍閥之間的武裝衝突。在已遭受嚴重用水壓力的一些地區，由於短缺在惡化，氣候變化加劇了控制水資源的重要性，造就了國家之間爆發水源戰爭的條件。但最大的危險可能來自競爭的加劇，競爭不僅是為了日益減少的化石能源資源的佔用，而且也為了新能源資源的佔用。氣候-能源挑戰，從而形成更大格局的組成部分，這個格局就是美國霸權下的兩極世界（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逐步過渡走向三極世界（帝國主義，新興國家，最不發達國家）的格局，其中爭奪帝國主義領導權的鬥爭在肆虐。

IV. 建設對付氣候變化的運動

25. 除非群眾動員起來，否則遊說以及大規模媒體行動和贊成改變個人消費行為的運動結合一起，也不會贏得對付氣候變化的鬥爭。

氣候鬥爭是政治的，首先需要建設力量的社會關係。這個鬥爭可以贏，就像澳大利亞的例子所表現出的一樣，在那裏，群眾動員（在 2007 年 11 月，有 15 萬示威者）導致第一次的部分勝利：挫敗支持布希政策的保守黨政府，以及新政府批准京都議定書。面對氣候的緊迫形勢和資本主義政府的罪惡政策，我們在每一個國家工作，以求建立一個強大統一的，按照反對戰爭和軍備競賽（“單一議題運動”）的動員傳統，在世界範圍內協調的群眾運動。

這一運動的目標，不是制定複雜的工作平臺，而是迫使政府，至少按照 IPCC 的評估報告得出的最審慎結論採取行動，迫使政府尊重

“共同但責任有區別”的原則，尊重每個人的社會民主權利和名符其實的人類生存權。我們捍衛這一目標，反對以現實主義的名義，降低排放目標的潮流，也反對那些抨擊它們不足的人（我們會要求“最低限度”的尊重 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最認真”的結論，以圖說服後者）。我們關切的是，要利用 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合法性，以實現盡可能廣泛的統一行動，同時暴露政府的口是心非 --- 在國際氣候會議上通過“決策者備要”，但在實踐中不考慮它們。

動員群眾捍衛氣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困難在於氣候變化的特點，特別是其目前相對進展的性質，以及因果之間的雙重時空錯位。因此，傳播全球變暖的科學資訊的大型企業及其影響是必要的。它必須特別著重於不同社會運動和左翼政治組織的積極分子團體。事實上，這些團體有一個決定性的作用：只有他們能夠建立全球氣候威脅和特別社會問題之間的具體聯繫，特別是在地方一級，並由此推出一些戰略，能夠把社會鬥爭和救援氣候的鬥爭結合起來。這就是說，運動的建設必須設想為一個現存不同層次的社會抵抗網路，在一個共同的最低限度的平臺上，有協調一致的行動，和不定期的多元示威。建立網路的工作，將得力於氣候委員會，戰線或聯盟的建立，比如他們可以在全球氣候運動的框架內發展。

26. 在氣候運動的內部，有必要建立一個左翼流派，它把氣候鬥爭同社會正義聯繫在一起。

必要的突變應出現在這樣的規模中，即：沒有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被剝削和被壓迫者的動員和積極參與，就不會有它。資本主義的氣候政策，使這種參與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們在社會層面上是不能接受的，在環境層面上是有害的。這些政策實際上意味著加強帝國主義統治和資本主義的競爭和暴力；從而加重剝削、壓迫、社會不平等和工人之間的競爭，以及意味著侵犯人權和資源的私人佔有。

特別是，對於排放大量溫室氣體的行業，如石油，煤炭，水泥，玻璃，鋼鐵工業以及運輸

部門的數百萬工人的工作崗位，工資和社會收益的重大挑戰，資本主義的戰略並沒有提供任何答案。這種政策只能遇到合法的社會阻力。不是鼓勵人們覺悟到氣候的危險，它很可能把某些階層的人們投入氣候變化懷疑論的懷抱。在那些受能源價格上漲的急劇影響的工作者的部門，在小雇主（農業，漁業，貨車司機）的社會份量可鼓勵暴力和絕望的社團反應的地方，這種風險尤其重要，給各國政府施加強大的壓力。

大型環境非政府組織嘗試激進化政府的氣候目標，卻沒有看到，與此同時，這個激進化做法會加重對被剝削和被壓迫者的攻擊。這是一條死路。為了氣候和社會正義，我們捍衛聯合鬥爭的需要。在廣泛的運動內部，我們為組建一個左翼支柱力量而工作，該左翼支柱力量連結這兩個層面，因而反對這樣擬議的解決方案：該方案的基礎是市場機制（碳價格，有利於可再生能源的獎金和稅收優惠政策，權利和配額的購買，等等），積累，新的殖民統治和技術飛躍。這個支柱力量尋求重新劃分工會，生態學者，全球正義力量，女權主義者，從事第三世界工作的左派，“漸漸減少的”左派，激進左翼組織成員，關鍵科學家等要素。實踐上和政治層面上，它採取每一項能夠推進另一種氣候政策想法的倡議，從而有助於建設廣泛的運動。

27. 氣候保護必須在社會運動平臺和鬥爭上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

著眼於植根在現有鬥爭中的廣泛動員，我們採取行動，以便讓氣候保護成為社會運動的一個主要關注，讓它找到每一個層面上的適合其需求的具體運算方式。例如：

（一）爭取和平：武器的生產和使用構成不可接受的氣候變化上的瘋狂……這本身就是衝突的一個額外的可能原因；

（二）為發展權和社會保障權，與貧困作鬥爭：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是直接同資源和發展水準成正比的。社會不平等會加劇脆弱性和阻礙能源變化；

（三）婦女的鬥爭：適應氣候變化的要求，特別是，為了婦女的平等權利，為了她們對兒

童承擔的社會責任，為了她們墮胎和避孕的權力，反對雙重工作日，加強她們這些具體要求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四）爭取工作機會：為城鎮和農村做規劃，從根本上降低能源消耗，保護生物多樣性，發展公共交通和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這會提供巨大的就業潛力；

（五）爭取獲得土地，水和自然資源，以及有機農夫農業：實行勞力密集型有機農業的農村社區，是最有能力增加碳匯容量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農業部門；

（六）反對農業市場的全球化和自由化：除了造成農村人口的荒蕪，饑荒，農村移民和/或生態系統遭殃以外，農產品市場的自由開放，直接（運輸產品出口）和間接的，也是排放的一個重要來源。

（七）爭取庇護權：面對越來越多的環境難民，尤其是氣候難民，流通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它構成合乎人性的唯一的答案；

（八）土著社區爭取其權利的鬥爭：通過他們的知識和他們使用生態系統的方式，特別是使用森林的方式，這些社區最能維護和發展碳匯；

（九）反對多變和不穩定的工作，反對延長工作時間：錯開和彈性的工時制和資本主義運動有利於使用汽車的勞動工人之升高的流動性。“及時”生產是運輸部門的一個主要溫室氣體排放源。減少工作時間，是消費和休閒活動模式出現大規模更換的一個先決條件；

（十）為了運輸，能源和水資源領域中有品質合格的公共部門，反對私有化。只有一個免費合格的運輸公共部門，才可以把每個人出行的權利同溫室氣體的減排調和起來。電力生產的自由化，使間歇性可再生能源網路的引入變得複雜。只有非營利的國有企業可以接受這個挑戰，在20年或30年內，完全消除房產建設部門的排放量。個人的水和能源免費配額，根據重要的社會需求而固定，它是非交換性的，超出配額時關稅則迅速增加，並限以絕對最高消費額。

28. 氣候挑戰對工會左翼是必不可少的。它意味著超越財富再分配的鬥爭。

大國際工會聯合會的領導人有一個傾向，即跟從資本主義的氣候政策，以便為他們換取談判其某些方法的可能性。這一方針的具體化，是所謂“綠色新政”的建議，該建議基於這樣的幻想，即綠色技術將能夠吸納失業，並成為一個新的長期繁榮和資本主義擴張浪潮的動力。資本主義持久恢復的社會條件和環境影響，不在考慮之列。相反，工會官僚機構接納資產階級生產主義和盈利能力的要求，以及主要氣候政策手段：政府援助“綠色”公司，“生態稅”，清潔發展機制，排放權交易，甚至支援核能和生物燃料。這種共同管理的政策很可能使工會運動，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工會運動，共同負責氣候災難及其對貧窮國家窮人的影響。它只能在國際範圍的工人中，在不同國家的各部門之間播下分裂的種子。考慮到氣候和能源挑戰的重要性，對於工會左翼，抓住這一挑戰並使它成為爭取工人組織改變航向的一個核心要素，是決定性的。從戰略角度看，這場鬥爭就更加困難，因為它並不是一開始就起於綠色技術領域中的新型生產，新產品和新市場的發展——因此，並非經濟再啟動——而是起自於優先爭取減少能源消耗，抑制無用或有害的生產，這些部門的工作者的再就業，等等。這是一個很大的障礙，它顯示了戲劇性的情況，即工人被鐵鏈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上，而他們依靠這個方式過生活。要克服這個障礙，只有向資本主義所有制挑戰，提出這樣的要求，如：（一）從挽救氣候和滿足人類基本需要的雙重角度來看，具有決定性的活動，要被賦予公共地位，就是說，首先要無償地徵用那些控制能源的提取、轉換和分配的資本主義公司；（二）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領域中，首要的是賦予替代性技術的研究和研究成果以公共地位，加上在國際發展方案的框架內讓它優先再融資；（三）各級（全球、區域、國家、地方）的過渡計畫，旨在過渡到一個無化石燃料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生產和消費盡可能作重新安排，並在工人的控制下，給礦物部門的工人提供轉業訓練，維持他們的社會收入。面對這一挑戰，工會左翼必須擺脫專盯住財富再分配的狹隘眼光，轉而研究挑戰財富概念本

身以及財富產生的方式，換句話說，研究挑戰生產方式的基礎。只有這樣，才能夠把圍繞具體目標而動員各地工人所必要的想像力和創造力資源解放出來。這種做法，使減少工作時間（減少工作強度但不減工資，並按比例雇用新的工人）和工人控制（工作節奏、生產、能源、等）這樣的需求越來越重要。

29. 大規模轉讓清潔技術給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以及資助這些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的影響，需要取消債務，並建立一個特別基金，提供必要的來自大量資本主義利潤稅收的手段。這些手段必須置於這些國家的人民及其社會組織的民主控制之下。

因為它意味著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的參與，氣候的挽救需要全球範圍的資源和知識的共用。它必須聯結下述的情況：

（一）取消第三世界債務，把南方國家的獨裁者放置在西方銀行的資產歸還給人民；

（二）解除銀行保密，制止避稅天堂，徵收財產稅和遺產稅，對資本投機運動徵稅，等；

（三）大幅度增加帝國主義國家用於援助公共發展的預算；

（四）除了這種援助，建立一個單一的世界基金，幫助發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的不可避免的影響，以及無財務條件地轉讓清潔技術給這些國家的公共部門；

（五）對氣候變化最有責任的經濟部門（尤其是石油、煤炭、汽車、電力生產）徵收利潤稅和超級利潤稅，以此作為這一基金所需的資源；

（六）健康以及可用於消費品生產和基本服務（運輸、輕工、水和能源、通訊）使世界所有人民能夠獲得基本商品的技術方面的專利制度，要加以廢除；

（七）對放棄利用礦物燃料資源的南方國家作財金補償的制度，這個賠償由有關的人民管理。然而，北方與南方之間的財富再分配也不足以對付氣候挑戰。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在生產和交換全球化的框架內，讓南方國家的經濟服從於積累，它嚴重地不符合現在到2020年（非洲為2050年）必要的15%至30%減排的目

標。這一目標只能通過一個內在的發展達成，要對廣大人民的需要做出反應，因此，同有利於農民農業的土地改革相關，同面向國內市場的生產調整相連。因此，對人的發展權和氣候救治的調和，需要採取措施，反對當地的統治階級，他們使用發展權為藉口，拒絕任何燃燒化石燃料的障礙，掠奪自然資源，讓森林適合他們自己的需要，他們充當中間人，銷售碳配額，生產生物燃料和以低價向發達國家市場出口農產品、食品和工業產品。為了防止他們採取行動，加強這一社會上和生態上有毒的發展模式，掌握在南方國家手中的財政資源和技術手段，必須置於這些國家的人民及其社會運動的民主控制之下。因此，對付氣候變化的鬥爭驗證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永久革命理論。

30. 應對氣候變化必須把所有主要的生態挑戰整合進一個真正的可持續發展的視野裏。

資本主義的歷史以環境危機為特點，它的“解決”缺少一個整體的生態眼光，實施的是服從利潤率要求的部分技術答案，其有害的環境影響只是後來才顯現。歐洲森林之所以免遭滅頂之災，是由於煤炭的開採，而煤炭的開採是氣候變化的一個主要原因；土壤避免了被耗盡，是由於大量使用化肥，而化肥是溫室氣體的來源，是水質污染及富營養化的原因；臭氧層空洞的發展已經放慢了，這得益於使溫室效應大為加重的氣體的冷卻。等... 在遵循同一魔法師學徒方法的同時，解決氣候/能源危機，可能會有更加危險的後果，特別是在兩個方面：越來越多地訴諸核能和轉基因生物體。反對這些技術是左派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我們必須譴責它們象徵著資本主義的無限增長的瘋狂，以及譴責該系統的荒謬企圖，它欲跳越過自己的頭部，去不顧一切地維護產生利潤的積累。

按照較為普遍的方式，氣候挑戰彙集了所有的環境問題。因此，對它的回應必須整合所有的大生態挑戰，特別是：（一）保護熱帶森林，尊重依賴其資源（碳匯）生存的土著社區的權利；（二）保護生物多樣性；（三）合理和公開的管理水資源；（四）出自石化產品的約 10 萬分子在毒害生物圈，要同這個毒害作鬥爭，這些分子不是天然存在的，因此，在某些情況下，不能被其還原劑分解；（五）消除破壞平

流臭氧層的氣體，代之以沒有其他生態危險影響的替代物；（六）抗擊大氣污染及其對人類健康（哮喘，心血管疾病，）和對生態系統（酸化，對流層臭氧）的影響後果。

31. 我們必須譴責資本主義計畫和科學家建議之間的差距。從社會運動起始，我們必須建立與關鍵科學家的聯繫。我們必須提出知識的所有權和研究的社會作用問題。

政府試圖使人們相信他們的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氣候政策是建立在“科學”上的，政府的這種矯飾，必須積極地予以揭穿。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譴責把政府的目標同 IPCC 最謹慎的結論分離的鴻溝。這譴責意味著，在批評絕大多數專家轉達的主要思想和社會前提的同時，要消化吸收科學專業知識的實質。因此，左派必須建立與科學家的關係，邀請他們將其專業知識傳達給社會運動，從那裏挑戰他們的一般政治立場，促使他們表達自己對這個矛盾的立場，該矛盾的一方面，是對抗全球變暖所需要的合理解決方案，另一方面，是服務於部分資本主義理性的科學超級-區域分隔化。考慮到科學專業知識在氣候政策的發展中所占的地位，建立社會運動與批判人文研究者，實驗室和協會之間的關係，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在這個框架內，我們建立一個更寬泛的視角，來看科學和研究在以社會正義拯救氣候的鬥爭中的作用。我們不拒絕技術解決方案，也不拒絕發展和進步的概念。相反，我們認為，科學的研究和技術應擺脫資本的影響，使它們的潛力可以大量和迅速地被用來服務於可再生能源的可持續發展，能源效率的進步提高和資源的合理管理。出於這個原因，我們要求為研究作大規模的公共融資，終止鏈結大學同產業和金融資本的合同，根據以社會正義向生態可持續型社會的轉型，民主確定研究的優先次序。

32. 我們必須反對人人有責論，但主張以冷靜的態度對待能源，衡量什麼是社會可能的。

左派反對政府的全民有責的說法，政府把全球變暖和拯救氣候的責任，歸咎於所有階級的每個人的個人行為。這些論述設法掩蓋社會的不平等和資本主義的責任，轉移對生產方式作必要的深刻的結構性變化的注意。但並不能因

此說，左派可以避開提出個人行為帶來的問題，或相反，拒絕在消費方面採取任何行動。

有一種錯覺認為，氣候可以通過一個反對過度消費的“文化蔓延”運動來挽救：在沒有結構性變化的情況下，個別人的狂熱只能導致僧侶似的生活方式，並不是很有“蔓延性”的。但是，為避免質疑過度消費以及由此而來的個人行為，押賭注於假設的革命性科學突破，這也是不合理的。氣候的緊迫性迫使我們此時此地，根據已知的技術解決方案和現有的科學診斷，採取必要的決定。基於相信進步的態度，相信技術救兵的奇跡發生，這個做法只能用來讓無所作為合理化，而文化蔓延概念的捍衛者，至少有以行動來拯救氣候的優點。

不是把消費領域中的行動同生產領域中的結構性變化作對比，左派必須把前者設想成為後者強調需求的一種手段。一方面意識到，全球變暖及其影響的嚴重性同某些行為方式的持續，兩者不相符合，這些行為方式對環境表現出明顯和輕率的蔑視：目前社會上可能的是，基本的道德規範要求那些基本需求滿足者，應表現出對待能源和行動的冷靜態度，避免做出加重氣候變化的事。另一方面，替代性的社會實踐，民主運動，和對抗生產主義和消費的群眾動員，即使少數人的動員，也可以發揮積極和重要的作用，幫助形成這樣的集體意識，即：在生產領域裏，結構性的變化是必要的。

因此，我們支持反對廣告入侵，反對公共場所的資本主義佔有，反對自然資源的浪費，反對無處不在的汽車，反對航空運輸收費暴漲的民主運動和行動，支持對破壞赤道森林所製造的產品的抵制行動，等等。

33.我們必須制定應對災難的民眾緊急援助方案法。

氣候變化大大增加了乾旱，洪水，滑坡和其他災難的風險，它尤其厲害的打擊工人和窮人。在發展中國家，這些災難可能在某些情況下變得極其普遍。面對這種威脅，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干預社會運動，干預的層面有兩個：需求的層面，包括把一些國家放置於其責任面前；大眾以及以團結為基礎的直接援助的層面，援助由當地居民和他們的組織負責，有全

球積極分子網路的協助。發生自然災害時所取得的經驗表明，事實上，這一大眾援助提供的幫助更快速，成本更低，而且更直接面向窮人和真正的需求。此外，他們還有利於一種不同的社會關係和既定秩序論爭的發展。

V.開闢通向生態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之路

34. 政府無力採取拯救氣候的必要措施，結構上的根源於資本主義的基本法律。

競爭推動每個資本家，以機器取代工人，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得可能獲得超過平均利潤的超級利潤，從而獲得競爭優勢。這場技術租金的競爭，隨著發展，進一步加速加劇該系統過度生產的趨勢，從而加劇過度消費趨勢。過度生產和過度消費必然意味著一個物質生產數量的增加。這反過來要求增加資源（特別是能源）的佔用，這是一方面，以及更廣泛廢物的傾倒，這是另一方面。非物質化的傾向，有效率地利用資源和轉化廢物為原料的傾向，可以放慢這個運動，但不能阻止它。確切地說，一個靜止的資本主義是一個矛盾：由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目標是生產價值，即一個籠統和抽象形式的交換價值，由此推出，根據馬克思的公式，除了資本本身以外，資本主義不認識其他任何限制。

正是在這一框架內，我們必須分析氣候變化的影響。縱觀 200 多年的歷史，該系統已從自然環境開採了豐富的化石能源資源，確保它有一個低價的不變資本要素。該生產性消費有一個看不見的廢品二氧化碳，在大氣層積累到了這樣的程度，其目前的全球排放量兩倍於生態系統的吸收能力。長期以來，我們看到二氧化碳排放噸位和資本主義擴張或停滯長波之間的強有力的邏輯關係。因此，大規模汽車和其他大眾消費品生產推進的戰後擴張期，排放量上升得如此之大，以至於大氣溫室氣體濃度被帶到一個持久地接近導致大規模氣候災難的水準。之後略有下降並在 70 和 80 年代穩定下來，然後，由於生產和運輸的資本主義全球化，轉型的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和債務燃料重新推動的美國經濟，總排放量開始再次上升。全球變暖以及礦物資源終將必然的耗盡，於是似乎成了物理上的障礙，機器碰上了這些限制，卻無法承認它們的存在，特別地，不能由它們得

出所有的不可缺少的實際結論。氣候變化表明，資本主義制度立基於價值的潛在無限積累，積累導致資本加速流通，它表明自己無法有效地整合物理限制的概念和生態的節奏性。

35. 氣候變化把當代資本主義的危機帶到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水準，並使其成為一個重大的系統性危機，一個文明的危機。

全球變暖用物理語言表達了60年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用政治言語描述的論點：非資本主義社會的客觀條件不僅成熟了，而且已開始熟透腐爛。氣候危機最明顯和最全面的體現了這一腐爛。因為它沒有被消除，沒有被一個非生產力主義的制度取代，“晚期資本主義”已經導致人類採取決定性的和不可逆轉的步驟，走向一個十分嚴重的環境退化，有可能進一步惡化數億人的生存條件。如果在非常短的時期內不採取能夠阻止這一進程的激進措施，人類將不得不面臨一系列大規模的災難，以及無法估量的社會和政治後果。

在經濟層面上，在始於1970年代初的長期衰退浪潮的框架內實行的殘酷緊縮政策，造成的一種局面是沒有先例的，這個局面延續了25年：一個利潤率的復蘇卻沒有伴隨著資本積累率的復蘇，而是伴隨著大規模失業的持續，貧困的增長，不平等現象的暴漲。系統長時間的不能開啓一個新的擴張長波，它的這種無能代表其歷史性的精疲力竭，它不得已陷入越來越大的困難，難於補償一個傾向，這個傾向就是因為剝削率的增加而平均利潤率下降，它不得已陷入來自於實現剩餘價值的矛盾。

在社會一級，資本主義得以擺脫大蕭條，靠的是鎮壓工人運動，法西斯主義，戰爭，並付以長期通貨膨脹和氣候系統不可逆轉的不平衡的雙重代價。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新的繁榮歷史時期的開啓，就必須經歷一個“外源性休克”，其規模至少可同1930年代的激烈調整相比。次級抵押貸款問題開啓的衰退表明，儘管工人運動失敗，一個新的擴張長波的條件並不存在。

在環境水準上，即使假設對商業活動的大規模政府援助（換言之，一個新的勞動向資本的財富轉移）將加速清潔技術的推廣，一個持久

的資本主義復蘇 --- 按照戰後復蘇熱潮的模型 --- 將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幾年的化石能源消費量的增加，因此，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加速遠遠足以引起氣候災難的突發。換句話說，對付氣候變化的鬥爭提出了文明的基本選擇：繼續資本主義的生產主義，犧牲環境和社會的多數，抑或一個非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

36. 唯一可能的是，打破價值積累的邏輯，以有用物品（使用價值）的生產代替商品的生產，共同地從結構上解決氣候危機和社會危機。

若要氣候穩定在同預防原則協調的水準上，則有必要讓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最遲到2015年開始減少，從現在到2050年，減少50%至85%，從現在到本世紀末，減排更多。這個目標的實現，必須沒有核力，沒有為世界市場的生物燃料的大規模生產，而只能稍微求助於碳的捕獲和儲存。就我們目前所知的狀況，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通過大大減少總的能源消耗，這是唯一可能的引進可再生能源的條件。要做到這一點，提高能源效率和減少經濟的化石碳強度是不夠的。無關於共用努力（北南，北北，南南）的社會政治決定性問題，物質生產的某些減少因而是必要的。但是，資本主義根本上是生產力主義。當被剝削被壓迫者用鬥爭迫使其放棄積累表中的些許增長時，它只能夠按自己的方式（被商品變態的）滿足社會需要。在這一系統的框架內，物質生產和消費的減少的具體實現只是暫時的，因為這種減少是生產過剩危機造成的，它涉及社會危機的惡化，貧窮，失業，不平等現象的增長。這意味著，客觀上，氣候挑戰使反資本主義的替代性方案成了一件絕對必要的緊迫事情，並且使參與資產階級機構的策略變得不合格，因為該策略期望實現一個假設的漸進轉變。但在現實中，要打破不符合氣候挽救的積累的惡性循環，唯一可能的是，由滿足人類需要（必然是有限的）的使用價值的生產代替積累價值（可能是無限的）商品的生產。生產領域（以及作為一種生產活動的運輸）的結構性變化因而是決定性的。正是這些變化，將創造消費領域的變化的物質基礎。這些變化不僅需要廣泛地把財富從資本轉移到勞動，而且也挑戰資本主義財產權。這兩個方面合起來，要求無償的國有化現在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整個信貸部門（銀行，保險業）。

因此，對付氣候變化，開啓了重振過渡方案法的可能性：一方面，重建人類所需要的一個非資本主義解決辦法，另一方面，對於總體上不符合資本主義制度正常運轉的一系列具體一致的要求，給出一個堅實的客觀理由。

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從一個地區到另一個地區，其確切的要求可以有很大的差別，具體情形取決於發展水準，社會組織形態，生態系統的特徵，能源系統的具體情況，等。一般而言，他們的過渡性質將決定於這個事實，即它們的表現有助於有效地解決生態/氣候危機和社會危機兩者。爲有益於社會的活動創造就業機會，能源的權利，住房和交通（免費的公共交通），抗擊污染及其對健康的影響，以負責任的方式使用資源，海洋，森林，湖泊，...在這麼多的關鍵領域，可以提出建議，闡明排放量減少的理由，能量和物質流動的合理管理，社會不平等現象的減少，民主權利的增加，和商品對社會控制的削弱。

在此關頭，生態/氣候效率（降低排放量）的問題，不是一個過去的細節問題。與此相反，它必須得到特別的重視。由於對抗全球變暖作爲一個真正全球性問題的客觀重要性，具有重大的社會含意，而且還因爲反資本主義的建議比資本主義的解決方案更有氣候效率，資本主義的解決方案是這樣的東西；它面對自己不得不承認的決定性挑戰，只能加深該系統合法性的危機。

37. 正是由於這個事實，即它的性質是一個巨大的全球性問題，它需要加以解決以避免更嚴重的災害，所以氣候變化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按照突出的實際合理和直接的要求，直接引進反資本主義的替代辦法的必要性。

面對氣候變化，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兩代人的時間）必須採取的措施，它們的巨大規模，對群眾心境可以有矛盾的影響：指責和懷疑的反應，玩世不恭的反應，晚期資本主義中的生存不安全感所產生的潛在痛苦的加劇。這些情感可以被資產階級政府利用和操縱，而且也可以被神秘的派別用來提供不合理的和末世論的偽解決方案。它們還可以被反動派別加以利用，把人類及其環境之間的關係自然化，由此出發，總是傾向於推導出潛在野蠻的新馬爾薩

斯主義的結論。在階級鬥爭水準低下的情況下，這些風險更是現實的，而且這時具有防禦性質的衝突（這時，環境因素一般趨於邊緣化）相當普遍。

但是，用這種困難的情況作爲一個理由，滿足於有關氣候變化（或甚至完全忽略了這個問題，把它擱置一邊，直至更好的時代，或者更光明的未來）即時要求，這是錯誤的。相反，這種情況使我們必須大膽地把即時要求的鼓動，與廣泛徹底的，全球性的簡單而直接的反資本主義宣傳結合起來。這是必要的，以便在生態和社會雙重層面上，提高挑戰的目標水準，從而表明自己在提供一個解決方案。這是可能的，原因是，由於其作爲一個巨大的全球性問題的性質，需要立即解決，以避免更嚴重的災害，因此氣候變化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按照突出的實際合理而直接的條件，引入需要，即用一個反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作爲前進道路的需要。由於它的緊迫性，事實上，在關於基本需要這樣一類的根本問題上，它可能直接訴諸於廣大人民的道德層面，良知和理性，以便有效地應對氣候變化，不計其成本地施用所有可用的有關手段；把大氣、水、土地、遺傳資源、太陽輻射和一般能源視爲人類的共同財產；重新分配財富和發展公共部門，以便調動一切可利用的手段。只要應用非常的權威，依據專家的科學結論，立足於一個關鍵的方法中，賦予反資本主義替代方案更多的合法性，這是可能做到的。

社會主義專案的危機，包括非常消極的“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生態平衡結算表，是一個不可能回避的因素，它沉重的壓在被剝削被壓迫者的抵抗和反擊能力上。充分利用氣候變化提供的可能性，重建反資本主義的視野，同時把它植根於全球生態和社會問題中，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能夠圍繞一個全球性社會項目，甚至文明項目，幫助重組國際工人運動。

38. 碳迴圈的飽和和非再生資源的耗盡意味著，不像過去，工人階級的解放再也不能設想爲無須考慮主要的自然限制。

反對增長，其本身並不構成一個社會或文明的項目，也不是贊成另一個社會（特別地，如果增長下降的衡量是國內生產總值的減少，更是如此，因爲國內生產總值只考慮價值的數

量，而不顧人類和生態需要的品質）的廣泛社會動員的戰略。生產和物質消費的下降，對氣候救援是即刻必要的，因為資本主義已經把人類驅上一條沒有出口的道路太遠了。一方面，這種下降絕不預先判斷未來可能的發展。另一方面，對於向一個沒有化石碳的經濟體的必要過渡，它是唯一的定量標準。為了避免導致反動的結論，這一定量標準必須伴有品質標準：財富的再分配，工作時間的減少和公共部門的發展。如果這些條件得到滿足，並且如果它的目標是無用的或危險的生產，那麼，通過在教育，衛生，文化，社區活動，公共交通，城鎮和農村規劃，以及重要的免費服務這些部門的社會投資，物質生產的減少則同人類絕大多數的福利，財富和生活品質的增加相符。

資本主義制度同物質生產和消費的增長當然是分不開的，但這是一個結果，而不是原因。生產價值，作為一種抽象形式的交換價值，導致財富在社會一端長期無限積累的趨勢，並在同一時間導致貧困在另一端不斷的積累。沒有考慮到這個雙重現實的氣候政策，幾乎肯定是註定要失敗的。反資本主義替代方案的關鍵點和杠杆，從而基本上保持了社會主義專案已經確定的那些東西：動員被剝削和被壓迫者反對以爭奪利潤為基礎的制度，反對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反對生產商品，競爭和工資制度。但是，這個關鍵點和這個杠杆已經不再足以確定替代該方案。事實上，碳迴圈的飽和，在全球最廣最明顯的表明一個事實，這個事實就是，與過去不同，現在設想工人階級的解放，必須考慮主要的自然制約：在歷史的規模上，不可再生資源的存儲有限，可再生資源的補充速度，能源轉換規律，生態系統和生物週期的運作條件，它們的節奏。列寧的簡短定義 --- 社會主義是蘇維埃加電氣化 --- 因而已經過時：電力如何生產（來自可再生的，抑或礦物的能源？），多少數量，有什麼樣的環境影響？

如果想在生態和社會雙重挑戰的高度上，表現出一個全球性的替代方案 --- 在現實中，一個生態社會主義的挑戰 --- 社會主義項目就必須闡明這些問題。為了做到這一點，申明社會主義必須整合生態問題，是不夠的，換句話說，社會主義者必須更好地包含生態層面，發展生態的要求，並參加保護環境的動員。真正的挑

戰在於整合社會主義項目，把它融入陸地超級生態系統的全球生態中。這意味著，必須這樣構想發展，即它的目的不僅是滿足人類的需要，而且還要同它的環境可持續性相應，並進而接受這個情況：生物圈的複雜性，未知因素和演化特徵，賦予此發展事業一定程度的不可克服的不確定性。

把社會主義整合進生態中，對社會主義者來說，意味著一場“文化大革命”。為了避免區域分割化的，功利性和直線性的觀看自然，把它看成人類操作活動的物理平臺，把它看成商店，從中提取必要的資源用於其社會生存的生產，以及把它看成放置這一活動的廢物的垃圾場，這是必不可少的。在現實中，在同一時間，自然界是平臺，倉庫，垃圾場，和所有生命進程，由於外部供應的太陽能，生命進程使事物迴圈在這些極端點之間，不斷地調整自然界。因此，廢物及其處置的方式，必須在數量和品質上，同生態系統的迴圈能力和節奏相容，以便不影響生物圈所代表的精巧影片的良好演出。然而，這一良好演出依賴于操作員的數量和多樣性，以及連接他們的多重關係鏈的品質和複雜性，依賴於最終確定人類資源供給的流量的平衡。在這種情況下，“人類控制自然”這一把握十足的概念，必須放棄。從現在開始，唯一真有可能的社會主義，是一個真正滿足人類需要（即需求擺脫商品異化）的社會主義，它經由人類謹慎地反省這些需求以及他們滿意的這種方式對環境的影響後，自己民主決定。

39. 因此，馬克思的生態方面的主要錯誤，不是把自然作為一個要開發的資源的無限儲備，而是沒有把自己的“交換的合理管理”概念應用到特殊的能源領域，而他卻已把該概念應用到了土地方面。

19世紀，由於農產品市場的城市化和國際化，造成養分迴圈圈的破裂，帶來土壤地力的耗盡，李比稀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導致馬克思假定，工作是人與自然之間的必要調節，唯一可能的自由在於合理管理人類和環境之間的事物交換。這種想法，即社會和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是歷史決定的，人類，因為它自覺地產生其社會存在，必須承擔“合理管理”與地球的交換的責任，這個思想涵括了一個非

凡的論點，可以媲美當代全球生態問題的最佳構想。它證明馬克思，儘管有某些含糊不清的提法，並非不瞭解自然週期，而且他知道有限環境中的資源是有限的。關於土地的“合理管理”，這個思想有一個強烈的綱領性表達，即：實際上它是要恢復養分週期，尤其是，為此馬克思和恩格斯主張廢除城鎮和農村的區分。在他們眼裏，這一要求同廢除體力工作和腦力工作的區別一樣重要。

因此，馬克思的生態方面的主要錯誤，不是把自然作為一個要開發的資源的無限儲備，而是沒有把自己的“交換的合理管理”概念應用到特殊的能源領域，而他卻已把該概念應用到了土地方面。在他的工業革命分析中，馬克思並沒有認識到，從木材轉到煤炭，意味著放棄可再生能源的流通，贊成使用可耗盡能源的儲備，而其開採只會違反社會和環境之間的碳交換的“合理管理”。雖然他們已經清楚地看到了資本主義用盡僅有的兩個財富來源——“地球和工人”——的傾向，而這個分析的框架，使他們能夠精湛地預測到發展動態，將導致大工業和資本主義農業共同努力，同時使城市工作者，農村工作者和土地的肥力貧困化，共產黨宣言的作者沒有看到，資本主義急於耗盡礦物資源將不可避免地將人類引入沒有出口的能源道路。

按照唯物史觀，技術無法逃避這樣的規則，即所有的人類活動是社會地和歷史地決定的。我們可以特別引用這個事實，即馬克思本人強烈譴責資本主義機械化的階級特性。然而，沒有見到從木材轉到煤炭的重要性，這個事實導致他沒有把能源階級特性的問題說清楚。在工業革命時期，這種明確性的缺乏幾乎不導致任何實際後果：同樣的蒸汽機被用來把木材和煤炭的化學能轉為機械能和熱量。但是，因石油以及特別是核能源的使用，形勢發生了變化。真正迫使我們採取明確的立場：要麼技術被拒絕，而且能源不是中性的；或者要不然，能源是中性的，而且開發它們的這些技術不會實在地被拒絕。在第二種情況下，我們發現自己處於同我們起初的論斷相矛盾的情況中，這個論斷就是技術的歷史/社會決定論，這等於是說，我們允許被馬克思推出大門的技術專家治國

論，通過視窗爬回來。

馬克思的繼承者要對這個事實承擔重要責任，這個事實就是：“合理管理人類與自然間事物的交換”的概念及城鄉差別的相關問題在20世紀被遺忘了。19世紀末，合成肥料的發明似乎已經解決了土壤肥力問題，該問題是資本論所進行的生態思索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然而，沒有馬克思主義的作者尋求瞭解，這個解決辦法是否符合“合理管理人類與自然間事物的交換”的概念。總之，沒有人，其中包括革命家，理解到馬克思曾應用於土壤問題的概念，可用來從“社會新陳代謝”的角度分析化石燃料的燃燒（或其他不可再生資源的掠奪）。這一驚人不足的原因，還要詳細的分析。俄羅斯的落後，史達林反革命，社會民主生產主義和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同自然科學演變的某些距離，發揮了作用。但是，批評過度的樂觀主義，也是必要的，因為它不合理的期望，科學技術總能找到一條離開資本主義生態死角的“前進之路”。氣候變化問題從根本上質疑這種對進步的信念，這就是為什麼20世紀7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者在有關環境的挑戰中，已經並將繼續有相當困難去定位自己的最重要原因。這就是為什麼把社會主義專案納入生態裏面，是馬克思主義革命活力的基本條件。

40. 能源問題是該替代方案的中心。我們可以把“太陽能共產主義”的觀點，置於馬克思的“社會新陳代謝”思想的連續性中，更深刻地精研發展它，並從中引出新的結論。這個更深刻的發展，使生態社會主義的新概念的使用大為合理化。

能源問題是氣候挑戰和一個替代方案問題的中心。因此，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超越其前行者（包括馬克思）在這件事上的含糊和死角，是決定性的。能源系統的概念——定義為從能量轉換的角度考慮的生產方式——使得可以做這樣的假設，即資本主義制度的特點是：

（一）能源的准完全佔用，它們的轉換器及傳載器，以及其商品轉化（包括通過人類轉換器，置於雇主支配下的勞動力的商品化）的准完全佔用；

(二)化石燃料的壓倒性使用，產生租金和溫室氣體；

(三)擁有能源以及轉換器的資本的中心化和聚集，導致系統本身越來越集中；

(四)能源效率低，並有相當程度的浪費，這要歸因於優先尋求利潤，但也要歸咎於中央化的結構，使生產基地同主要市場分離，歸咎於無用的生產，歸咎於部門之間經濟規劃的缺乏，歸咎於完全過度的機械化；

(五)供應的全球化，能源通道的軍事保護，和控制生產國的帝國主義政策；

(六)日益相互聯繫和集中的網路的形成；

(七)圍繞化石能源，主要是石油，一個涉及汽車，航空工業，造船和石油化工的強大能源工業綜合體的構成；

(八)通過化肥，能源生物的生產和“基因工程”技術的實施，農業日益整合進入這個綜合體；

(九)資本積累邏輯的固有趨勢，是不斷增加的供應和需求，特別是在能源領域，它的表現是訴諸核技術。

從能源的角度來考慮，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迫切需要摧毀這個集中化系統，該系統是無法無天的，浪費的，效率低下的，死勞動力密集型的，基於非可再生能源的，並面向商品生產過剩趨勢的。必須取而代之的一個系統，是分散的，計畫的，經濟的，高效率的，生勞動力密集型的，完全基於太陽能 and 面向實際耐用，可回收和可重複使用的設施的生產。這一轉變並不僅涉及狹義的能量“生產”，而且涉及整個工業體系，農業，運輸，休閒活動和城鎮和農村規劃。

能源/氣候挑戰，使社會主義革命被設想成這樣的：它不僅摧毀資產階級國家力量，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這個國家一建立就開始消亡並逐步走向實行人民群眾的自我管理，而且也是一個進程的開始，這個進程就是銷毀舊的資本主義生產機器和更換以另一種機器，採用其他技術和其他工業生產過程服務於民主決定的目標。這一極其深刻的歷史巨變，只能真正開始於社會主義革命在全球範圍勝利後，在主要的不平等發展的消除，將有可能名副其實地滿足每個人的基本生存權利的時候。它特別要求，不同國家初步實現食品和能源的自治。遠

不同於停滯，或人類發展的停止，與此相反，它意味著，在科學和技術上以及民主執行它們的社會能力方面的一個重要進展，在“謹慎照顧”生物圈的文化框架內，每個人積極參與，而土著社區的貢獻將是非常寶貴的。

革命馬克思主義普遍認為，一旦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人類在品質上的發展將凌駕於其數量發展。這一概念同馬克思的想法一致，對他們來說，真正的財富寓於空閒時間，社會關係和認識世界。“太陽能共產主義”的視野，與非生產力主義思想是合乎邏輯的相連的，同時又在深化它，並且根據需求，任務和方案得出新結論。這個深化大為加強了使用生態社會主義新概念的理由。作為反對資本主義剝削人的勞動和破壞自然資源的共同鬥爭的集中體現，生態社會主義不是出於空幻虛妄的，應建立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的理想，而是來自唯物主義的需要，根據生態環境的原因，管理社會與自然的物質交換，換句話說，以可能同生態系統的良好運作最相容的方式，管理社會與自然的物質交換。

2009年3月

附注

[1] 決策者備要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SPM), 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2007年。注：給出了與1999年相比的溫度變化，因此應該會上升0.7攝氏度，以表明同前工業時期的比較差異。

[2]聯合國開發計畫署，世界人類發展報告，2007/2008

[3] “二氧化碳當量”考慮到整體的溫室氣體，把它們都當成是二氧化碳。

[4]同參考的情況相比，一個“重大偏差”對應15%至30%的變化。

[5]能源強度和碳密度分別指，為產生一個單位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天然氣形式的能源消耗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

[6]我們應該加上地熱能源，唯一的非太陽的能源，但其潛力是微弱的。

[7]目標提高至百分之三十，其前提是有一項國際協議，其中包括其他工業化國家的類似減排和新興國家的認真參與這項努力。但這一目標仍將維持在專家建議範圍的較低段。

關於國際形勢的解說

弗朗索瓦·薩巴多

這份報告已提交給第四國際執行局2009年10月17日會議討論，以期在第四國際第16屆世界代表大會上作討論。它代表2008年11月15日執行局擴大會議上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危機評估”的繼續，“危機評估”這份報告已發表在《國際觀點》上。【編者按：這份報告已由本刊譯出並刊登於本刊上一期，題為《經濟危機多方面地決定整個世界政治》，原文本無「經濟」，為本刊所加上。】

1. 目前的危機

國際局勢的特點依然是一個全面多層次的危機——經濟的，社會的，與糧食有關的，以及生態的——它在動搖資本主義世界。儘管有“經濟衰退在結束”或“危機在消退”的說法，世界經濟的現實仍然取決於主要矛盾，這些矛盾導致危機中的“蕭條”，大規模的失業，劇增的貧困（超過10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和日益增加的生態災難危險。

1.1. 一個“危機的出路”？

從分析的角度看，全球化資本主義所經歷的持久危機的目前短暫發展包括一些不確定因素。當然，全球經濟危機的速度已經放緩。一個普遍的經濟衰退（美國和歐洲的-3%至-4%的負增長，以及全球的-1%至-1.5%的負增長）之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2010年預測是“輕微復蘇”，預計其增長速度為3%。這些指標首先反映的是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復蘇（7%，即使它含有的一系列矛盾），與美國約1.5%的“軟弱”增長以及歐元區0.3%的非常低增長率，形成鮮明的對比。

在美國與歐洲，其實這些“小復蘇”代表危機放緩。首先，這是國家大規模干預撐起國際銀行系統（從而允許投機泡沫重新膨脹）的結果，特別在西歐，是所謂“社會穩定器”的作用，即所有公共援助和社會保障設施的作用。它還涉及資助購買諸如汽車那樣的產品。

這種來自國家的大規模和部分協調的干預，說明瞭危機為何以及如何被遏止住的。這是當前危機同1930年代危機的巨大分別。

1.2. 危機依然

但是，全球公共財政的這些支持機制在過去12個月的影響一旦消退，經濟將再次面臨一系列短期的和結構性的問題。

在綜合因素的層面上，國家和政府都面臨著爆炸的公共債務，銀行並不總是知道它們帳戶上的“有毒產品”的範圍程度，面臨它們的公平性問題。因此，有毒資產仍然多於那些已經貶值的。新的投機性螺旋上升和新有毒資產的發現，兩者的組合可能導致新的股市崩盤，震盪整個經濟領域。最後，失業和工作無保障性，結合它們的一切破壞性社會後果，將加重對社會力量關係的壓力。

在結構方面，局勢仍然進退維穀：它的特點是新自由主義體系的意識形態危機和廣泛資本主義政策的繼續實施，以及同一矛盾的再度發生。危機的深度導致統治階級針對數百萬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條件，部署新的攻勢。

1.3 新自由主義積累模式之矛盾的深化

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一個資本主義積累的新模式用來恢復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下降的盈利率。在一連串工人失敗的基礎上，工薪階層的價值份額被壓縮，剝削條件和剝削比率上升，公共服務業私有化普遍實行，社會關係的調節被放鬆，公共預算減少，以及在發展中國家實施結構調整計劃。所有這一切都被納入市場的全球化，而且勞動力的全球市場的法規趨向統一，把工人置於互相競爭的境地。

就像所有統計數字表明的那樣，是利潤恢復而不是生產性投資恢復。這些利潤指向更有利可圖的產品，比如金融產品。正是這個運動引起了北美和歐洲所有行業和地區去工業化，以及/或者搬遷，特別是移向亞洲，首先移向中國，後者已成為“世界加工廠”。因此，世界經濟“金融化”的總體過程啟動，從而擴大了業已存在的“虛擬資本”。同時，這些機制使得在世界經濟的中心，美國和歐洲，設立一系列的公共和私人的債務重組。

因此，一時之間，公共和私人債務政策為這些扭曲做補償，直到危機爆發。儘管工資下降，家庭負債卻維持著消費水準。儘管它們的工業基礎在萎縮，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首先是美國的債務，允許他們靠信貸生活。債務推遲了危機的普遍出現，至少延緩到2007-08。

隨著資產或生產部門的大規模貶值，已經崩潰的重組有：銀行的破產和重組，裁員，以及企業關閉。危機的整個發展及其機制再一次確證，它不只是一個金融的或銀行的危機。它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全球危機，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實施的恢復利潤率的所有機製造成的。

1.4.資本的新攻勢：“像以前一樣，差不多肯定會更糟糕。”

危機時期，勞資衝突加劇。在維護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地位的同時，統治階級必須遏制危機。該系統不再能一如既往地運作，但對資本主義利益的保護，促使政府繼續並深化同樣的政策。

誠然，通過20國集團聲明，已採取措施，“控制”避稅天堂，“框正”銀行體系的運作，“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用來拯救一些經濟瀕臨破產的國家的資金。這場危機甚至導致該制度的合法性問題，使得需要到處表明或表態，以圖“道德化”資本主義。但在言論和行為之間有一個深淵。銀行已從危機和公共援助中獲益，擴張它們的利潤，傷害生產信貸，而公共援助的本意是幫助生產信貸。此外，投資者正在購買同類型的資產（金融產品，原材料，同原材料連接的貨幣），鼓勵新一波投機的螺旋上升。

事實上，在危機的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正在尋求一個新的攻勢，打擊社會和民主權利，以圖增加對勞工的剝削率並保障利潤。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施政方向，確定了其讓工人和人民為危機買單的方案：

通過增加稅收和減少公共赤字，為債務爆炸買單。在這兩種情況下，受害者都是民眾。

大公司的重組，導致數以百萬計的失業，就業無保障感的增加，同時加強所有系統的多變性。婦女特別容易受害於危機的後果。根據勞工組織估計，2009年全球將有2千2百萬婦女失去工作。首先是服務業，衛生部門或服裝業的大規模裁員，使她們受到影響。退學，失業，貧困，婦女是世界經濟衰退的第一批受害者。這場危機用來

降低成本，提高生產收益率，重定工作流程，以及重塑市場。2007年1月至2009年3月，在206家上市的歐洲公司中，有126家宣佈了146項裁員計劃。經合組織國家預測，2009年和2010年會有約2500萬的失業者。

—工資的壓力仍然非常強勁。“復興計劃”首先反映在對銀行和投資的援助上，也即對公司的援助上，但不是工資的增加上。此外，在某些行業或國家中，有一個協調一致的政策降低工資，比如在波羅的海國家的公務員部門，在羅馬尼亞和冰島。

—除非在某些例外情況下，如阿根廷的社會保障制度或日本的郵政服務，私有化得以確定。

危機開始以來的一年多之後，這些指導方針解決了關於經濟復蘇假設的爭論，這些經濟復蘇假設依據的是凱恩斯政策，即通過增加工資，發展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以使需求復蘇。1945年後，對英國銀行的控制遠離國有化進程。有國家干預——一個“新自由主義中央集權”——在面對危機時保障資本主義利益，但並沒有一個全球性的新凱恩斯主義政策，因為在目前的條件和各階級勢力之間的關係之下，它不是統治階級的選擇。

危機後，要在2009年的社會和政治力量的關係中恢復收益率，這個目標，推動企業領頭人和金融首腦會議增加對工人的壓力，讓所有的生產和經濟組織從屬於追求更多的利潤。總是尋求更多的資本利潤，只能導致工資的緊縮，無保障工作的暴漲，公共服務的拆除，經濟的商品化和金融化。這種邏輯同社會需要的滿足是不一致的。正是這種矛盾鞏固了我們的反資本主義信念。拒絕這個邏輯需要一個重新分配財富的鬥爭，讓大眾階級受益，但也要挑戰資本主義所有制，用社會需求替代利潤邏輯。

1.5.對生態危機的資本主義回應

正是在這個框架裏，有必要對付生態危機。特別地，正是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的結合，使目前的危機有“文明危機”的一面。同氣候變化有關的問題也表明生態危機的特殊尖銳性。所有科學家的研究結果都集中在到2050年減少50%至80%溫室影響的緊迫性上，以便在本世紀不超過升溫1.5度的固定的“危險”起點。到2020年，歐洲聯盟的“3個20%”：-20%的碳，20%的能源效率和+20%可再生能源，低於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

員會（IPCC）規定的要求。

·除此以外，“綠色資本主義”的項目具有雙重性：第一，有人民大眾買單的生態發票---或設立在“綠色稅收”帽子下面的公共赤字---買單的方式是通過稅收制度，該稅收制度繞過大公司建立新市場時尤其是有污染權的市場時的責任。況且，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不能找到生態危機的解決辦法。利潤動機只能導致各個資本相互競爭對抗。任何中期和長期的協調行動面臨同市場邏輯的對抗。能源效率並不只是要求能源消費的減少，一系列企業的再轉換，用可再生燃料替代礦物燃料，而且還要求生產設施的重組，一個只能通過協調和規劃施行的重組，因此，這種重組只能在公共和社會所有制下，而不是在主要經濟部門的私人所有制下進行。

·生態和經濟危機的結合，將加劇打擊這個星球特別是非洲的糧食危機。今天，30億人得不到足夠的食品，20億人患有營養不良和10億人受害於饑餓。由農業出口破壞糧食種植，對原材料的投機，如中國、沙地阿拉伯和韓國這樣的國家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購買的幾十萬公頃土地，使糧食生產越來越難進行，並加劇惡化了數百萬農民和人們的生活條件，這些人中百分之七十五是無法工作的農民和農業工人。遠遠沒有解決這些重大問題，遠未克服目前的不平衡和減少不平等現象，糧食危機在加深。

要分析一個持久的危機不能陷入災變主義。應該永遠記住，對於資本主義，只要沒有可以改變其制度的足夠強大的社會和政治力量，就不存在出路。資本主義可以繼續運作，但是其社會生態的經濟成本越來越難以承擔。要理解到這一危機是“文明的危機”，須要考慮到一個垂死的歷史制度的情況。

2.一個新的世界組織？

這場危機是部分性的全球崩塌。它已確認並規定了世界各地的國家和階級之間的力量新關係。在國際範圍內，重組“危機世界”的動機已經翻倍增加。

2.1.美國霸權的衰落：現實和限制？

主要的動機是奧巴馬勝利後的美國權力新部署。它甚至是奧巴馬當選的原因和職能之一：恢復對世界政策的控制，即使這並非沒有矛盾，它

主要涉及經濟危機（健康，產業結構調整）。突然，美國霸權的“必然衰落”成了話題。危機削弱了美國的地位。事實上，由於美國工業基礎的削弱和其債務的結果，這一地位在危機發生之前已經削弱了。但是，美國仍繼續保持其在世界關係的主導地位：

a) 在政治-軍事方面，儘管同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西方軍隊一起陷入泥沼，他們仍保留總霸權。與以往相比，在美國管理下的北約構成了西方列強主宰世界的強臂。在拉丁美洲，在組成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上遭受到挫折後，隨著特立尼達美洲峰會（一個在美洲大陸恢復美國市場的開放政策），而且還伴隨著洪都拉斯的政變以及哥倫比亞的軍事基地再部署，美國政府重新發力，讓人見識了其在美洲大陸的政治軍事霸權欲望。

b) 在經濟方面，美國市場的規模使其能夠繼續佔據世界GDP總值的很大一部分（約25%），儘管它已經下降好幾年了。

c) 在金融和貨幣方面，美元仍然是主要的國際貨幣。它已經削弱了，正越來越多地受到其他企求國際地位之貨幣的挑戰，也受到作為“庇護價值”的黃金的挑戰，但它仍然是國際參照貨幣。美國政府面臨一個矛盾：要麼維持美元在較高水準，這樣就特別要求中國繼續持有美元國債，而美國的出口則受到打擊，或者讓美元競相貶值，使美國產業較有競爭力，美元和美元資產則下降貶值。但是，應該指出，儘管美國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削弱，美元仍在持守自己。

2.2.中國和主要新興國家的作用

美國雖保留了主導地位，但也應注意的是，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即“金磚四國”）的經濟實力的上升，尤其是後者。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在世界的比重繼續增長。世界其他地區處在衰退中時，其增長率為6%，而在世界經濟擴張的階段，其增長率超過10%。中國並沒有取代美國。不斷擴張的中國和危機的帝國主義中心之間的“脫鉤”論並沒有站住腳。中國受創於危機的後果，但並沒有崩潰。現在中國經濟在世界的作用，將取決於它構築內部市場，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增加工資以刺激需求的能力。如果這些條

件得不到滿足，中國的動力會放緩。官僚機制，猖獗的腐敗現象，對流動工人的過度剝削，所有這些都給內部需求以負面作用。在全球一級，美國和中國（像其他美國合作夥伴一樣）的聯結關係是既合作又競爭的，但在這個階段，則是合作優先。

也是在這個多極的框架內，我們必須處理與巴西的關係，巴西已成為一個新的帝國主義強權。早在60年代，“次帝國主義”的概念就被引用於巴西，說它是一個帝國主義，但卻是一個從屬美帝國主義的二流強權。同美帝國主義的力量相比，它當然是二流的，但它並不是從屬的。巴西的經濟、金融、社會、領土、能源和軍事實力，使其成為美帝國主義合作夥伴，也是競爭對手，尤其是美國在拉丁美洲的競爭對手。在這種既競爭又合作的情況中，美國將通過其政治軍事霸權的使用彌補其在全球競爭中的薄弱點。

2.3. 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世界的軍事緊張局勢中心、

這些國家的利害關係仍然是美國政府的首要戰略問題。正是在這裏，美國在世界的軍事領導力岌岌可危。這些地方有一個損失，整個全球力量關係就會崩潰。這就是為什麼超越在伊拉克戰爭中的帝國主義的內部矛盾，所有的西方列強最後與美帝國主義結成一氣。在這方面的最新舉措是法國回歸到北約管轄指揮下。作為20國集團的補充，2009年4月的斯特拉斯堡首腦會議顯示了這種變化。同時，美國放棄東歐導彈部署計劃，以期設法讓俄羅斯和中國保持中立。

這一地區的政治很好地說明瞭奧巴馬當選以來的美國新政策。一方面，“開放”一些倡議、講話和姿態。在這裏和那裏，提到阿拉伯文明對世界的貢獻，與伊朗的“對話”據說已經提上議事日程，向以色列政府施壓，要它放慢在巴勒斯坦領土上建立猶太複國主義的定居點。但事實上，對伊朗的威脅翻倍，美國從伊拉克的撤軍永遠地拖延下去，帝國主義在阿富汗的戰爭力度加倍，而讓以色列內塔尼亞胡政府隨心所欲做其想做的事。

帝國主義干預的理由是多方面的：控制自然資源（首先是石油），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的周邊地區的地緣戰略之存在。但是，本地區衝突的目的是維護美帝國主義重新確立其軍事霸權的能

力。此外，軍隊撤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要求，是尊重人民權利並在戰略上削弱帝國主義列強的基本做法。在這個意義上，尤其在加沙事件發生後，我們比以往更加捍衛巴勒斯坦人民的權利，即：立即停止定居點政策，以色列從1967年佔領的領土撤出，捍衛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園的權利，支持“拆除猶太複國主義國家，以及所有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猶太人）可以共同生活在完全平等的權利中的政治解決方案”（國際委員會的議案，2009年2月）的觀點。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參加了BDS（“抵制，撤資，制裁”）國際聲援運動，聲援巴勒斯坦人民。最後，拒絕帝國主義對伊朗的威脅，絕不能導致對阿麥內賈德政權的支持，而是相反，積極聲援百萬伊朗人的民主動員，反對獨裁政權。這裏，就像每一次衝突一樣，我們的方針仍然是捍衛被壓迫者的利益和鬥爭，捍衛他們的社會和民主權利。

2.4. 拉丁美洲對抗的新階段

對於新自由主義政策和帝國主義攻擊，這個大陸仍然是抵抗最激烈的社會。這個大陸反復地受到暴動和社會鬥爭的損傷，正如剛剛發生在洪都拉斯的危機表明的那樣，在那裏，儘管軍隊鎮壓，這個國家50年來第一次出現了廣泛的反對政變陰謀的民眾運動。鬥爭是多方面的。無論是委內瑞拉，阿根廷，或者玻利維亞工人的罷工鬥爭，厄瓜多爾和委內瑞拉的反帝運動，或者安第斯國家和中美洲的土著運動，社會和政治的抵抗是存在的。應特別強調土著問題的新動態。成千上萬的印地安人已行動起來捍衛他們的土地，他們的自然資源，他們的生活方式，要避開跨國公司和掠奪者的覬覦狀態。同時，伴隨著對人與自然的某種平衡的重視，他們可能會成為保護“社會公益”和“較好生活”的鬥爭的一個參照點。但面對這些事件，統治階級並沒有無動於衷：面臨墨西哥、洪都拉斯、哥倫比亞、秘魯、玻利維亞、委內瑞拉的社會運動，他們既同巴西勞工黨（PT）這樣的黨合作，也與阿根廷庇隆主義黨（即使以同它較為衝突的方式）、烏拉圭廣泛陣線、巴切萊特的智利左派或薩爾瓦多左派合作。

這導致三個類型的政府和形勢：

-墨西哥、洪都拉斯、哥倫比亞、秘魯的右翼和極右翼政府，以及表達玻利維亞、委內瑞拉、或厄瓜多爾的資產階級團體之冷酷反對的右派，

這些資產階級團體沒有放棄推翻查韋斯和莫拉萊斯政府的企圖。今天，這些團體所處的進攻態勢，受到美帝國主義的軍事和政治首腦會議的支持。洪都拉斯政變，特別是哥倫比亞的美國新基地的設立就是它的證明。

—第二類的政府，各色各樣，由巴西、阿根廷、尼加拉瓜、烏拉圭、巴拉圭和智利做例證。這是社會自由主義的政府，尊重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一般標準，尊重與大鄰居美國的合作關係，即使其相處方式是有衝突性的，比如巴西的盧拉政府。在這個集團中，我們發現巴西得力於其規模，自然資源，其經濟力量，占居主導地位。還必須指出的是，一般而言，對於看到自己的社會政治基礎萎縮的社會自由主義黨派來說，全世界的社會自由主義經驗都未有好結果，但這不是盧拉所領導的巴西的情況，在巴西，“家庭補助”的政策給了工黨政府一個真正普遍的民意支持。

—第三類政府，受到古巴的支持，以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為例證。我們實在必須區別每個國家的勢力和事件的動態。這些政府奉行的政策有：同美帝國主義的部分決裂，有利於社會化計劃和最貧窮社會階層的收入再分配，以及對社會運動的支援。我們站在他們一邊，反對美帝國主義。圍繞21世紀的社會主義新概念的經驗，產生了辯論，我們從中學得東西，捍衛我們的建議。但是，我們應當重視每個經驗的具體情況。如果查韋斯和莫拉萊斯依靠的群眾運動帶有玻利維亞社會運動的強大壓力，並且伴有委內瑞拉更加“波拿帕主義”的關係，那麼最近的事件表明，在厄瓜多爾CONAIE（厄瓜多爾土著民族聯合會）土著運動和科雷亞政府之間有對立。這些國家的政府和群眾運動之間的關係，構成了今後對於這些經驗的重大考驗。但在其背後仍有一個關鍵問題，即與資本主義決裂的程度，同其利潤邏輯，它的金融關係，所有制以及危機決裂的程度，以及同打擊這些國家經濟基礎的危機的破裂程度。從這個角度來看，迄今為止，這些國家的政府並沒有抓住危機機會，大力推動同資本主義及其“掠奪式生產至上的模式”的決裂。

2.5. 深陷危機的歐洲

面對美國的反彈和金磚四國的崛起，歐洲已經見到其世界地位的惡化。這場危機打擊了舊大陸的經濟。一些特別因素使事情變得更糟。歐洲聯

盟的政策制訂方式結合了其主經濟體的不同機制 --- 英國金融，法國貿易赤字和德國的工業出口 --- 導致它的反應方式是局部片面的，並沒有真正協調的政策。多年來一直強調“自由和無扭曲競爭”主張的歐盟條約，有利於金融化進程而傷害產業政策。歐洲，特別是法國，已經發生非工業化過程。失業正在急速擴大。同時，歐洲國家的債務和財政赤字在危險地增加。

到了東歐，一些國家的經濟強烈地依賴國際銀行系統，它們只有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國際援助輸液而活下來。已實施的政策---匈牙利，波羅的海國家和羅馬尼亞延伸到了對公務員減薪的組織 --- 充分說明瞭這些國家的危機深度，以及它們的環境危機的深度。

這就是為什麼歐洲內部的矛盾將更加突出的緣故。保護主義的誘惑有可能會出現在這裏和那裏，但這不是歐洲資產階級的根本選擇。他們選擇了全球化，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並沒有加入像“歐洲資本主義”這樣的共識。相反，是各國經濟和多國經濟之間相互連接的利益，決定了基本準則。從而全球競爭可以擴大跨歐洲內部的競爭。

最後，在此危機持續的情況下，右翼把經濟進攻同政治攻勢結合起來。除了希臘和瑞典以外，最近的歐洲選舉證實了這一趨勢。法西斯主義或半法西斯勢力也趨於增加他們對國家政治局勢的壓力。

就在同一個運動裏，特別聚焦於反移民政策的專橫方案得勢得力。全球化和貿易的增長，由北方造成的南方貧困，生態或糧食有關的災害，造成人口眾多的國家，尤其是貧窮國家向富裕國家的人口大規模轉移。危機加劇了對移民的剝削和壓迫的現象。種族主義運動使他們成為替罪羊。這必須由勞工運動作出反應，推動保護移民權利的政策。

更普遍地，正在以“反恐鬥爭”的名義，制訂針對鬥爭和社會運動的刑事政策或壓迫制度，建立檔案，監聽系統和黑名單，毫不尊重民主權利。

所有這些緊張情況，甚至會越過社會鬥爭的迴圈，可能導致政治或憲法危機的爆發。

一個《歐洲憲法》的專案，由里斯本條約通過，目的是在這一框架內，讓歐盟組織發揮部分的強化權威（強勢總統，單一的國際代表權，等等）的作用，在國際層面上，實行集中的沒有民主（即

使是形式上的民主)控制的歐洲政策。成員國保留在這種形式上民主的憲法框架內,使得這樣的歐洲決定面臨越來越空洞的意義,這個決定就是:以歐洲主要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協商為基礎,“制定”國家政策。這是一個不平等的歐洲聯盟(即“小國”服從“大國”),人民被剝奪了任何甚至是形式上的議會干預權,而這個權力在憲法構築過程中是有的,這一點反映在第二次愛爾蘭全民公決的結果中。最後,面臨歐洲聯盟的計劃,為了一個服務於工人和人民的歐洲,基於對社會和民主權利的保護,反資本主義左派必須捍衛國際主義傾向。

3. 歐洲左派和工人運動的演變

1929年的危機經常被用來作為參考,評估目前的危機程度。在社會和政治層面,20世紀30年代也可能成為同現階段做比較的參照點。社會和政治衝突不是那麼殘酷。社會減震器緩減了對抗。有人用“緩慢運動的1930年代”的說法形容目前局勢的特點。這兩個歷史時期之間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但在雇員,社會運動,工人運動和民粹主義,獨裁,仇外右翼之間,競爭卻開始了。左翼和右翼各有一個極端。經濟危機和階級鬥爭之間不存在機械關係。

在各個勢力的社會和政治關係的惡化已經超過10年的情況下,這場危機出現了。工薪工作者經歷了重組過程,這個過程把勞動力個人化,從結構上削弱了工人的集體組織。傳統的工人運動經歷了一個不爭的下降。這一危機將加劇這些結構調整的進程,同時也會導致一些新的問題。不過,為了抵抗危機,組織和機構中的支援點已保存好。在這個危機的第一階段,焦慮是普遍的,失業的恐懼重壓著工人的集體鬥志,但他們沒有意志消沉或被打垮。新一代正出現在第一波的罷工運動中。對危機的抵抗已經興起,只不過根據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和力量關係,抵抗的興起是部分的和不平衡等的。但危機早期階段的社會政治影響並不能扭轉局面的基本趨勢。失敗已經見於一些公司的成百上千的裁員中。總體而言,雖然在很多情況下有真正的社會抵抗,資本主義的重組計劃已經在實施。而非常苛刻的新攻擊正在到來。

因為傳統工人運動的領導人對所有行業的工薪工作者的解散或迷失負有主要責任,這種局面

會更加困難。工人難以知道如何迫使他們的雇主和政府回頭。傳統的工會運動和社會民主組織的選擇必須順應統治階級和政府的政策,以應對危機。有一個關於復蘇計劃的容量和層面的討論,該計劃涉及這樣或那樣的有關銀行體系重組的措施,但總的來說,歐洲的社會民主是蘊含在歐洲聯盟的計劃中的。歐洲社會黨(PES)的宣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例如,甚至沒有為凱恩斯改革派的選擇方案做過任何的力爭。這場危機加速了工人官僚---工人運動中的社會特權階層---在資本主義制度中的體制化。

這也加劇了社會民主黨的危機。社會黨的社會自由主義演變已經破壞了他們很大一部分的社會基礎和人民政治。但衰落愈演愈烈。在上屆歐洲議會選舉中,社會民主黨遭受了淨虧損。德國和葡萄牙最近的議會選舉確認了這一趨勢。2005年至2009年社民黨失去了近450萬的選票。葡萄牙社會黨在上次議會選舉中失去了9.5%的選票。我們不能排除這樣或那樣的“向左轉”傾向以容忍這些損失,但工會運動和社會民主黨的大組織對資本主義危機管理迫切性的進一步適應,是主要趨勢。因此,在德國社民黨與基督教民主聯盟大結盟後,法國社會黨準備與中右派建立聯盟。這一運動是更廣泛進程的一部分,在該進程中,社會民主黨裏面興起越來越多的聲音,要求超越“舊的社會黨”,並同這些政黨的工人運動的剩餘歷史決裂。這是義大利左派的動態,前義大利社會黨(PCI)的所有部門正在演變,意欲建立一個美國民主黨式的政黨。

在這個過程中,綠黨和環保主義者發揮積極作用。得益於人民對生態危機的合理關切,特別是在法國和德國,他們的政治作用不斷增加。總體上,他們的方向適合一個關於傳統左派,中間派和環保主義者大聯盟的觀點。

這種情況為危機中的民主左派打開一個空間。這就是葡萄牙左翼聯盟和德國左派在上次選舉獲得突破的意義,是像丹麥紅綠聯盟,愛爾蘭左派這樣一些組織對里斯本條約說‘不’運動之組織的重要意義,也是法國的新反資本主義黨(NPA)的重要意義。

雖然這種現象是全球性的,但基本的左翼形勢在各個國家是具體不同的,特別是從歷史、勢力關係和選舉制度的角度考慮,更是如此。實質性的政治分歧也存在於各黨派之間,有的決定與資

本主義制度決裂，有的則明確捍衛其對於社會民主黨的獨立性，還有一些黨的專案則涉及對於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及其規章的管理。拒絕參加具有社會自由主義性質的地區或全國政府是一個明確的標準，它同獨立於傳統左派舊組織，重組和重建社會運動這個遠景的要求，也是生死攸關的。在有激進左翼參與的社會民主黨或中左政府的國家，它已被社會自由左派孤立。資產階級體制的吸引力強於所有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宣言。這就是與德國左派領導進行討論的意義。

左派聯盟的發展是德國左翼的一個進步，但其領導人所採取的方向 --- 在綱領層面（回到“社會國家”，“福利國家”）和有關社民黨同議會和政府結盟兩方面 --- 是對德國工人運動重組的重大危險。不僅在左派聯盟中，而且在整個德國社會和政治左翼中，建設一個反資本主義的替代左派，仍然是歐洲的關鍵問題之一。

最後，歐洲的這個激進左翼現實比以往更需要一個組織反資本主義左派的承諾，特別是通過舉辦會議、辯論和共同的活動把反資本主義左派組織起來。



4. 反資本主義綱領

危機深度給出了新的緊迫性，要做出反資本主義的反應。“不是工人和人民，而是資本家，應該為危機買單！”這是在所有反對資本主義危機影響的抗議中出現的呼聲。我們還能給民眾的這種願望以什麼內容？

首先是一個反對裁員和縮減工作的緊急社會生態計劃，通過維持工作合同以及維持由公司、雇主職業部門或者失業及半失業狀態保證的收入，來禁止解雇，減少工作時間而不減少工資，增加工資和購買力以及退休金和養老金，保護和更新公共服務，捍衛婦女權利--- 反對一切歧視，打擊針對婦女的暴力，爭取婦女的墮胎權和職業平等權，一個聚焦於生態優先重點（節能，可再生能源，防止環境污染，公共交通，社會住房，

在有用的社會環保活動中創造就業）的公共工程的重重大政策。

滿足這些條款，需要對財富做不同的分配。如果數千億美元可以在一夜間釋放出來，那麼金融、工業和銀行的利潤和大財富就一定能夠被徵稅，以便資助就業、工資、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美國和歐洲都許可的，在一些國家或領地蓬勃發展的避稅天堂，應被清算。防止財政傾銷和對公司利潤徵收均勻高稅率的簡單措施，必須執行。

但危機帶來了另一個問題：誰控制，誰決定，誰擁有？這是公眾和社會的撥款問題。有必要建立一個一般的法律：讓公共服務免於競爭規則。建立戰略性公共服務的公共壟斷。對私人所有的關鍵經濟部門，我們反對這些行業的公共和社會的所有。根本的解決辦法必須要重組銀行體系。銀行和金融部門必須在民眾的控制下統一和國有化。

最後，經濟和生態危機的結合導致一項必要做法：改變資本主義邏輯，用社會需要代替利潤和生產主義。這需要整個經濟行業，比如汽車、武器或核電力行業的轉換，以滿足社會生態平衡的要求。“共同利益”將是一個平衡的生態社會主義目標，它賦予民主規劃一個中心。

在當前各勢力的社會關係中，這些目標似乎無法實現。但是，危機把根本的解決方案放到了議事日程上，這些方案會同統治階級發生對抗。這場鬥爭需要特殊的社會和政治動員。關於局部鬥爭、整體運動和總罷工之間的關係的辯論，再次提上議程。在這種情況下，革命者必須把實際群眾運動的整合、行動的統一、鬥爭的建議和整體社會主義的反應結合起來。爭取局部的改革和社會變革的計劃，提出了關於權力的問題。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經常批評激進的左派，說它不做實事也不承擔責任。為了駁斥這一指控，反資本主義分子必須證明，他們正在努力為一個廣泛的群眾性自治組織運動創造條件，要讓這個運動出現在政治舞臺上，推出一個實行社會民主和反資本主義綱領的民眾政府。這個與資本主義決裂的政府的遠景，需要堅定不移地不參與社會黨或中左派的社會自由主義政府。

最後，所有這些鬥爭，必須要從一個社會主義和生態社會主義的觀點，著力於展現另一種社會替代計劃的廣泛輪廓，一個生產和消費的新模式，一個社會主義民主的民主新概念。

從天安門到日本民主黨政權

趙京

2009年8月30日這一天，日本反對黨民主黨在國會選舉中贏得壓倒性勝利，獲得眾議院480個席位中的308個席位。在日本國會中，眾議院比上議院優先，而民主黨已經在一些小黨派支持下控制了上議院的多數席位。這是日本在戰後和平憲法下，一個反對黨第一次在國會選舉中獲得多數席位。半個多世紀來幾乎從未中斷執政的自民黨從300席位劇減為119席位，總裁麻生太郎已經代表自民黨承認選舉失敗。自民黨在小泉政權下的迴光返照後幾度苟延殘喘，這一次用盡了威脅等選舉手法攻擊民主黨是“極左”，也沒能阻止保守的日本選民拋棄自民黨。民主黨領袖和即將成為首相的鳩山由紀夫已經開始對如何接管麻生太郎首相的政府進行商議。

鳩山強調這次選舉勝利，除了代表政權的交替外，還要更替利益交換的舊政治運作和由官僚支配的日本主權，並承諾在政府政策上作出全盤的改革。例如，要讓日本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擺脫美國式資本主義的某些弊端，將對鄰近的中國尋求更密切的經濟合作，將把資金和資源以兒童醫療保健和免費教育的形式從企業界轉投注給家庭，等等。不過，我們沒有必要過多看鳩山的講演。他本人是日本政治弊端“世襲政治”的典型。他的祖父是前首相鳩山一郎，他的弟弟是自民黨麻生政權的內閣成員。

本來是自民黨死敵的創價學會在冷戰結束後拋棄“人道社會主義”等綱領投靠自民黨，以為可以維持自民黨-公明黨永久執政，這一次從31席位落到21席位，其中，包括其代表在內的政客在只有一人席位的小選舉區全部落選，被趕出政權。日本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各自保住了原有的9和7席位。社會民主黨席位雖然很少，但因為民主黨中還有一些從原來社會黨逃過去的議員，再加上工會等團體對雙方的支持，對民主黨有一定的牽掣作用。但願他們吸取教訓，不要為了一個

大臣的位子放棄原則而全軍覆沒。

這一次選舉多少擺脫了官僚的支配（自民黨議員有三分之一直接來自退休官僚），在鳩山政權下，不會再出現議員在國會宣讀由官僚起草的議案的情況，更不會出現（村山）首相因為不忍心在繼續強佔沖繩村民土地的檔上簽字而被官僚（防衛設施廳長官）訓斥的場面吧！當然，世襲政治並沒有改善，包括鳩山弟兄、福田、安倍、麻生、原首相中曾根的兒子、原首相小泉的兒子、原首相田中的女兒（從自民黨換到民主黨）、原首相小淵的女兒、原自民黨總裁河野的兒子、原首相竹下的兒子、後藤田的兒子等第二、三、四代議員，還是日本政壇上的主角。他們慣於選舉、缺乏知識和視野、對政策不感興趣，不可能像他們的祖父們那樣在戰後帶領日本復興。他們當中，只有臭名昭著的小澤一郎與眾不同，超過其父。

在日本（以及亞洲）的冷戰，結束於1989年6月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坦克對天安門的佔領。從此，日本的統治階級知道：日本第二大的政黨社會黨加上所有的打著各式“社會主義”旗號、親近中國的反對黨（公明黨、民社黨、社民連）已經不可能取代自民黨執政了。他們當中的有識之士（如京セラKyocera公司的稻盛和夫名譽會長。）意識到要模仿美國、開始推動形成能夠取代自民黨的另一個自民黨，而能夠擔當此重任的只有時任自民黨幹事長的小澤。

這一次選舉最大的勝利者是小澤一郎。小澤本來應該坐在今天鳩山的交椅上的。但是，在日本政界翻雲覆雨的小澤畢竟在政府官僚（特別是警務系統）中也樹敵不少，在今年5月突然被警方搜查其秘書的違法獻金。大家都知道，除日本共產黨議員以外，每一個日本政客（包括鳩山，其捐款名單中竟然有死人的名字）都接受違法獻金。小澤刚开始决心抵抗到底，但不久突然宣布

辞职。據每日新聞2009年5月15日報導，小澤在宣佈辭職的前一天，秘密會見了稻盛和夫。可見小澤是在日本財界的意向下，“捨身”保黨，才實現了民主黨今天的勝利。

如果我們再回顧起臺灣的反對黨（民進黨和新黨）、韓國的反對黨也都出自執政黨的歷史，更能體會到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促使共產黨分化的必要。當然，這種分化，必須有客觀的環境。前不久，我聯繫到“六四”後出掌北大黨委的學友，希望被江澤民趕出中國政界的他能夠審時度世，學習委內瑞拉的查韋斯或者俄羅斯的久加洛夫，挺身而出，聚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信徒，也可以擺脫政敵加給他的“李鵬死黨”的冤名。他也同意我的“中國革命的成果已經被江澤民集團出賣殆盡”的判斷，但畢竟不敢“背叛”原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校長的父親。他承認目前“物質力量不夠”，因為他曾撰文要求“我黨要

有駕馭資產階級的能力”而被“駕馭我黨”的“物質力量”（資產階級）的代表勢力趕出北京。將來，中國的新的“物質力量”也不會選擇他來當中國的小澤一郎吧。

從天安門事件到民主黨執政，日本用了20年時間完成了冷戰結束後日本政治結構的轉換。在這二十年間，美國的單獨超級強權地位已經終結、日本的經濟超級大國地位也早已凋零，而中國的國際地位的崛起更顯出國內政治社會矛盾的嚴重性，中國的民主化更具有世界性的意義。我們不必期待新上臺的美國奧巴馬和日本民主黨政權能夠支持中國的民主、民權（維權等）運動，但要堅決抵制20年前那樣的自民黨政權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出賣和壓迫，更要進一步聯合世界民眾，共同推進民主、人權進步。

2009年8月30日

推動日本“外國籍住民地方參政權法案”

遠山裕樹

1995年日本最高法院就永居外國人的參政權判決到：“基於地方自治的重要性，憲法允許通過立法賦予選舉權”，承認外國籍住民（主要指在日本出身的、有永居權的朝鮮/韓國後裔）選舉地方政府官員和議員的權利。在自民黨執政下，外國籍住民地方參政權的法案陷入膠著狀態。現在，在鳩山的聯合政權下，事態出現了轉機，我們要積極推動鳩山政權實現法案的成立。

1998年，民主黨成立時，在其基本政策中，有“早日實現外國籍住民地方參政權法案”條款。民主黨和公明黨1998年10月共同向國會提交了此法案，民主黨2000年6月又單獨向國會提交了此法案（都未通過）。2009年眾議院選舉時，民

主黨本來在政策宣言中要繼續“早日實現外國籍住民地方參政權法案”的方針，但面對黨內“慎重考慮外國籍住民地方參政權研究會”反對派別的壓力，爲了避免選舉前的分裂狀況，取消了這個方針。據說，作爲妥協，反對派別爲此準備緩和申請日本國籍的條件的法案。

以鳩山、小澤爲首的推進派主要爲了加強與韓國的關係，意圖在2010年國會再次提出法案，在國會立法不能實現的情況下，也考慮政府提案的方式實現外國籍住民地方參政權。在聯合政權中，社會民主黨當然贊成，但國民新黨反對。在野黨中，自民黨自然反對，公明黨不反對，共產黨贊成。在8月31日眾議院選舉後實行的調查中，

有半數以上的250多名議員贊成、133名議員反對外國籍住民的地方參政權。

朝日新聞以鳩山的“多文化共存社會”為題發表社論，積極支持外國籍住民地方參政權。每日新聞在11月21-22日的調查中，得到59%贊成、31%反對的結果。而積極反對外國籍住民地方參政權的產經新聞在11月21-22日的調查中，得到53.9%贊成外國籍住民地方參政權、34.4%反對、11.7%不表態的結果，啞口無言。

自從1993年9月大阪府岸和田市議會通過決議以來，日本的3300個地方議會中有1400多個議會決議贊成外國籍住民地方的參政權。在一級行政級別的47個都道府縣，有39個議會決議贊成。

如果鳩山政權言行一致的話，外國籍住民地

方參政權的法案有可能明年實現。為此，我們要積極推動。問題在於法案的具體內容。據11月10日產經新聞的報導，民主黨的法案概要中，有“與日本有外交關係的國籍者”限制，把在日朝鮮人排除在外，分裂在日的朝鮮/韓國人，不能容忍。另外，所謂“參政權”，只是選舉權，而不承認被選舉權，離權利平等相距甚遠。當然，即使這樣的初步法案的實現，也還要排除糾集在自民黨極右集團周圍的排外主義勢力，迫使鳩山政權不要出賣把它送上政權的民眾的期待。

[趙京 譯自日本新時代社《橋樑》週刊2009年12月7日第2103號]

日本“入境管理法”惡化動向

趙京

《朝日新聞》6月7日就日本“入管（外國人出入國境管理）法改正”登載題為“要共生而不是監視”的短評，呼籲日本政府不要把對在留日外國人“管理”制度改得更無人性。

在日外國人2007年底達到215萬人。目前的修改方案是對在留3個月以上的外國人由機場或出入國管理局發行帶IC晶片的在留卡，代替過去由地方政府發出的“外國人登錄證”。外國人必須隨身攜帶此證，在變換住處、學校、公司等時必須報告，連接受外國人的單位也必須報告。如果違反的話，輕則被罰款，重則被取消在日資格。日本政府借此機會，正好把十幾萬沒有在日資格的外國人遣返出國。這是對沒有日本國籍的在日居民的監視制度。

據《橋樑》週刊2009年6月8日號等報導，5月24日有兩、三百名日籍和非日籍人士在東京國勞會館集會，抗議日本政府準備導入新入管法。除了對於在留3個月以上的外國人的監視管理外，對於出身在日本的朝鮮、韓國、中國人，新入管法要發行“特別永住證明”，也得隨身攜帶。當場發言的一位中國女性，說她祖父輩一百五十年前來到日本，現在還是“永住”外國人，人權得不到保障。

日本各黨派正在為修改入管法較勁，準備三年後實施。同時，各市民團體也積極行動起來，抗議法案改惡。讓我們拭目以待。

2009年6月23日

我們在歐洲議會選舉中的共同立場

歐洲 13 個反資本主義左派組織發表的共同聲明

去年 12 月，受革命共產主義聯盟(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 LCR)和新反資本主義黨(New Anti-Capitalist Party, NPA)的邀請，在巴黎舉行了歐洲反資本主義左派的會議。支援該會議的組織發出了這一共同聲明。

首先我們要表達我們對希臘青年針對安德列·格裏戈珀羅斯被殺害事件的抗議行動的聲援。在此嚴重的時刻，我們完全支援反資本主義左派組織的反壓迫，反資本主義計劃和反對卡拉曼利斯政府腐敗的鬥爭。

這場社會暴亂揭示著歐洲反對資本主義計劃和歐盟政府的緊張局勢正在持續積累中。

隨著老闆們和歐盟各國政府對付資本主義危機的政策使數百萬工人的生活條件惡化，這緊張局勢將會變得尖銳。

我們反對歐盟各國政府的政策，這些政策拯救的是銀行，而不是人民。這不是我們的歐洲，正如法國，荷蘭和愛爾蘭的全民公決對歐盟憲法的否決所明確表達的那樣。

我們提出一個反資本主義的緊急計劃 --- 不是雇主的數以千計的裁員計劃 --- 而是以工作為優先，建議銀行和信貸系統的完全國有化，讓它們處於工人和民眾的控制之下，滿足社會需求。

問題不在於所謂的過度“金融化”和完善管理制度，而是同資本主義及其邏輯決裂。

在這種情況下，考慮到每一國家的具體情況，針對老闆們的攻擊，我們將致力於組織協調一致的反擊，同時，為政治替代方案和反資本主義力量的崛起創造條件，並且依靠民眾動員，捍衛滿足工人和人民需要的歐洲，並拒絕

對社會自由主義的社會黨或中左派政府的任何支持或參與。

在此基礎上，儘管我們各個組織有具體的可能性和選擇，在未來的歐洲議會選舉中，我們將一起捍衛這一政治立場。

但在此之前，在斯特拉斯堡和德國巴登-巴登，在北約這個世界軍事帝國主義之象徵建立 60 周年之際，我們將參加統一戰線的反對北約的大示威。

作此聲明的組織：

比利時：革命共產主義聯盟-社會主義工人黨 (LCR-SAP，革命共產主義同盟-社會主義工人黨)

英國：社會黨 (SP)，社會主義抵抗運動，社會主義工人黨 (SWP)

法國：革命共產主義聯盟 (LCR，革命共產主義同盟)

希臘：聯合反資本主義左派 (ENANTIA)，希臘社會主義工人黨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of Greece (SEK))，第四國際希臘支部 (OKDE-Spartakos)

義大利：批判左派 (Sinistra critica，SC)

愛爾蘭："人民先於盈利"聯盟 (PbP)

波蘭：波蘭勞動黨 (PPP, Polska Partia Pracy)

西班牙：反資本主義左派 (IA, Izquierda anticapitalista)

瑞典：社會主義黨 (SP, Socialistiska Partiet)

(譯自《國際觀點》2009年3月第410期)

對摩洛哥反抗鎮壓的進步活動者的聲援

第四國際

第四國際要求立即停止鎮壓，釋放所有被拘者，並停止一切法律追訴。

第四國際在其 2009 年 2 月的國際委員會會議上表示對以下人們的聲援：

1. 在西迪*伊夫尼人民起義後（2008 年夏天）被監禁的活動分子，對他們的審判正在阿加迪爾進行；
2. 希圖卡農業部門（Chtouka）的工會活動者，由於把罷工列為犯罪行為的第 288 條刑法，他們被監禁；

3. 反對大學新自由主義改革鬥爭後，被關押在馬拉喀什的學生們，以及在阿加迪爾受審的學生們；

4. 青年失業畢業生運動活動分子，他們每天在首都和其他城市的街道上受到鎮壓；

5. 撒哈拉活動分子（波利薩里奧獨立陣線的支持者）受到猛烈鎮壓。

（譯自《國際觀點》2009年3月第410期）

加沙危機的背後

吉伯特·阿恰

【這是‘愛爾蘭左派評論’丹尼爾·弗林在 2009 年 1 月 10 日對吉伯特·阿恰的採訪】

丹尼爾·弗林：目前以色列攻擊加沙地帶，你怎麼看待其戰略的主要目標？

吉伯特·阿恰：嗯，這實在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因為涉及的層次不同。從廣泛的角度看，它是一個不斷進行的鬥爭，一方面是以色列，另一方面是哈馬斯以及真主黨，兩方之間鬥爭在 2006 年先行達到了一個高峰，那年夏季，以色列發動對加沙戰爭的同時，另一方面，發動對黎巴嫩的大規模攻擊。這關係到布殊政府與伊朗對抗的全球戰略，在華盛頓占上風的觀念是：哈馬斯和真主黨是伊朗政府的工具，從而是一個勢力聯盟的組成部分，如果美國在該地區的霸權以及以色列安全要獲得穩定的話，這個聯盟應該要粉碎掉。因此，它展開了過去幾年持續不斷的同一個戰爭的一個新階段。



圖片：STWC

現在，如果我們把焦點集中在這一事實上，即選在 12 月 27 日這個非常時刻肇事，當然有短期的政治考慮：一方面，布殊政府很快就要離場，雖然以色列政府沒有真正理由擔心美國的中東政策會發生重大變化，如果我們從奧巴馬團隊所給種種跡象作判斷，仍然存在著這樣的前景，就像奧巴馬在競選期間所說的，即新的行政當局將與伊朗對話。在這種情況下，美

國支援的與伊朗對抗的強硬立場，可能會被削弱。考慮到這點，就知道，為什麼現在發動戰爭，其原因之一就是給下屆政府準備需要，讓它從一開始就要應付大型中東危機，以便減輕奧巴馬團隊的壓力，因為這是希殊遺留的問題。

問題是，行動比預期的時間長得多，現在這已經是以色列侵略的一個經常性模式：'六日戰爭'確實是過去的事了。對於以色列政府，理想的是，而且幾個月前對此也有很多的評論，就是在希殊政府離場以前，攻擊伊朗本身的可能性成真。然而，希殊政府發現有一些會給自己惹來大麻煩的原因，使得此法不可行：不僅是跛腳鴨總統的一般政治弱點，而且還包括經濟危機，在這一點上，使得同伊朗任何形式的軍事對抗，肯定會有害於全球的經濟利益 [本採訪此進行之前，紐約時報揭露，希殊政府拒絕了以色列最近的為空襲伊朗核設施開綠燈的要求]。替代打擊伊朗這個要求的是，以色列攻擊它視為伊朗代理品的哈馬斯。

然後，還有更狹窄的觀察角度，那就是以色列的選舉考量。如你所知，新的以色列大選即將舉行，代表以色列聯合政府的奧爾默特與利夫尼的前進黨的一方，以及埃胡德·巴拉克工黨的另一方，正面臨以色列極右翼猶太復國主義主流的利庫德集團的強大競爭。在某種意義上，這次對加沙的攻擊是先發制人的搶標做法，因為內塔尼亞胡本來要用它來營建自己的競選活動。所以，如果你把所有這些問題放在一起考慮，你就會看到現在發起這一行動的多種因素，也即各種原因。所有的其他東西，哈馬斯發射的火箭和其他一切，都只是藉口，同樣，2006年7月真主黨綁架的2名士兵，也只是以色列發動預謀的大規模侵略的藉口。

丹尼爾·弗林：2006年，以色列同哈馬斯及真主黨之間的最近一輪大對抗，在以色列政府的重大挫折和政治軍事精英的各種指責中結束。你認為以色列現在有實際的機會推翻這個挫

折，談論一場勝利嗎？還是面臨著另一個失敗？

吉伯特·阿恰：嗯，這就是為什麼形勢是極其危險和令人擔憂的原因。想想看：12月27日這個突擊已經開始，這意味著戰鬥已有2個星期了，死亡的絕對人數已經比對黎巴嫩的頭兩個星期的密集轟炸後的死亡絕對人數還要沉重。如果您考量相對數字，因為黎巴嫩人口接近加沙地帶人口的3倍以上，那麼它就多得多了。對於當前形勢，令人非常擔憂和危險的，正是這一點，因為以前的2006年夏天在黎巴嫩的失敗，以色列不能承擔再一次的同樣失敗。他們不能承擔一個新的失敗，為了戰略的和戰術或短期的理由，或者少量的政治計算，都是這樣。

另一方面，以色列政府會失去其相當大的所謂軍事威信，如果它面臨著一個新的慘敗，更有甚者，這一次他們面臨的敵人，加沙的哈馬斯，無疑遠遠地弱于黎巴嫩的真主黨。在黎巴嫩什葉派穆斯林社區的真主黨肯定強于在加沙的哈馬斯，在加沙，你會有哈馬斯和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法塔赫之間的痛苦衝突，會有一些其他團體競爭同一個選區。當然，除此之外，非常明顯的，真主黨比處在加沙地帶的哈馬斯有多得多的武器，加沙是被各方包圍的一個狹長地帶，處在嚴厲的監視下。他們可以走私一些輕武器，而不是重武器進入加沙地帶，但在黎巴嫩，真主黨能建立一個重要的武器庫 - 有敘利亞的支持，它非常容易地做到了。

因此，甚至對於遠遠弱于真主黨的哈馬斯，如果以色列遭到第二次慘敗，那麼這將必然被視為一項重大的災難，比2006年以色列的挫敗更糟糕。更不用提狹義的考量了，這是第二點。如果以色列執政聯盟從目前的戰爭再次慘敗歸來，那麼它的各黨派甚至不必參選了。內塔尼亞胡定然會完全粉碎他們，他們也知道這一點。因此，由於這兩個原因，他們不能承受失

敗，這使得局勢非常，非常令人擔憂。它們可能會發展成受傷野獸的綜合征，使它變得比現在更加兇猛。以色列的戰爭暴行水準，會隨著一場接一場的戰爭越來越高。在以色列悠久的戰爭史中，2006 年的 33 天戰爭已經是最殘酷的侵略戰爭了，以色列極殘酷地用武力，地毯式地轟炸整個黎巴嫩地區的平民區。

於是，現在用作藉口的是，戰士藏匿在居民中。這是最虛偽的論點：他們希望他們怎麼做？難道要他們在一些荒地，舉著‘我們在這裏，請扔炸彈’的路標，重新分組？這是荒謬的。事實是，以色列正試圖粉碎人民大眾的政黨，這些政黨當然是有武裝的，他們必須武裝，因為他們處在永久的威脅之下。這是武裝的群眾運動。他們的大部分武裝人員不是住在軍營的職業戰士。當你考慮問題的所有這些方面時，就有非常非常嚴重的理由，讓國際人道主義機構所表達的擔心越來越多，越來越烈。

很多人都感覺到，加沙居民確實受到大規模滅絕的威脅。這不是通常的那種誇張，這是一個清醒的評估，因為你面對的是這樣的暴力和暴行，日復一日有越來越多的所謂意外，導致平民稠密區為目標的大規模謀殺。以色列避免失敗的唯一選擇是推動其在人口稠密地區的地面進攻。最壞的情況極有可能發生，因此，這將意味著成千上萬的死亡，更不用提致殘和受傷者，這絕對是可怕的。

丹尼爾·弗林：如果在這一次同以色列的最新對抗中，哈馬斯要被視為勝利者甚至部分勝利者，什麼是它必須做的？哈馬斯生存下來是不是就足夠了？是不是他們只須站穩就可以了？

吉伯特·阿恰：如果哈馬斯設法挺住了這場戰爭，這就行了。由於地理條件，他們的隊伍已經遭受了比 2006 年真主黨的傷亡率更高的傷亡率。從以色列轟炸開始的第一天起，如果你還記得，它就針對哈馬斯安全部隊的建築物，死亡人數立即就非常沉重。但是，如果在領導

層和基本結構的層面上，他們設法要保護的東西或多或少地存在，而沒有作任何重大讓步，或者讓我們說，沒有任何重大的沒有回報的讓步，比如‘我們停止發射火箭彈，但我們會得到保證，你們以色列會停止射擊我們，並停止封鎖我們，扼殺我們’，如果這場戰爭的結局是這樣的，這將意味著以色列的慘敗，對他們，這將被視為一個政治上的勝利，就像真主黨在 2006 年達到的那樣。

但就在此刻我們說話的時候，這還是純粹的假設，因為我們無法預測事情將如何演變。確實清楚的是，如果不是在世界範圍內，那麼至少在地區層面上，以色列的這種攻擊大大增加了哈馬斯的人氣。但是，我們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正是因為哈馬斯和法塔赫之間的這種競爭，也對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造成這同樣的作用。關於這個有一些不同的報告。當然，法塔赫支持者會說，‘哈馬斯使我們處在這一可怕的局勢中，因為他們，我們遭受痛苦，當然，以色列是首先要被遣責的，但是...’，從一些阿拉伯政權那兒，我們聽到這同樣的‘但是’。埃及政府從一開始就是這樣表示的，它同以色列的這次攻擊有非常明顯的勾結，這就是我們在這裏和那裏的美國的阿拉伯盟友那兒聽到的，同樣的言辭，我們在 2006 年也聽到，對於以色列攻擊黎巴嫩，同樣的指責真主黨。哈馬斯的最後政治結果，仍有待觀察。我想，現在對它的長期，甚至中期結果作出任何評價，還為時太早。就目前而言，正如我所說，只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即在該地區層面上哈馬斯的人氣在增加，每當以色列單挑一個阿拉伯目標並開始打它時，這幾乎是你自動會得到的結果。該目標之所以自動成為熱門，是因為對以色列的仇恨和它在該地區的長期侵略行為：以色列的任何受害者，尤其是任何抵抗以色列的武力，肯定會獲得該地區的人氣。

丹尼爾·弗林：在過去的一周，有人談到年輕一代法塔赫人中間的一些不滿。有報導說，馬

爾萬·巴爾古提已從他的牢房發送信件，批評馬哈茂德·阿巴斯所作的發言。你認為那有可能在任何實質性形式上處理受到破壞的法塔赫現領導層嗎？你認為有讓法塔赫領導層產生變化的機會嗎？

吉伯特·阿恰：在某種意義上，巴爾古提是法塔赫的備用牌。在很大程度上，馬哈茂德·阿巴斯已經燒毀了他的牌。他不再有任何信譽了，而只像一個僕從，只是這場區域比賽中的一個次要棋子。即使在法塔赫內部，他也不受歡迎，所以很清楚，法塔赫將亟需另一個領導人物，而巴爾古提將會是一個選擇。但是，因為他在監獄裏，他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以色列和華盛頓，這是肯定的。如果他從監獄中釋放出來，要知道巴爾古提會如何做，現在還很難說。主要的問題是，他將與美國和其頭號巴勒斯坦傀儡穆罕默德·達赫蘭有什麼樣的關係。在2006年1月的選舉中，達赫蘭和巴爾古提是選舉聯盟。這是否意味著他們將繼續保持合作，並在後阿巴斯法塔赫的時代，形成一個有凝聚力的優勢團隊，或者他們彼此將作競爭？這還有待觀察。

丹尼爾·弗林：正如你特別提到的埃及政權，以及所有親美的阿拉伯政權或多或少地也都被視為與以色列同謀，尤其是穆巴拉克政府。如果進一步升級，如果以色列的行為，正如你所描述的，像一個受傷的動物，使用越來越多的殘暴手段對付生活在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那麼埃及政府要去證明它能夠遏制自己人民的憤怒，會是如何的困難，而這種憤怒看來已經非同尋常了。

吉伯特·阿恰：嗯，他們不僅僅看起來是同謀。他們實際上就是以色列的同謀：進攻開始之前，他們已接獲通知，這是有報導的。衝擊開始的這一天，在倫敦出版的阿拉伯文日報，聖城阿爾阿拉，出了一篇文章，是其駐約旦河西岸記者寫的，文章說，此前在開羅的以色列外

長利夫尼告訴埃及當局說，以色列就要發起打擊哈馬斯的行動。埃及情報負責人蘇雷曼將軍要求她，把以色列的目標專門對準哈馬斯武裝人員，注意不要傷害到平民。就在文章出來的同一天，攻擊開始了，而且開始針對在加沙的員警營房。因此，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避開平民而專門針對武裝力量的攻擊。毫無疑問，這證明他們已被告知這種情況，而他們甚至沒有告訴哈馬斯，所以攻擊開始時，哈馬斯震驚了，從而導致其武裝力量最初的沉重死亡人數。

埃及政府和其他親美的阿拉伯政權非常希望削弱哈馬斯。他們不是要消滅哈馬斯，因為他們知道，如果真的可能的話，那也意味著一個巨大而傷人的代價。他們想要一個削弱的哈馬斯，讓它除了切斷與伊朗的鏈結，並且必須依賴他們而生存外，別無選擇：這是他們所希望的。他們希望有一個馴服的哈馬斯，因此尋找以色列做這樣的馴服工作。因此，以色列必須給哈馬斯一個教訓，然後埃及，在埃及後面是沙特和約旦，對哈馬斯說：‘看看，你沒有其他選擇，只能與我們合作；或者您按照我們的條件加入比賽，切斷與伊朗和敘利亞的所有鏈結，否則，你將不得不單獨面對以色列，面對被它摧毀的可能性’。

現在如果以色列行動啞火失敗，他們當然會立刻投機變節。他們會變節，開始抨擊以色列，並且大肆發表譴責聲明，這不會走得很遠。在靠近加沙邊界的埃及一側駐紮國際部隊這個問題上，開羅拒絕而以色列則要求駐軍，埃及政權可以把這個分歧升級。還有一些可能誇張的觀點，讓開羅和其他阿拉伯政權假裝對抗以色列，但以負責任的方式，因為他們既知道以色列的軍事實力，又關心人民的利益，因此他們不能像哈馬斯那些瘋狂的傢夥那樣行事，等等。這是他們特有的虛偽說法。

丹尼爾·弗林：真主黨在黎巴嫩組織了一些非常重大的集會聲援哈馬斯和加沙的巴勒斯坦

人。他們的支持可能仍然只是政治上的，還是會有任何進一步行動下文，如一些人用聳聽的危言猜測的，真主黨可能在以色列北部邊界開闢第二條戰線？

吉伯特·阿恰：我不認為有任何這樣的進一步行動。昨天從黎巴嫩落到以色列北部的3枚火箭，似乎是同大馬士革有聯繫的一個小型巴勒斯坦團體發射的。真主黨立即否認有任何的責任，而且有真主黨代表的黎巴嫩聯合政府一致地譴責了這些火箭的發射。這一階段的現實是，你的政治團結有了巨大的彰顯，但真主黨也從2006年得到教訓。如果你還記得在2006年的33天戰爭後，真主黨總書記哈桑·納斯魯拉在接受採訪時說，如果他知道，對於7月12日綁架其兩名士兵，以色列將作出的反應方式，那麼真主黨就不會這麼做。他的意思是：‘如果我知道，他們會摧毀我的國家和殺害1500名我的人民，我就不會給他們一個藉口’。這是他的意思，人類感情的表達。

與此同時，我們知道，對以色列來說，綁架只不過是一個藉口：即使沒有任何士兵被綁架，以色列也會找到或製造某種藉口，以便做那個時候他們要做的事。真主黨接受聯合國安理會第1701號決議，這意味著在黎巴嫩南部不僅部署黎巴嫩軍隊，也部署國際部隊，即聯合國維和部隊，雖然這不完全符合真主黨的利益，因為這些部隊由大量的北約部隊組成，因此對真主黨本身是一潛在的威脅。然而他們不得不接受它們，要不然的話，就會進行一場可怕的戰爭，其程度是沒有人類限制的。因此，如果沒有獲得來自大馬士革和德黑蘭的綠燈，真主黨不能採取一個似乎完全不負責任的建議，去開闢第二條戰線。

另一方面，當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本身，包括哈馬斯，不開闢一條戰線時，怎麼能指望黎巴嫩開闢第二條戰線：哈馬斯並沒有從約旦河西岸發射火箭彈。這也顯示，哈馬斯決定，

僅在加沙地帶完全掌權是多麼嚴重的錯誤，那把巴勒斯坦分離成兩個領土。不是他們不應該搶先制止達赫蘭依靠美國和以色列的支援極力組織反對他們的政變，但他們不應該消滅法塔赫在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所有存在。而鬥爭的戰略需要是建立在泛地區層面上的，但巴勒斯坦現實本身卻已經分裂成兩個部分。這是一個遺憾。

這些事件也引起對武器作戰略選擇的整個問題的討論。毫無疑問，哈馬斯在英勇地反抗，但我們不能把黎巴嫩的條件與巴勒斯坦的條件相比較。當年以色列佔領黎巴嫩時，真主黨進行的是一場反對佔領的消耗戰，主要集中在黎巴嫩地區反對佔領軍。1996年4月，通過美國的調解，它甚至可以同佔領者達成協議，規定：‘在黎巴嫩，武裝團體將不用卡秋莎火箭炮或任何種類的武器攻擊以色列境內。以色列和那些與它合作的人不用任何類型的武器對黎巴嫩平民和民用目標開火。除此之外，雙方承諾，確保不將平民作為攻擊的目標，平民居住區和工業和電力裝置不會被用來作為發動攻擊的場所’。黎巴嫩地形的地理性質，和以色列軍隊在黎巴嫩居民區的存在，使得人民抵抗的戰略成為可能，取得了勝利，使以色列最終在2000年崩潰般地撤離黎巴嫩南部。

但在加沙，以色列軍隊撤出加沙地帶的內部，並包圍它。通過發射火箭到以色列南部居民區，同它們做軍事對抗，沒有多大的戰略意義。問題是，從被佔領的巴勒斯坦領土的角度來看，如果你把1967年以來巴勒斯坦人民反對以色列政府的鬥爭做個總結，就非常清楚地看到，巴勒斯坦人民鬥爭的最有效率的時期出現在1988年，有所謂的石頭革命，第一次起義，沒有槍支，自殺炸彈和火箭，沒有任何這類東西，只有群眾的動員。這對以色列是最可怕的：它使以色列人處在可怕的政治困境中。

有一個經驗教訓要在這裏談一下。這些關於戰略理解的問題，並非該地區的所有勢力都足以考慮進來。今天，在巴勒斯坦人民的鬥爭中，有很多宗教激勵的極大化主義，就像昨天有民族主義激勵的極大化主義，但在戰略設計中，卻對條件幾乎沒有任何現實的評估。當然，不是在‘現實主義’名字下的投降戰略，像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PLO 那樣 - 我的意思是，巴勒斯坦權力機構，阿拉法特和現在的阿巴斯 - 而是一個抵抗和解放的戰略，人民抵抗的戰略，在現行條件下，針對以色列的某種有效可行的戰略目標。在主要的客觀條件下，仍然有可能是，要以以色列撤出 1967 年佔據的領土，並有可能在這些領土上民主地組織自己的政府，至少享有政治主權 - 當你看到以色列及其西方支持者對選舉獲勝的哈馬斯如何反應時，就知道目前的情況並非如此。



除了這個短期目標，唯一合理的長遠戰略，必須涉及以色列社會本身的分裂。戰略不能設計成完全不考慮以色列社會，就像巴解組織和哈馬斯兩者的戰略那樣。從外部軍事上打敗以色列沒有可能：在常規意義上的沒有可能，因為它的武器遠強於所有周邊的阿拉伯國家，更不要提，這周圍沒有一方願意對抗以色列 - 不只是埃及和約旦不願意，敘利亞也不願意。解放整個歷史上的巴勒斯坦的‘人民戰爭’沒有意義，因為在 1967 年以前的領土上以色列人是絕大多數。這不同於一個佔領軍，不同於美國在越南或阿富汗或者伊拉克，也不同於以色列在

黎巴嫩。除此之外，每個人都知道，自上世紀 60 年代末以來，以色列就是一個核國家。因此，在從外部摧毀以色列的任何想法都是全然不理智的。

因此，除了必需的國際主義，即那種對猶太復國主義國家的可期待的勝利，並沒有打敗它的明智戰略，無論如何，沒有考慮以色列社會本身的內部重大分裂的必要性，讓以色列社會的一個主要部分積極反對以色列政府的好戰政策，在正義，自決和結束各種歧視的基礎上爭取持久和平的解決方案。這是一個重大的，非常重要的先決條件。這就是為什麼 1988 年的起義非常重要：因為它在以色列社會內部製造了一個真正深刻的危機。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以色列人，極其凝聚和高度一致，處在其歷史上最兇猛，嚴重和野蠻的侵略狀態中，這是一種病態。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獲得像 2006 年那樣的失敗，它們會有什麼用？沒有把以色列人口的主要部分同其政府的政策分離開來，孤立猶太復國主義，把他們轉變成反戰者，像德國人口的主要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或美國人在越南戰爭中表現的那樣，你看到的卻是，以色列人更進一步轉向右翼。這就是為什麼該地區整個畫面非常令人沮喪，正如我所說，因為如果這個進攻失敗 --- 這正是我們希望的，我們可以預知，這意味著內塔尼亞胡上臺，他會比現在的那些人更糟糕。這一切會在什麼地方結束，是很難看到的。

丹尼爾·弗林：它對於巴勒斯坦人，似乎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時候了，其危險的程度，有如 1967 年它所面臨者。在以色列媒體圈，在工商業界，有關於移交加沙地帶給埃及當局，移交西岸居民區到約旦的話題。如果這一類計畫付諸實踐，對多年的巴勒斯坦建國願望，肯定會是致命的。您認為巴勒斯坦社會內部的勢力可採取什麼樣的步驟，以改善民族運動的前景？

吉伯特·阿恰：我真的看不到你所描述的情況。首先，如果約旦恢復對約旦河西岸地區的控制，今日的約旦王室本身會是相當害怕的。當這個前景落實時，它已考慮到好戰的巴勒斯坦人的增加，這就是為什麼以前的約旦國王侯賽因制定的計畫，具有聯邦性質，也就是說，計畫給西岸，或在西岸和加沙，某種程度的自治。但現在的問題是，約旦王室不能依靠阿巴斯這樣的人制服巴勒斯坦民眾。他們知道，他們正面臨一個非常激進的民眾，而且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和約旦的巴勒斯坦人之間的新結合和新融合，對約旦君主制將是非常危險的，巴勒斯坦人已經構成了約旦人口的大多數。這是個問題。

重新合併西岸與約旦，肯定合乎巴勒斯坦人的利益，因為所謂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的獨立國家沒有意義。對於這點，我完全同意那些批評兩個國家解決辦法的人：在約旦河西岸，如果一個國家處在以色列和約旦之間，將像被虎鉗和錘子夾持著，這樣一個所謂的獨立國家沒有意義。因此，巴勒斯坦人民需要必需的喘息空間和由約旦提供的出路，更不用提約旦河兩岸間人種和家族的連貫性。兩岸間的人類社會，有一個自然的歷史一致性，為了讓這個社會能夠實行自決，你需要在約旦有一個不同的政府，一個真正民主的政府，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在那裏，人口的大多數被一個挑起部落性質的民族分裂的政權壓迫著。

這就是為什麼我不認為兩岸重新合併的前景，是約旦政府所樂意的，甚或積極考慮的。1988年侯賽因國王正式斷絕他的王國和西岸之間的聯繫：他為什麼這樣做？很簡單，因為在1988年有起義全面展開，他知道，自從1948年他的父親與猶太復國主義者做的交易以來，君主統治的約旦河西岸是什麼樣的 - 直到1967年，他的君主政權或多或少地能夠沒有大麻煩地統治的約旦河西岸，然後受到以色列的佔領 - 鑒於起義，約旦河西岸已變得不可收

拾。它成爲一個燙手的山芋：太危險了，無法應付處理，這就是為什麼他斷絕了正式的聯繫，放棄對西岸的任何主權要求。

丹尼爾·弗林：你認為在可預見的將來，巴勒斯坦政治舞臺，可能會繼續是由哈馬斯和法塔赫佔領，或者，你是否認為有一些目前的邊緣力量有機會壯大到相當的程度？

吉伯特·阿恰：嗯，目前我真看不到任何這種前景。我的意思是，目前，對於哈馬斯和法塔赫這兩個主要角色，沒有真正的挑戰者。其他現有的力量，特別是巴勒斯坦左派，多年來，錯失了許多機會後，因而失去了信譽。因此，人們不能指望有突然的神跡出現，除非出現一些我們還沒有聽到的新力量，它也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成熟。在目前條件下，可能的是，巴勒斯坦社會中的兩極力量作進一步演變 - 在法塔赫出現不同派別之間的鬥爭，哈馬斯也是一樣。上述的兩極力量，因為他們是大的勢力，有群眾性的成分和會員，並不是鐵板一塊。來自他們內部的變化，目前比任何外部新力量的意外崛起更有可能。

現在所說的是，我十分強烈的希望第三勢力興起，希望它是左翼傳統基礎上的一個進步運動，該傳統存在於巴勒斯坦人中間，即使是在加沙地帶，它也不容忽視，儘管它還沒有強大到足以抗衡法塔赫或哈馬斯。我非常希望，某一巴勒斯坦左翼力量可以成爲舞臺的一個真正的主要參與者。不過，坦率地說，目前，除了期望和願望，它並非一個現實的前景，我們尚未看到其任何的可能。

【吉伯特·阿恰成長於黎巴嫩，在倫敦東方和非洲學院教授政治學。他的暢銷書《野蠻狀態的衝突》2006年擴大的第二版，同他與喬姆斯基就中東問題對話的一本書，《危險的權力》一道出版問世。他也是《33天的戰爭：以色列對黎巴嫩真主黨的戰爭及其後果》的作者之一。】

示威者挑戰盜水者

第 5 次世界水論壇譴責親私有化計劃

人民水論壇

墨西哥城 2006 會議，是全球水資源公平正義運動持續運作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這次會議之後的現在，我們在伊斯坦布爾再次聚集，動員反對第 5 次世界水論壇。我們集聚在這裏，目的是揭穿這一錯誤的，由公司利益驅動的世界水論壇真相，表達全球水資源正義運動的積極議題！

鑒於我們在土耳其，我們不能忽視這個國家提供了一個破壞性水資源管理政策導致的毀滅性影響的有力例子。土耳其政府推動供水服務系統和集水區兩者的私有化，並計劃於該國的每條河上建水壩。土耳其的四例破壞性的和危險的水壩包括伊利蘇，雨蘇菲立，門組爾和約唐利水壩。

十年來，受影響的人們強烈反對這些項目，特別是伊利蘇大壩，這是一個名為東南安納托利亞（GAP）的更大的灌溉和能源生產項目的一部分。伊利蘇大壩 這個“全球最被詬病批評的一個大壩項目”尤其複雜和麻煩，因為它影響中東的國際政策。大壩位於庫爾德人定居的地區，那裏正在發生同未解決的庫爾德人問題有關的侵犯人權行為。土耳其政府正在利用東南安納托利亞（GAP）項目負面地影響庫爾德人的民生，並抑制他們的文化政治權利。

我們，作為一個運動，在此提出解決水危機的辦法，並要求聯合國大會組織下一次的全球水論壇。聯合國的重要官員和代表參與我們的會議，這就證明事情已經發生了變化。在合法性方面，出現了從象徵性到具體行為的轉變，即：從世界水理事會按照私人利益舉辦的官方論壇，轉向人民水資源論壇，舉辦該論壇的是全球的民間社團，包括農民，土著民族，活動家，社會運動，工會，非政府組織和鬥爭在世界各地的護水源保領土為平民的網路。

我們呼籲聯合國及其會員接受義務，作為合法的全球性多邊論壇召集人，並正式承諾舉

辦一個同國家義務有關聯的，對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水論壇。

對於這第 5 次世界水論壇，我們呼籲所有組織和各國政府，致力於讓它成為最後一屆由公司利益控制的水論壇。世界需要推出一個合法的，負責任的，透明的，民主的水論壇，讓它出現在聯合國的議程內並得到其成員國支持。

再次強調該世界水論壇是非法的，我們譴責其部長級聲明，因為它不承認水權是一種普遍人權，不把水排除在全球貿易協定之外。此外，該決議草案忽略了私有化在保證人人獲得水資源方面的失敗，也沒有考慮到不足的歐洲議會決議中提出的那些積極的建議。最後，聲明提倡使用水壩的水來生產能源，增加生物燃料的生產，這兩者會導致進一步的不平等和不公正。

我們重申和強調 2006 年墨西哥城宣言的所有原則和承諾：我們堅持認為，水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基本要素，是一個基本的和不可剝奪的人權；我們堅持認為，當代人和後代人之間的團結應獲得保障；我們反對一切形式的水私有化，水的管理和控制必須是公眾的、社會的、合作的、公平參與的，而且是非牟利的；我們呼籲對生態系統作民主和可持續的管理，通過對水流域和環境的保護和妥善管理，維護水迴圈的完整性。

我們反對規定了公共供水和衛生服務系統的私有化，商業化和企業化的主流經濟金融模式。看到了硬性成本回收的做法和預付費機制的使用，給窮人帶來的後果，我們將反對這種類型的破壞性和非參與性的公共部門改革。

自 2006 年以來，在墨西哥，全球水正義運動持續挑戰企業對水的牟利性控制。我們的一些成就包括：收回已經私有化的公用設施；樹立和落實公眾-公私合作夥伴關係；迫使瓶裝水行

業的收入虧損;並在藍色 10 月和全球行動周聚集一起同時集體活動。有關水的人權在幾個憲法和法律中得以承認，突出了我們的成就，我們為此歡呼。

同時，我們需要就經濟和生態危機發表看法。我們將不會為你們的危機買單！我們不會拯救這一有缺陷的和不可持續的模式，這個模式已經變形了：不負責任的私人支出成了巨大的公共債務，把水和公共資源變成了商品，進而把整個自然變成了原材料庫和一個開放的露天垃圾場。

水和氣候變化之間的基本相互依存關係是科學界公認的，也是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強調的。因此，我們絕不能接受能源部門對氣候混亂的反應，遵循同樣的邏輯，它是造成危機的首要原因。這個邏輯危害以大壩，核電廠，和農用燃料種植為基礎的水和生命之數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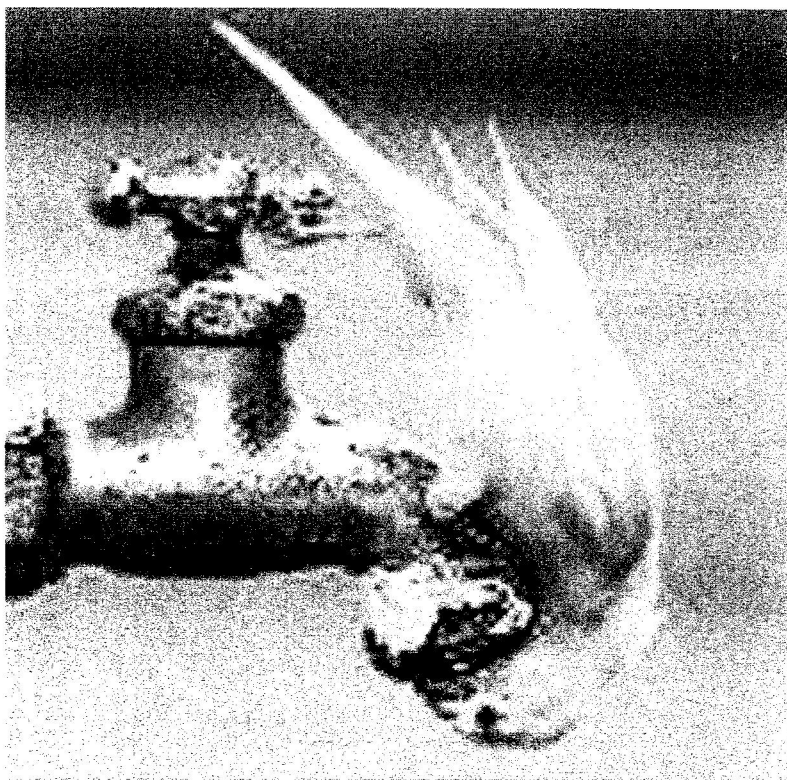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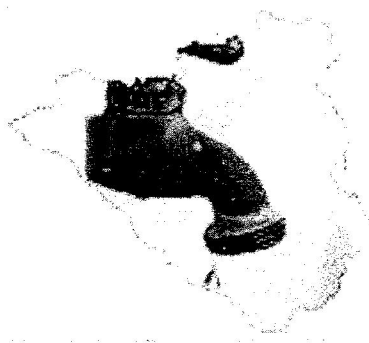
和品質。2009 年 12 月，我們將把我們的關切和建議帶到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

此外，高度工業化之農業的主流模式，污染且破壞水資源，使農業土壤變貧瘠，並破壞糧食主權。這對生命和公眾健康有巨大的影響。根據貝倫世界社會論壇成果卓著的經驗，我們將致力於加強水運動同土地，糧食和氣候那些運動之間的戰略同盟關係。

我們還承諾繼續建立網路和新的社會聯盟，團結決心捍衛水作為公共利益的各地政府和議員，為所有人與自然爭取乾淨的水權。我們也鼓勵所有公共供水設施，聯合起來，建立全國協作和區域網路。

我們慶祝我們的成就，我們期待著跨國家和跨大陸的繼續合作！

伊斯坦布爾， 2009 年 3 月 19 日



《共產黨宣言》出版 160 年之後 ——評〈冥王出版社〉2008 版《共產黨宣言》

米歇爾·洛維

2008年，在《共產黨宣言》面世160年至今，還剩下什麼呢？正如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這版本出色的前言所說，現今的金融危機驚人地吻合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的預測：“過剩”的社會在“過度生產和投機之下崩潰，回到一時的野蠻狀態。”

當然，《共產黨宣言》中有些論點早在兩位作者生前已不合時宜，而他們在許多再版的前言中也都指出了。其他論據則在我們的世紀中過時，需要重新批判地檢視，例如歐洲中心主義、無產階級“必然”勝利駁論說和缺乏生態批判意識等等。但整體而言，《共產黨宣言》論調、核心思想、精神——像文本的“靈魂”——仍然鏗鏘有力，擲地有聲。

這精神來自於同時具備的批判及解放能力，兩者密不可分，即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及推翻資本主義的呼籲；研究階級鬥爭及介入被剝削的階級的鬥爭；清晰地審視資產階級社會的矛盾及追求以團結與平等為基礎的革命的烏托邦社會；從實務的立場解釋資本主義的擴張機制及提出要“推翻所有使人遭受貶抑、奴役、遺棄與鄙視的社會關係”。

在很多方面，《共產黨宣言》不單是貼近現實，而是比160年前更加貼近當今的形勢。舉例，它診斷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現象。對於兩位年輕作者來說，資本主義是催生世界經濟及文化統一的過程。“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使反動派大為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

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

這不只是擴張，更是操控：資產階級“迫使所有民族——如果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言以蔽之，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事實上，在1848年，《共產黨宣言》是對將來社會趨勢的預測，多於對當時現實的描述。在今天全球化時代中，它的分析比160年前編寫的年代，更加貼近當今局勢。

事實上，資本從未像在21世紀那樣完全地、絕對地、整體地、普遍地、無限地控制全世界。過去資本未能成功，可是今天，它卻強加其法規、政策、教條及利益於全球各國。國際金融資本及跨國公司從來沒有像現在那樣輕易地逃離國家及人民的控制及人民的視野。前所未有的緊密的國際機構網絡——像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致力控制、管治及操縱人類生命，履行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及利益的嚴格規律。最終，史無前例地，人類生活的所有範疇——社會關係、文化、藝術、政治、性、健康、教育、運動及娛樂等已完全地受資本所支配，並且無遠弗屆地“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

再者，《共產黨宣言》遠遠不只是對資本主義操縱全球的權力的診斷——有時是預言，有時囿於時代的局限：它更是要求國際共同反對這種操控的緊急呼籲。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理解，資本作為世界系統，唯有其受害者即無產階級及同盟之世界歷史行動性能將其消滅。

《共產黨宣言》的最後一句，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它表達了好幾代的社會主義者及無產階級鬥士的想像及心聲：“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

來！”並非出於偶然，這片語在過去150年以來已變成最激進的運動的旗幟與口號。這是吶喊與召喚，也是合乎倫理和策略的呼籲，作為戰鬥、混亂的衝突和意識形態迷霧中的指南針。

這呼召亦具遠見。在1848年，無產階級在大部份歐洲國家中只屬社會的少數，更別提其他國家。今天，大部份的勞動者都遭受資本的剝削：工人、僱員、服務從業員、臨時勞工及農業工人等，他們佔了全世界的主要人口。他們至今是反抗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主要力量，也是其他鬥爭和社會行動者所能夠又必需依仗的軸心。

事實上，利益與此攸關的不只是無產階級，而是所有資本主義的受害者，所有受社會壓迫的群體——女性（在《共產黨宣言》中所忽略的）、受支配的國家與族群、失業和被排斥的人（“無產階級”）——所有期待社會變革的群體。還有生態問題，這牽涉到不獨是某特定族群，而是全人類。

在柏林圍牆倒下後，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甚至歷史之終結似乎已成定局。近年在法國、義大利、南韓、巴西或美國——實際上，世界各地的社會運動——卻尖銳地反駁這種假黑格爾的鑽研

思考的命題。底層人民最欠缺的，從另一方面來說，卻是國際間最基本的協調合作。

【米歇爾·洛維，巴西哲學及社會學家，現任法國新反資本主義黨成員及第四國際成員。阿姆斯特丹“研究及教育國際學院”（IIRE）研究員及前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主任。著作甚豐，包括《切·古華拉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與解放神學》、《祖國父地還是地球母親？》及《眾神之戰：拉丁美洲的宗教與政治》等。另外，他也是《國際生態社會主義宣言》的作者之一（與喬爾·柯維爾（Joel Kovel）合著）。同時，他也是2007年在巴黎舉行的第一屆國際生態社會主義會議的主辦者之一。】

註釋：

1. 卡爾·亨利希·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248-307頁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3/critique-hpr/intro.htm>

讀《大清海軍與李鴻章》一書有感

方明理

最近，偶爾得見二十年前出版的《海葬》一書的修訂版《大清海軍與李鴻章》。此書詳盡剖析清朝末年甲午海戰期間中日雙方朝野的思潮、處境，道盡雙方當時對改革、引進外國技術、國際關係的情況和中日兩國維護本國利益的策略，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好書。

中國在1888至1988年的100年間，經歷了外國

侵略、朝代改變、內戰的深重苦難，始終未有一個脫離苦難的方向是原因之一。本書以100年前的清廷腐敗無能、軍隊中的腐敗與100年後的中國軍隊中的腐敗相比較（當然不能用政府作比較，不然此書絕無出版的可能），說明中國現今對改革開放的當務之急，與時俱進之切。

李鴻章在這100年之中以“賣國賊”著名。本

書以李鴻章的敏銳目光，切中時弊，但因其漢人身份和忠君思想限制，變得心餘而力不足，雖盡全力，但無法抵禦日本的野蠻侵略。從書中節錄的李鴻章的奏章中可以看到一個極之愛國的李鴻章，可以說這是一本為李鴻章洗去“賣國賊”罪名的書，最后為國家利益而担上“賣國賊”的罪名。也以此讓中國人民看清歷史人物，不要人云亦云。

可喜的是，國人現已有人正視歷史，分析歷史，可嘆的是李鴻章“賣國賊”的罪名要背負100年才有人加以洗脫。

誠然，歷史可作平心靜氣地評說，但當朝的歷史，還是有極多的“禁區”。1949年建國以來，或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只要是對共產黨不利的問題，一律都不准提及，也就是所謂“禁區”，或叫黨的“機密”，那管你是否對國家有利。若有觸及就是“顛覆國家罪”，死路一條。不開黨禁，能有多少客觀評論呢？

難以想到，李鴻章在百年之后，人們還能還他一個清白，稱之為愛國者。

在百年近代史之中，有多少中國人，因為各種原因離鄉別井，流落世界各地，人數難以統計。固然其中有因國內貧窮、戰亂而出外謀生的民眾，其中有一部份是清末民初懷著“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的理想，希望中國能做到國富民強，到外國學先進技術報効祖國；至學成之后、準備歸國之時，遇到國共內戰，不能在國內作科學研究和建設工作而留落外國，所學所作的成果亦留落異鄉，何以報効祖國呢？

共產黨立國後，歷次的政治運動，亦製造了一大批流落世界各地的華人，其中不乏“鎮壓反革命”、“土改運動”、“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他們並非不愛國，只是對共產黨的作為“畏而遠之”。這表現在70年代后：

歷次運動偷渡到香港的人們可以回鄉探親祭祖，帶回大量物資，當年廣東省的電視機，十有八九是這批人帶回國內的禮物。

允許台灣民眾歸國探親祭祖時，大量的內戰時期的老兵紛紛回鄉尋親訪友，告慰先祖。

89年民主呼聲高漲，一貫政治冷感的香港市民對“六四”事件的關注，並自願自發地作出開埠以來最盛大的遊行支持中國的民主發展，比美以往的“五卅運動”遊行。

近年的四川大地震，引起海外的華人關注，作了大量的工作和捐款，真正是一方有難百方支援。

共產黨立國60週年，當然是要慶祝，若以人的年齡來說，已是進入老年時期，但對一個國家說來，還是極之年輕。慶祝之時對70年代以前犯的過錯輕輕帶過或隻字不提，70年代后的成績就大大宣揚，是否有“文過飾非”的嫌疑呢？

誠然，現代中國領導人亦已有可喜的進步，對某些事情亦已實事求是，如已懂得提及“數典忘祖”的問題，對台灣已不再說文革時代的“國民黨反動政府”之類言詞，對國民黨當年抗日戰爭的浴血戰史亦已公開表述，對某些說過的錯話也已開始公開認錯。這是不可否認的。

若然當今的領導人能為共產黨歷次的重大錯誤的受害人公開平反，承認錯誤（當然，責任應由歷代的領導人承擔），將會挽回共產黨在中國人民心中的信任，也能喚起大批流落海外的華人的愛國心，則國家幸甚。

中國人有多少人可正確答覆如下問題：

歷次政治運動是對共產黨有利還是對國家有利？不正常死亡人數如何？中國經多次政治運動已成最多人旅居外國的國家，其中多少人是具有才能應能為國家作貢獻的呢？

總之，從此書所述的可能聯想得更多。在此將書介紹給各位，有時間不妨一讀。

《大清海軍與李鴻章》中華書局出版

作者：錢鋼

出版社：中華(香港)書局

出版日期：2004年7月

《感時憂國——謝山——胡洛卿《詩人謝山和他的托派朋友們》小識》（轉載）

香港藝術發展局審批員 彭智文

謝山，何許人也？未讀本書，當然不知其詳。細讀本書，可知謝山是一位正直不阿的愛國詩人。《詩人謝山和他的托派朋友們》（下稱《詩》）是其遺孀胡洛卿涕淚之作，後記云：「謝山去世後，悲痛欲絕，恨不得與他同行。」鶼鶼情深，不言可喻。筆者以為可以從兩個角度研讀本書：一從傳記的角度出發，《詩》勾勒出謝山多舛的一生，這是作者胡洛卿眼中的謝山。二從文學的角度出發，《詩》穿插謝山平生詩詞，各體皆備，這可說是謝山以詩自述，細訴其感懷襟抱。由是觀之，本書可謂以胡洛卿筆下的謝山為主線，謝山詩詞的自白為副線，互相參照，讀者自可拼湊出立體的謝山。

一、胡洛卿筆下的謝山

本書以「傳」為本，輯作十一章，分別是「一、書香門第、二、走向社會、三、被港英當局逮捕、四、1952年冬至被捕、五、勞改釋放犯、六、大監獄、七、永結同心、八、歷史的轉折、九、改革開放、十、忘年之交、十一、最後歲月」，另附靳樹鵬「序言」和作者「後記」。作者以詳盡的史料，完整地重構謝山一生。字裡行間，可見作者對謝山的深情，以及謝山對國事的激情。

謝山出身門第，幼承庭訓，愛好詩詞古文。大學畢業，1949年任職香港新華銀行，因代友收第四國際報刊而被捕，其後任糖廠會計主任再被捕，文革受辱遭批鬥。據《詩》所記，他對政治有己見，曾被判下獄勞改，他不畏強權，熬過了。十年浩劫，胡洛卿說「謝山在廠裏受盡折磨，回到家裏孤零零的。」謝山寫下「要頂住！如果活比死難，就選難的給自己吧！」《詩》詳記謝山如何坦然面對命運的播弄與阻攔，本書第三至第六章記下了他的辛酸。一直以來，他喜書詩以寄懷，謝山晚年更是潛心研究詩詞，第十章對此所記甚詳，對於詩詞，謝山句斟字酌，與鄭超麟唱酬不少。

胡洛卿以精練的史筆，記述了謝山的遭際，第七章更記下她與謝山的交往，細節鋪寫，他倆魚雁頻傳，無懼風狂雨橫而結合，使人動容。

二、謝山詩詞的意蘊

如前所述，賞析本書，不應只當作一部傳記文學觀，本書更可視作謝山的詩詞集。且看謝山的創作觀：「我的詩詞在格律方面，可能不會出大的疵誤。正如你（鄭超麟）所說的，即使格律協調，還不能算詩詞。詩詞有其本身的寫作技巧，更主要的在於意境。」謝山幼嗜文學，對陸游作品情有獨鍾，他重格律又不囿於格律，他重視作品的「意境」。主題上，作品情繫家國，老杜之情，放翁之志，可見一斑。請看以下兩首：

「未上此樓意不伸，登樓豈必定詩人。萬家憂樂關心事，情寫笑頻。」（此詩缺題）

「風雨曾同一葉舟，縈情牽夢未能休。涉江已料波濤惡，歷劫幸存意氣遒。千里月明猶共望，此生夙願尚須酬。如潮心事難相訴，年少而今亦白頭。」（《中秋寄王老》）

以上七絕可見作者憂感國事，忘卻個人閒情。至於七律為謝山1995年作，作者回眸一生，嘆命途多變，時運不齊，哀素願未酬，心事難訴。謝山終其一生，可謂與國運連繫，屢受政治迫害，顛沛流離，是以詩鳴。觀上列七絕，登樓抒情，固有杜公部「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的心胸，憂天下為先，安己為後。

至其律作《中秋寄王老》，實不乏放翁《枕上作》「鄭虔自笑窮耽酒，李廣何妨老封侯。猶有少年風味在，吳箋著句寫清愁」的期盼。謝山雖歷遍滄桑，年華亦老，但他「夙願尚須酬」一句，意志堅定，跟放翁詩中自比李廣、鄭虔，可謂異曲同工之妙。

謝山創作，不限絕律古詩，詞作亦見特色。詞本以含蓄婉約為正宗，謝山為詞，豪放中見格調，《踏莎行》是顯例：「霜月孤圓，晨風野急，凌空萬里南飛疾。早知別易見時難，者番直憑輕離別。礪帶山河，緯經阡陌，匆匆半日成今昔。鄉關直北在何邊？神州已被煙塵隔。」作品上片以景語入，孤清環境，別離在即，然後抒情。下片遙想家國，鄉關何處，神州陰霾。按書中所述，此詞乃謝山少作，時維1946年，作者年僅廿三，斯時謝山乘飛機抵港，孤雁漂泊，詞作語淺情深，思鄉切切。

謝山詩詞以家國為主調，及至晚年，回首年華，不勝哀愁，哀愁復自以慰解，乃詞人常法。《蝶戀花》是他七十二歲作：「八九韶光流水去，誰料今朝，忽與春相遇。猶憶初啼天未曙，寒空漠漠飄輕絮。塵海沉浮無可訴，駭浪驚濤，畢竟悠然度，一笑回頭休自苦，平生意氣仍如故。」未忘國事，慨然自嘆「無可訴」，最後還是自勉「休自苦」，雖有壯志未酬之痛，但面對顛簸一生，曾陷囹圄，惡疾羈身，但仍能悠然度過，笑看平生，實是難能可貴。

三、小結

前面結合傳記和謝山詩詞兩個角度介紹本書。胡洛卿筆下的謝山，真情實感，是二人經歷的觀照，讀者細讀，當能了解一個愛國知識分子的一生，以及重看祖國逾半世紀的「泊岸驚濤」，讀罷教人掩卷長息天意人事，難以逆料。謝山一生慘淡，但精神長存。本書若能為所引詩詞附注箋釋，讓讀者更易明白作品底蘊。又本書記謝山一生，又若作者編補謝山作品編年於書後，結合其生平遭際，詳作說明，輯為附錄，相信能加深讀者對謝山的認識。

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1樓（門市部）

(轉載)

《煉獄 中國托派的苦難與奮鬥》

吳基民著

這是一部描寫中國托派歷史和托派人物的書籍。作者花了很大力量，尋訪已為數不多的托派人物，從他們的口述、著述和其他歷史文獻中，理清了中國托派的產生、起伏發展、一直到最後消亡的過程。特別是介紹托派人物後來和近期的情況，這在為數不多的同類著作中，是很有特色的地方。全書結構完整，層次清晰，史料豐富，文字簡明流暢，對於存史和進一步研究中國托派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彌足珍貴。

著名學者，上海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在序中寫道：“在我閱讀吳基民先生的這部書稿後，深深感到，如果這些材料能夠引起中共有關方面仿效前蘇聯共產黨政權在上世紀80年代為托洛

茨基冤案平反一樣，明智地解決了中國的托派問題，實際上是為自己的歷史挽回某種榮譽。”

作者吳基民，1947年出生於上海。1960至1968在上海接受了中等教育。1977年恢復高考考進了復旦大學，在中文系就讀。大學畢業，在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及上海文史研究館工作，接觸了許多民國期間的風雲人物，期間創作了《異國之戀》、《謎一樣的一段情》、《生死搏殺周恩來與上海滅門血案》、《明珠耀東方》、《羊行天下》等多部著作。

[本刊編者按：《煉獄》一書在香港各大書店都可買到。]

《煉獄 中國托派的苦難與奮鬥》

序

陳思和

(上海復旦大學教授)

關於這部書的意義，在作者的《跋》裏全文引錄的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專家，著名的托洛茨基傳記《先知三部曲》的通讀審定者鄭異凡先生的審讀意見裏已經講得十分清楚了，無須我在這裏贅言。我不是這一領域的專家，只能以作者吳基民先生的朋友身份，發表自己閱讀後的感受。吳基民先生曾經在上海文史館工作，他有機會得以親聆許多歷盡苦難然而劫後殘存、信念不改的老托派分子的講述，這批人所遭受的磨難，尤其是在1952年12月22日全國“大肅托”以後的遭遇，幾乎是一個無人所知的秘密。這些被塵封了半個

多世紀的歷史重見天日，不是要引起今天對那段歷史一無所知的人們發出廉價的感嘆，甚至也不是要對這些受難者給出一個遲遲未來的公道。

從實際意義上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現代史上風雲際會的托派精英們都已經先後作古，殘留在中國大陸苟延殘喘的托派分子已經是極少數了，作為一個冤案的平反已經失去了普遍的意義。那麼，我們究竟能夠從這部書裏讀出些是什麼？

中國的托派是一個有堅定信念、理想和奮鬥目標的黨派組織，他們也同樣為了在中國實踐社

會主義革命流盡了最後一滴血，犧牲了大量的愛國志士的寶貴生命。他們與第三共產國際的矛盾並且波及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實踐中的內部矛盾與衝突。在今天，第三共產國際在中國問題上的錯誤路線使中國革命帶來慘重的損失，早已經成為黨史研究領域的常識；斯大林在蘇維埃建立政權以後犯下的罪行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遭到了蘇聯共產黨的清算，可是我們黨史研究者對於這些錯誤導致的中國黨內的分裂以及托派的形成，却始終沒有作出應有的反省。更令人扼腕的是（我們從這部書中所描寫的故事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革命運動中的分裂與衝突，後來給托派個人命運所帶來的打擊遠遠超過了他們真正的敵人、他們所要推翻的資產階級政權對他們的迫害。

近幾年，中國悄悄出版了一批有關托洛茨基事件的著述。如布拉諾夫的《被篡改的列寧遺囑》一書，用細密的材料分析的手法揭示了斯大林篡改列寧遺囑，打擊托洛茨基的陰謀活動；更不用說像伊薩克·多伊徹的《先知三部曲》所揭示的驚心動魄的政治陷害和恐怖謀殺。不幸的是，這種建立在陰謀陷害之上的打擊政治對手的手段，在中國共產黨內打擊托派的鬥爭中也學會了。最經典的例子是王明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公然說的話：“反對托派不能有仁慈觀念，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說成是日本間諜。”（1）

既然明知不是偏要說是，這就是政治誣陷，陳獨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曾任第一屆到第五屆的黨總書記，對自己黨的領袖（即便是犯過不能由他自己負責的錯誤而下台）尚且如此絕情，整個托派冤案的迫害也就一斑窺全豹了。

但是這種誣陷的故事還沒有完，現在一般關於陳獨秀的研究著作裏都把誣陷陳獨秀為漢奸的陰謀歸咎於王明、康生一伙推行斯大林極左路線。據說原來延安的中共政權與陳獨秀在出獄後還是可能建立某種合作的關係，正如本書寫到

的，1937年11月20日出版的延安《解放》周刊上有一篇《陳獨秀先生向何處去》的文章委婉地提出，只要陳獨秀認識錯誤，還是能够“重振起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列裏。”但緊接着是王明康生等人從蘇聯回到延安，就在上面說到的那個會議上，王明聲嘶力竭地叫嚷：“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的反托派，而我們却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後果是不堪設想的”（2）王明說的話，可能是針對了《解放》周刊發表的那篇文章，所以康生就在1938年1月28日和2月8日的《解放》周刊上發表長文，卑鄙誣陷陳獨秀是日本間諜，冤案從此做成。但王明說斯大林的威脅倒是實情，即使陳獨秀與中共黨在抗日戰綫上達成了某一種合作，也是一定會被斯大林的魔爪所破壞，可能還會殃及更多的中共黨領導人，釀成禍害更大。而《解放》周刊上的《陳獨秀先生向何處去》的意思，與中共領導原先要求陳獨秀公開承認錯誤等三項條件是吻合的。雖然也是明知陳獨秀不會接受，多少是暗示了中共領導人對這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有顧忌之心。但是，事情的背景似乎出乎意外的複雜，在王觀泉先生的一本至今還沒有在中國大陸正式出版的陳獨秀傳記《被綁的普羅米修斯：陳獨秀傳》裏，披露了一個更加令人迷惑的信息。其實早在1936年10月5日巴黎出版的中共機關報《救國時報》59期開始，就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誣蔑“托陳派甘作日寇奸細”。而這些報道的主要依據，竟是1936年馮雪峰從瓦窑堡來上海，8月裏用魯迅的名義所寫的一篇《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裏的幾句質疑托派的話。這樣把魯迅拖進了反托派的圍剿裏去。王觀泉先生悲憤地寫下了這麼一段話：“1936年8月，‘雙十二’事件未發生，國共合作抗日還只是輿論，或者說，還在張學良和楊虎城的密議之中，更無從測度盧溝橋事變；更距康生撰文誣陷陳獨秀是漢奸足足一年半，陳獨秀還在國民黨監獄中替共產主義坐牢尚欠整整一年，馮雪峰就帶了要把陳獨秀定為漢奸的使命從陝北趕到了上海，借用魯迅之命封住了陳獨秀的

嘴。”(3)王觀泉先生凜然的悲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馮雪峰誣陷托陳派為漢奸的言論是一時的任意發揮還是特殊的使命，還需要進一步的尋找資料，但至少，王先生的發現，是早在1936年陳獨秀還在國民黨監獄裏服刑時，他的對手已經在陰謀把他推向漢奸的萬劫不復之中了，至於王明康生之流後來的卑鄙行徑不過是推波助瀾而已。

大革命期間，明明是共產國際一再壓制陳獨秀的正確的獨立自主的主張，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導致了1927年國共分裂時手無寸鐵的共產黨組織遭到慘敗，陳獨秀自己的兒子也犧牲在這場慘案中。陳獨秀在1926年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的事件後，再三向蘇聯顧問和蘇聯政府請示，保留五千支槍武裝自己，都被共產國際的老子黨斷然拒絕。但是當1927年的慘敗後，陳獨秀却成了共產國際的替罪羊而被拋棄。在這種政治局勢和個人遭際發生大變動大逆轉的狀況下，陳獨秀和他的戰友們從斯大林與托洛茨基關於中國問題的不同思想理論中選擇了後者，沿着他們自己所理解的革命的道路進行探索和實踐。歷史不能重新來過，斯大林主義被清算也不等於托洛茨基主義就一定代表着正確路線，一定會引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走向成功。但是作為一種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尤其是直接指揮了蘇聯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的偉大人格，及其大量忠誠於革命的追隨者的悲慘命運，他們的悲劇永遠是值得後人理解和深思的；同樣的理由，我們對於中國的真正忠於自己理想和信念的托派們，對於他們所遭受的本來不應該遭受的誣陷與磨難，是否也應該持一種同情的理解，或者認真的反思呢？

因此，在我讀吳基民先生的這部書稿後，深深感到，如果這些材料能够引起中共有關方面仿效前蘇聯共產黨政權在上世紀80年代為托洛茨基

冤案平反一樣，明智地解決中國的托派問題，實際上是為自己的歷史挽回某種榮譽。書中介紹中共老資格的幹部、堅定不移的托派分子鄭超麟先生在八九十歲的暮年，按照組織原則，一次次地在中共全國代表大會期間上書大會要求為中國托派組織平反。他戚然地說：“我這個請求，不僅是為我們受冤者着想，而且是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着想。——國有冤獄，尚未平反，是當國者的耻辱。”斯言者誠，直逼每一個正直的中國人的良知，是不容回避的。一個獨立自主、有生命力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應該正視自己的歷史，糾正歷史條件下的偏見與錯誤，以寬容之心對待曾經反對過自己的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只有這樣，這個政黨才有可能在當今世界的複雜形勢下擔當起實踐馬克思主義偉大理想的中流砥柱。用事實來證明——正如托派分子樓國華在王凡西的《雙山回憶錄》序裏所說的一——“要讓廣大勞動群眾知道，斯大林主義的崩潰絕對不等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破產。”(4)

2008年3月16日

註釋：

(1)(2)：張國焘《我的回憶》第三冊，422頁：轉引自魏如信《陳獨秀思想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18頁。

(3)：王觀泉《被綁的普羅米修斯：陳獨秀傳》，自費印刷本，320頁。此書由台灣業強出版社的刪節本，因刪節太多，筆者還是願意引用王觀泉先生的自費印刷的完全本。

(4)：王凡西《雙山回憶錄》，樓國華序，7頁。東方出版社，2004年。

(轉載) 《煉獄 中國托派的苦難與奮鬥》

跋

吳基民

從我立志要為中國托派寫一本真實的書，過去已經十多年了。這其中採訪的困苦，寫作的艱辛就不用再提了，單單是出版一事的重重困難與一波三折，就令我心力憔悴。

我真誠的希望自己的這一部作品能够在祖國的大陸出版。因而對選用的素材有所保留，尤其是沒有渲染這些托派在獄中與勞改時所遭受的非人似的待遇、極端的摧殘與折磨。因為這本書中所提到的人物，絕大多數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生於斯，長於斯，即便是遭受了再大的屈辱與苦難，也愛着這片土地。說實話，如果中國托派的問題有望得到解決，那還得依靠中國共產黨的睿智與寬容。

書稿初成以後，我交給了我的好友，上海一家大型出版集團的負責人。他親自翻閱了全部書稿，沒幾天就對我講：稿子寫得很不錯，很感人，也很有出版的價值。但是看來這本書在上海出版有很大的困難。你也是在媒體工作的，應該知道

我明白朋友的苦衷，於是將稿子取了回來。

過了若干個月，北京群眾出版社的資深編輯嚴曉玲來電話。她主動問起我最近有什麼稿子，我說起了這本書。她一聽，大感興趣，講我們出版社就是出這類稿件的，於是吩咐我將書稿給她送過去。我仔細修改了稿子，又悄悄刪去了一點敏感的內容，將稿件交給了她。然後便是漫長的等待。

幾個月以後的一天，我接到嚴曉玲的電話，說她已經到上海了，她興沖沖地對我講書稿的出版應該是沒有問題了。我非常高興，請她在新天地喝咖啡。月明星稀，我們坐在咖啡館，品位着咖啡的濃香，神清氣爽。與這個超現代化的咖啡館一牆之隔，就是中共一大會址。陳獨秀、毛澤

東、周恩來、瞿秋白、劉仁靜

—— 八十多年前，創建了這個黨的英雄豪傑、風流人物們，有誰會曾想到，中國這塊大地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嚴曉玲對我講，他們出版社的一位總編輯是位老同志，十分熟悉這一段歷史，看了你的稿子，很有興趣，寫了一段很有激情的批示，隨後他交給新聞出版總署出版管理司，出版司也通過了。為了保險起見，他們將你的稿子和出版司的意見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審閱，也已經有一個多月了，按照一般的規定，如果稿子不能出版，黨史研究室沒幾天就退回來了。然後她讓我把所有照片資料交給她帶回北京，以備出版之用。

這是我的書稿無限度地接近在國內出版的唯有一次。雖然它最終還是沒能在國內出版，但我依然十分感謝嚴曉玲和她的那位領導，感謝他們的俠義心腸！我始終不認為自己的稿子寫得有多麼好。但它畢竟第一次將這一段塵封已久的歷史揭示出來，讓世人了解在祖國的土地上還有這麼一群人，為了實現他們理解的共產主義思想而奮鬥過，有過巨大的犧牲，活着的至今還蒙受着深重的苦難。

又過了兩個星期，希望破滅了，嚴曉玲打了一個電話給我，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意見出來了，不同意在國內出版，她萬般無奈地將“意見”傳給了我，同時給我一份黨史專家們的意見。所述意見不長，現全文附上：

對《揭開塵封的歷史》的審讀意見

這是一部描寫中國托派歷史和托派人物

的書籍。作者花了很大力量，尋訪已為數不多的托派人物，從他們的口述、著述和其他歷史文獻中，理清了中國托派產生、起伏發展，一直到最後消亡的過程。特別是介紹托派人物後來和近期的情況，這在為數不多的同類著作中，是很有特色的地方。全書結構完整，層次清晰，史料豐富，文字簡明流暢，對於存史和進一步研究中國托派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該書不宜公開出版，因為中央對於托派平反問題還沒有正式定論。正如書中提到的一樣，對於1952年12月22日“大肅托”事件的詳細情況，“至今還未解密”。而本書的基調是肯定中國托派，並為中國托派翻案的。正因為中央對於托派問題沒有正式定論，所以對書中的觀點和傾向不好把握。以《中國共產黨史》第一卷的提法為標準，該書的觀點和傾向則是與之相悖的，因此，在中央沒有定論之前，該書不宜公開出版。

後來嚴曉玲又將照片寄還給我，不知什麼原因始終不能收到。令我扼腕痛惜的是，我朋友千辛萬苦替我找來的黃鑑銅、杜畏之的照片再也找不到了。

我始終不能理解，黨史研究室的領導與專家們為什麼不能有放眼世界的胸懷和與時俱進的態度？世界已經大變，對托洛茨基的評價也已經大變，與時俱進的修改中國共產黨的黨史難道就不是他們的職責？我一直相信現在的胡溫政府是最親民、最求真務實的一屆政府。但是如果黨史專家們不能對將近60年前發生的一宗冤案提出明晰的改正的意見，至少是網開一面，讓民間人士發出一些與現在“黨史”不同的聲音與意見，政府的高層領導又怎麼能夠知道60年前在中國大地上還曾有過這麼一個大案；還有這麼一些人生活在這樣的屈辱與苦難之中！

接著又是漫長的等待。

這期間余秋雨教授還和台灣的某家出版集團老總打過招呼，無奈對方回答：目前整個台灣島

氣氛不對，大家只關心藍綠，不關心其他，對於此書的出版只好抱歉了

去年是我的本命年，我諸事都順，只有此書的出版一直令我耿耿於懷。我的兒子安慰我：現在不是網上也可以出書嗎？我出錢幫你聯繫一家公司，自費印上一、二百本，就算是我送給你的生日禮物，不僅了了你的一件心事，也算對得起你的托派朋友。說幹就幹，他已經在網上找了一家公司，並就裝幀設計及印刷出版出版費用等作了詳細的諮詢。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我百般無奈之時，我的哥哥吳為民從美國回上海探親，他是特意從美國赴新加坡參加楊振寧博士的一個慶賀活動的。我哥哥是一位出色的高能物理學家，為人熱心，也喜歡寫寫弄弄，寫了一些非物理學的著作。我知道他在新加坡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叫潘國駒，是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的負責人，他下屬的八方文化也出版文化類的圖書。我完全抱着試試看的想法將書稿交給了吳為民，他答應幫忙。在上海大家都忙，他沒有讀過我的書稿，到了深圳我妹妹家裏，他花了大半個晚上仔細的看了我的稿子，深受感動，一大早他就打電話給我，說是到新加坡一定會和潘先生好好談談，促成這本書的出版。過幾天，他從新加坡打電話給我，說是潘國駒先生非常豪爽，已經答應出版，讓他手下的一位編輯何華先生在仔細審看，何華先生非常用心。其實潘國駒先生還將我的書稿交給了中國國內著名的學者，中央編譯局研究員鄭異凡先生作了審看。

鄭異凡先生和我素昧平生，但看得出他作了認真的審閱，奸作了一個客觀公允的評價，這份評估意見不長，現全文刊登於下：

書稿《煉獄》讀後意見

長期以來蘇聯不提托派在俄國革命和蘇聯建設中的作用，斯大林最後給托派定性為“帝國主義的間諜”，斬盡殺絕。中國的托派

也遭受同樣的悲慘命運，他們既受國民黨的迫害，也遭受共產黨的鎮壓。特別是康生捏造出中國托派接受日本帝國主義的津貼，成為日本的特務的罪名，托派一直等同於反革命。實際上這是一批同樣為革命、為共產主義奮鬥的人士，他們的出現是於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錯誤指導方針引起的，在中國大革命期間，托洛茨基的主張要比斯大林的正確，因而贏得一大批中國留學生的支持，形成中國的托派。但後來的革命發展中，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方針又比托洛茨基的方針正確，更符合中國的實際。不過這都是革命方針路線的不同，並不涉及革命反革命的問題。

本書使用了不少檔案材料，參攷了大量托派資料。特別有價值的是作者走訪了一些幸存着的托派人士，從而搶救了一批極其重要的中國托派資料，彌足珍貴。這項工作除了本書作者吳基民，很少有人做過（葉永烈好像也接觸過中國-的托派）。因此從歷史的角度，本書很有出版價值。《毛澤東選集》中的有關托派的注文已經改寫，不再提日本間諜之類的無稽之談。但迄今為止，並沒有正式為中國托派恢復名譽，估計近期也不會這樣做，因此本書在大陸不能出版。本書很有價值，很希望貴社能出版此書，為中國近代史留下一份記錄。

鄭異凡（中央編譯局研究員）

2007年12月1日

可以看得出，鄭異凡先生的評價，對於潘國駒先生最後與我簽約決定出版《煉獄》一書一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非常感謝鄭異凡先生的仗義執言，非常感謝潘國駒先生的俠義心腸。老子曰：“上善若水”，沒有他們的仁者之心，這本書是無法出版的。

我同樣感謝我的同學，復旦大學中文系的系主任、著名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專家陳思和教授。

他以非常專業的眼光翻閱了拙作，寫下了激情洋溢的序言。這是我的榮耀。“大愛無言”我不會忘記他對我的友情。

同時我要感謝我採訪與寫作過程中，以及在漫長的等待過程中始終支持與鼓勵我的親人與朋友，對於他們給予我的許多幫助，永生難忘。

最後，我最需要感謝的是鄭超麟、黃鑑銅、杜畏之、王國龍、周仁生、周履鏘、趙清音等眾多的托派朋友，他們有的已不在人世（願他們的靈魂在祖國土地上安息），有的還活在世上，感謝他們接受我的採訪，再一次揭開已經日漸平復的創傷，讓我真切的了了解了這一段歷史，讓我懂得了人生的苦難與生活的艱辛。他們用一生的苦難，點燃了生命的光亮！他們以自己的命運，告訴了人們一個最樸素的道理：生活是美好的，而生活下去就還有希望！



《煉獄 中國托派的苦難與奮鬥》

作者：吳基民

出版社：八方文化創作室

出版日期：2008年4月

The Consequences of 60 Years of China's Nation-State Building

Zhang Kai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60 years, there are tremendous changes in different aspects, particularly in the economy. It is said that China will exceed Japan and even USA within ten years and become the most powerful economic entity.

Completion of capitalist restoration

China "has completely transformed from a highly centralized planned economy system to a market economy of socialism. The percentage of state-owned economic sector in the economy has decreased from 77.6% of 1978 to 29.5% of 2007. The prices of over 98% of commodities and over 95% of production materials are controlled by market, but not by the government." (1)

Chinese Community Party claimed that it was market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lthough it was practically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One of CCP's justifications was that state-own economic entities were still dominating China's economy which was under the national "Five-Year-Plan". However, several years ago, the usual phase of "Five-Year-Plan" was changed to "Five-Year-Schedule", showing that national "Plan" could not control market economy any more. In reality, the state-owned economic entities are gradually marginalized, while 70% of private entities make huge profits and exploit workers. Once the official claimed that China's planned economy was replaced by market economy, implying that capitalism has been already revived in China.

Today's China economy is characterized with the nature of capitalism: unplanned production, anarchic status, and over production. Chinese government once again tackled the daunting problem of over production. According to *Wen Wei Po*, dated 19 October 2009, recently, ten official departments, such as the National Depart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have jointly declared that they would regulate the over-productions and redundancies of constructions in some industries through policies like project approvals and loan credits. The highlighted industries in the list of regulation not only included traditional industries like steel, cement and coal, but also new industries like silicon and wind-power.

China's economy is integrated into global capital economic system. In 2008, due to financial crisis, 8 of 9 national enterprises had negative growth, among which shipping industry lost RMB 28.2 billion. (2) Moreover, Gao Hucheng, the vice deputy of Ministry

of Commerce stated that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from January to July 2009, the total cost of export and import was RMB 1150 billion, that decreased 22.7% when compared with the last year, and the export decreased 22% during that period. (3)

A high cost

According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60th Anniversary of China of *Wen Wei Po*, Zhong Wei, Professor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ointed out, "China's economy is ranked no. 3 in the world, but it is only 6.4% of the world economy, or one-fourth of USA, and GDP of per person is out of top 100. The utmost important fact is that despite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China has to pay the costs of exploiting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cost of the ever widening of income distribution." (4)

Willy Lam, a Hong Kong critic, provided some statistics about the situation of "rich government and poor people", for example, national revenues increased from RMB 2000 billions of 2003 to over RMB 6000 billions in 2008. However, the percentage of income of both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side in GDP has been decreasing. It decreased from 53% of 1999 to 41.4% of 2006, 15% less tha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Sun Liping, Professor of Sociology of Tsinghua University, stated that the gap of living standard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side was 6 times, but the world standard was only 1.5 times. Worse still, millions of peasant workers create a lot of wealth for the whole country but they suffer serious diseases, due to polluted working conditions and lack of labor insurance. It is estimated that 200 millions of workers suffer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5)

After being affected by the world financial crisis, China's market economy confronts problems such as an escalating inflation. The prices of staple food and commodities, particularly property estate, have largely increased. Ordinary people suffer seriously. According to the global Forbes index, the tax burden of the working people in China is ranked no.2 in the world. (6)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etbacks of capitalism is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ccording to the news report from the website of People, Zeng Xiangquan, the Dean of the School of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s of Renmin University, quoted the latest research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has been “in extremely imbalance”, 10% of the richest families occupies 45% of the property of the whole urban population, in contrast, 10% of the poorest families occupies only 1.4% of the property of national population. Nowadays, in the income structure, the lowest and the lower middle classes together are composed of 64.3% of the whole population. (7)

China's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policies, valued of RMB 4000 billions, more or less encountere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saved the descending economic growth, but it worsened the balance of economic structure. This year the government has invested in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omposed of 95% of GDP growth. The phenomenons of redundancy and over-production have appeared again, in that the enterprises of “highly consumed energy and highly polluted” have rekindled, that seriously affe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kind of governmental investment has led to a loosely currency policy, that has increased the bubble economy of financial property as well as has worsened the inflation.

In order to stimulate national consumption for economic growth, the government carried out various policies such as “electronic appliances are being sent to the countryside”, “cars are being sent to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exchange of the newly appliances, etc. The policy of stimulating internal consumption of 2002 has still remained only at the stage of crying the slogans. Percentage of consumption in the economic growth has gradually decrea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erfect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consumption need is the engine of economy. Experts in Beijing analyze of three main obstacles:

First of all, local officials are indifferent as they are only concerned about pushing GDP up for an appraisal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econdly, there is an imbalanc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Due to low income, it directly affects people's capability of consumption. China's financial revenue has annually increased 20.4%, but the working class merely 15.7%, which is obviously against the general will of consumption.

Thirdly, social security like education and health system are lagging behind. Health problem of family members and children's education have become the main “consumption needs”, so it hinders the mode of consumption behaviors. (8)

Those are the consequences of China's implementation of capitalism. Even though the government has conferences on economic policies every year, it cannot reverse the worsening of the situation.

Political cost

Since 1949, China is under the dictatorship of CCP. People do not have human rights. Particularly during Mao Zedong's period, many intellectuals were suppressed. Great Leap Forward and People Commune movement led to three-year great hung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a disaster and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of 1989 was violently suppressed. Wang Dan, the former student leader of Democratic Movement of 1989, claimed that people died in those movements exceeded 80 millions, much more than the death toll records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9)

Many officials of CCP enjoy political privileges and become corrupted. This led to widespread discontentment among people, particularly the marginalized and suppressed peasants. Some leaders of the ruling class attempted to make concessions to grassroots people. Nevertheless, it was oppressed by the interested groups and the privileged bureaucracy. Although the national leaders claim that it should be “people-oriented”, there is no change at the ground level. Dissents like Liu Xiaobo and legal-right protectionists like Tan Zuoren (a lawyer), Huang Qi and Guo Quan were all oppressed and sent to prisons. This violates the constitutional laws and the conventional human rights.

For example, a number of journalists were arrested, prosecuted, and was penalized. *Guangzhou Daily* reported that journalism has become one the top ten risky careers. Insurance companies in Guangzhou refuse to provide insurance for war journalists and even increase the insurance cost of accidents. (10) In October 2009,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declared that China was ranked the last eighth place, in the list of press freedom of 168 countries. 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in USA, announced that within the consecutive 10 years, China had sent the largest number of reporters to prisons in the world. Now 28 reporters are imprisoned and among of which 24 are internet reporters. (11)

Critical class struggle

People are greatly discontented with the reality. Two years ago, the author provided facts and data in his article, “People's Widespread Discontents”, in *October Review*, no.213 of 2007. The more developed capitalism in China, the more people suffered. This led to social conflicts and mass disturbances. According to *Ming Po*, dated 15 March 2008, the statistics of Labor Dispute Mediation Committee of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406 thousands of cases of labor disputes in 2007, not to mention the statistics of Ministry of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and juridical systems. Zhang Mingqi, the vice deputy of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disclosed that,

in recent years, the labor disputes have sharply increased, with an increasing rate of 20% every year (for the details, please see this issue no.224). And according to *China Labor Bulletin*, in 2008, there were 127,467 cases of mass disturbances in China.

The struggle of the largest state-owned enterprise in Jilin Province, Tonghua Iron and Steel Group (TISG),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class struggle of 2009. At the end of 2005, Jianlong Steel Group (JSG), a Beijing private enterprise, became a shareholder of TISG which has a history of 50 years old. JSG intentionally planned to annex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In 2007, TISG lost over RMB 10 billion and faced bankruptcy. In early 2009, JSG declared to retreat its shareholdings from TISG. Then in March, workers complained about salary cut and then went on demonstrations. In June, as soon as TISG gained a profit of RMB 80 millions, JSG became again the shareholder of TISG. In July, 30 thousands of workers demonstrated on the street and had conflicts with the police. Chen Guojun, the new chief manager, requested workers to resume work but later he was beaten to death.

As local people narrated, in April 2009, TISG broke out a strike, opposing JSG's shareholding. Chen came back again to declare the policy of restructuring by the new management that became the proximate cause. The workers complained that they normally had a salary of RMB 1800-2000, but after JSG became the shareholder, they only had a salary of RMB 600. Worse still, some of them had only a salary of RMB 200-300. On the contrary, the chief manager had an annual salary of RMB 3 millions, and other managers around RMB 1 million. Some informants disclosed that the location of TISG was originally an agricultural area, and most of workers were local peasants. For over 40 years, several generations of local people have worked for TISG. It was definitely a disaster for the landless peasants when they suddenly became unemployed. This was the main cause of the conflict. (12)

The lessons of the struggle of TISG workers

First of all, a capitalist became a shareholder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in that both common property and workers were exploited. Once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gained profits, the capitalist became the shareholder again. The workers were forced to resist the repeated exploitation. This proved the shortcomings of transforming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into a stock corporation, which were deprive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orkers' rights. It was also an outcome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Secondly,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became a stock corporation that carried out the super-exploitation of capitalism which led to a critical class struggle. This was the common phenomenon in capitalist society. Nowadays China has already become a capitalist society in that the exploited workers beat the capitalist to death. This showed that the working class was extremely angry with capitalist system!

13 December 2009

Notes:

- (1) *Wen Wei Po* (Hong Kong), 27 September 2009.
- (2) *Wen Wei Po*, (Hong Kong), 11 October 2009.
- (3) *Wen Wei Po* (Hong Kong), 8 September 2009.
- (4) The special issue on 60th Anniversary of China of *Wen Wei Po* (Hong Kong), p.12 and 13.
- (5) Willy Lam's column on *Apple Daily*, 20 July 2009.
- (6) (7) *Wen Wei Po* (Hong Kong), 11 December 2009.
- (8) *Wen Wei Po* (Hong Kong), 12 December 2009.
- (9) Quoted from Wang Dan's column on *Ming Po*, 2 October 2009.
- (10) Quoted from *Apple Daily* dated 9 November 2009.
- (11) *Apple Daily*, 9 November 2009.
- (12) *Wen Wei Po* (Hong Kong), 29 July 2009.

Water Problem Caused by Human Fault

Po Mi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China has a rapid economic growth but one of its costs is a deteriorating environment. Ma Jun, director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Center in Beijing, pointed out that China has confronted water problems, such as water shortage, water

pollution, damaged water resources, among others. In north China, there are serve water shortages. Many cities have over exploited underground water. The situation is not sustainable. In south China, water resources are good but water pollution is very serious. People do not have clean drinking water.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300 millions of peasants of the whole country do not have clean and safe drinking water, and one-fifths of cities cannot have qualified drinking water.

There are tremendous news reports about water problems, for example, according to *South China Daily*, dated 27 September 2009,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had a serious problem of agricultural water pollution and sewage. The whole region produced more than 44 millions of tones of sewage, and around 6 millions of rubbish. Facilities of sewage and rubbish treatment were backward. "Evaporation of polluted water and rubbish gone with the wind" are common phenomenon. Nowadays more than 19 millions of populations do not have clean and safe water. There occurred intestinal infectious diseases in secondary and primary schools, in which over 80% of cases caused due to drinking polluted water.

Moreover, the whole region used pesticides and chemical fertilizers that exceed the safety standard. Only around 30%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were used and pesticides 30-40%. The rest flowed into the water or remained in the soil that polluted the soil, surface water and underground water. Now in the whole region, the livestock and poultry has produced around 600 millions of tones of sewage, which is 22.2% of the total (industry, domestic, and livestock and poultry), and it becomes the main source of water pollution.

Two days later, *China's Environment Daily* also reported that the Environmental Department of Longan Township of Nanning Municipality in Guangxi province received local people's complaints that some wild fish died at the conjuncture of Yan River of Longan Township and You River of Pingguo Township of Baise Municipality. After investigation, it was verified that Kaite Alcoholic Limited Company illegally added honey in the alcoholic products and secretly installed drainage, through which 800 tones of alcoholic sewage were poured into Rongdong without any treatment. Then the sewage flowed

into You River and aggravated its water quality.

Drawing on the relevant laws of prevention and penalties of water pollution, the Environmental Department issued the biggest bill of penalty in the history of Guangxi Province, i.e., RMB 625,110, and ordered the company to stop factory production and sewage, as well as to demolish the illegal piles.

The deteriorating ecology has exerted serious impacts on the livelihood of ordinary people. Government is oblig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n 6 July, 2007, Pan Yue, deputy director of China's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SEPA) was interviewed by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CTV). He cried that "water pollution is in a critical crisis", "it's our fault if we can't solve that problem". He pointed out that 26% of 7 river systems of China were ranked as the worst Category V, and 7 of 9 lakes were the same category, that meant it could not be consumed by human or for agricultural use. In other words, except the mainstreams of 7 river systems were fine, other tributaries almost died, and 80% of lakes nearly died. Pan warned that "if we cannot effectively solve water pollution, we will face the problem of unharmonious society after the fulfill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Pan Yue analyzed the causes of water problem: first, many industrial complexes failed to pass the environmental evaluation and to install the compatible facilitates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Research findings stated that 110 of the selected 126 industrial complexes faile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which was 87.3%; second, facilitates of sewage treatment did not function. 38 of the selected 75 sewage treatment plants were malfunctioned, which was 50.6%; third, the unbalance of structural industrial policy, for example, there were 20 of 35 chemical industrial factories at the Longmen Industrial Complex in Shanxi Province; fourth, the illegal drainage and excess of sewage, over 200 of the selected 500 enterprises faile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fifth, some enterprise did not install prevention facilities; sixth, livestock and poultry further polluted the water, for example, in 2007, cyanobacteria blooms occurred in Taihu Lake, where there were over 300 industrial enterprises such as chemical, dyeing, plating and pharmacy that caused water

pollution. Those enterprises included township enterprises, national as well as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Ma Jun criticized that “the backyard of the world factory will become the rubbish bin and drainage of the world”.

Pan Yue’s article entitled “An Analysi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Socialism” (2006) argued that “capitalism i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Ecological crisis has become the new means of transferring the economic crisis.”

He commented that China has confronted ecological crisis because China is copying modernization from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China has carried out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that western countries spent 100 years to achieve. Thus within 20 years, China undoubtedly has the ecological crisis that western countries has confronted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China’s GDP growth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re top ranked, but the consumption of coals, oil, and steel, the emission of CO₂ and COD (chemical oxygen demand) are top ranked too.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imposed ecological colonialism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rough the transfer of polluted industries; in China, the pollution in the east is transferred to the west, the pollution of the city is transferred to the countryside, the rich consumes and the poor suffers pollution of production. Pan criticized that “some cadres in China have embraced the improper developmentalism and are totally occupied by personal career that led to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This violates the credentials of socialism and is alienated from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an argued that west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was out of religious reform, renaissance,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but the utmost important reason was the expansions of oversea colonies that largely helped western countries transfer the internal social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to their overseas colonies.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only 15%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but they occupy over 80% of the world resources. They upgrade their own standard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t transfer the highly consumed and polluted industries 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order to avoid the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

Being the deputy director of China’s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SEPA), Pan Yue publicly criticized capitalism. On the one hand, it showed that the ruling class was highly concerned about the ecological crisis,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ironically proved that the logic of capital is still occupying the mainstream society.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policy is very passive, that refers to a popular saying that “develop now and clean-up later”. This is only concerned about preventive methods and the imposition of legal constraints. However, the nature of capital is the everlasting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that is embedded i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unstoppably exploit the nature. Hence, once the world factory still functions, adopts the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 policy, and chases after GDP growth, it is impossible to solve the existing ecological crisis.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why the environmental policy cannot be completely carried out, except only some trivial resolutions.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socialism is a perspective of the western leftists who criticize capitalism and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not taken from economic standpoint, but particularly from cultural aspects. Actually,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Asian thinkers and social activists like Gandhi of India and Liang Shuming, a Buddhist and Confucian of China, had already criticized the “barbarian”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y commented that western society worshiped individualism and chased after personal profits and competitions, but they stated that the nature of human should be self-restricted and being humble, concerned about ethics and friendship. And they urged for having “non-violence” and “courtesy / rationality” as the driving forc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inese ancient thinkers also teach people not to become greedy, for example, in his book, *Moral Classics*, Laozi states that human’s greedy will bring a disaster to the nature, “if anybody wants to exploit the whole world, I think it will be ended up in disaster” (quoted from Chapter 29). Moreover, “the largest disaster is greedy” (quoted from Chapter 46). In a word, it will contribute to futur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if we re-interpret and activate the cultural thought of ancient thinkers.

Hong Kong

- 2 It is time to fight for universal suffrage for Hong Kong elections!..... Zhong Ming
 4 Expose all absurd excuses, struggle for a democratically governed Hong Kong..... Zhen Yan
 5 Return the right to determine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Hong Kong to the people!.....SDL

Taiwan

- 10 From the elections to Taiwan politics Wei Bo

China

- 11 The consequences of 60 years of China's nation-state buildingZhang Kai
 15 Capitalism is breeding bed for secret society forces in China Qing Yan
 19 Water problem caused by human fault Po Mi
 22 Xinjiang riots and the right of determinism for ethnic groups Jun Xing
 24 Folk sarcasms in China Min Sheng
 26 Lyrics on irregularities Yi Yao
 28 Lin Xiling's memorial meeting took place in Beijing amidst political pressures Tie Liu
 29 China: New weapons, new status – new bubble? Peter Main
 31 China-USA: The uncertain aftermath of the crisis Michel Husson

Special page on the World Congres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 35 The role and task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draft resolution)...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40 Climate change and our tasks (draft resolution) Daniel Tanuro
 48 Report on climate change Daniel Tanuro
 72 Notes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François Sabado

International

- 79 From Tiananmen to the rule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Zhao Jing
 80 The bill on participation of expatriate residents in Japan in local elections .. Hiroki Toyama
 81 Japan's notorious immigration law Zhao Jing
 82 European anti-capitalist left: Our common stance in the European elections
 83 Morocco: Solidarity with progressive activists fighting repressionFourth International
 83 Behind the Gaza CrisisGilbert Achcar
 90 Protesters challenge water theft and Pro-privatisation plans.....Peoples Water Forum

Book Review

- 92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60 years laterMichael Löwy
 93 On reading the *Manchu Dynasty's Marines and Li Hongzhang*Fang Mingli
 95 On *The Poet Xie Shan's Commitment to the Times* (reprint)Peng Zhiwen
 96 *The Inferno – The Plight and Struggles of the Chinese Trotskyists* (reprint) Wu Jimin
 96 *The Inferno – Introduction* (reprint) Chen Sihe
 99 *The Inferno – Afterword* (reprint) Wu Jimin

Articles in English

- 102 The consequences of 60 years of China's nation-state buildingZhang Kai
 104 Water problem caused by human fault Po Mi

2009年12月31日出版

香港	2	為普選而奮鬥的日子到了!.....	仲明
	4	揭穿各種歪理謬論 爭取港人民自治港.....	振言
	5	把政制發展的決定權還給人民! (轉載)	社會民主連線
台灣	10	從台灣「三合一」選舉談到台灣政治.....	微波
中國	11	建國六十年 結了什麼果?	張開
	15	資本主義孕育黑惡勢力	青岩
	19	人爲的水患	破謎
	22	新疆騷亂與民族自決權	軍行
	24	摘錄大陸順口溜數則	民聲
	26	《無常行》之 顛覆記 烈妻記 巨人記	伊藥
	27	海棠葉.....	伊藥
	28	林希翎北京追思會 在當局重壓下如期舉行 (轉載)	鐵流
	29	中國：新武器，新地位 — 新的泡沫?	彼得·曼
	31	中國—美國：危機的不確定後果	蜜雪爾·胡森
第四國際	35	第四國際的作用和任務 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決議草案.....	
世界大會	40	氣候變化和我們的任務 - 決議草案	丹尼爾·坦努樂
專頁	48	關於氣候變化的報告	丹尼爾·坦努樂
	72	關於國際形勢的解說.....	弗朗索瓦·薩巴多
國際	79	從天安門到日本民主黨政權	趙京
	80	推動日本“外國籍住民地方參政權法案”	遠山裕樹
	81	日本“入境管理法”惡化動向	趙京
	82	我們在歐洲議會選舉中的共同立場 —— 歐洲 13 個反資本主義左派組織發表的共同聲明.....	
	83	對摩洛哥反抗鎮壓的進步活動者的聲援	第四國際
	83	加沙危機的背後	吉伯特·阿恰
	90	示威者挑戰盜水者 第 5 次世界水論壇譴責親私有化計劃 人民水論壇	
書評介	92	《共產黨宣言》出版 160 年之後 ——評〈冥王出版社〉2008 版《共產黨宣言》	米歇爾·洛維
	93	讀《大清海軍與李鴻章》一書有感	方明理
	95	《感時憂國——詩人謝山》小識 (轉載)	彭智文
	96	《煉獄 中國托派的苦難與奮鬥》 (轉載)	(書介)
	96	《煉獄 中國托派的苦難與奮鬥》序 (轉載)	陳思和
	99	《煉獄 中國托派的苦難與奮鬥》跋 (轉載)	吳基民
英譯	102	The Consequences of 60 Years of China's Nation-State Building ...	Zhang Kai
	104	Water Problem Caused by Human Fault	Po Mi